二十世纪文库

论理论社会学

〔美〕罗伯特·金·默顿 著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华夏出版社

论理论社会学

〔美〕罗伯特·金·默顿 著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华夏出版社

1990年·北京

责任编辑：杨　全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by

Robert K.Merton

THE FREE PRESS,New York,1967

论理论社会学

〔美〕罗伯特·金·默顿 著

何凡兴 李卫红 王丽娟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69千字 插页2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 7-80053-210-0/Z·024

定价：5.20元

前　言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的发行商早已和我谈起：有必要单独发行该书的第一部分。因此，对其未作修改在此作为本书的第三、四、五章重印出来，同时，将这本大部头著作的简短导论进行大大扩充作为现在这本书的第一、二章。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有必要对这五章说上几句。

第一章阐述社会学理论史和当今实用理论体系的不同功能。从过去发展而来的理论几乎无需考察。但是，我认为，就象思考当今的社会学理论是怎样从以前的理论发展而来有价值一样，考察社会学思想的真正历史的学术要求，比起仅仅是按年代编纂社会学学说纲要来，具有更大的价值。

过去几十年来，中层理论一直受到极大关注，现在有必要根据它的应用和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批评，来评价它的特点和各种作用。第二章就承担这项任务。

第三章提出了一个进行功能分析的社会理论框架。本章集中讨论一个整理假想、概念和程序的范式，前者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功能解释中，一直是含混不清的(偶尔是明确的)。如果舍弃"发现"这个词广泛的情境意义，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范式的要素就基本被发现了，而不是被发明了。这个范式的要素通过几方面得以揭示，一方面通过批判地考察那些利用功能取向从事社会研究的人们所进行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通过重新考察我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最后两章总结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目前出现于社会学探索之中。

第四章对相关的但是不同的探索方式进行了区分。探究方式常常被囊括于含混的术语"社会学理论"之中，譬如方法论或程序逻辑、一般取向、概念分析、事后解释、经验概括和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在描述这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各方面关系时，我不但强调理论的一般取向的功能，也强调其各种局限性，正是由于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因此比起从一般理论导出也为经验所证明的一致结论来，社会学就更加完备了。所以，我不但强调和刻划经验概括的不健全特性，而且强调和刻划经验概括的重要性。该章也说明这些全然不同的概括能够通过整理过程得到校准并相互结合。然后，它们成为一般规则的特殊事例。

第五章考察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相互关系的另一部分：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各种不同影响。只有那些仅从书本上了解经验研究而没有实际从事过经验研究的人才会继续相信：经验研究的唯一或首要功能是检验已确立的假设。这种观点表达了一种对于经验研究的主要的，但也是狭隘的观点，它远没有表述出经验研究的主要功能。经验研究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不是上述那种被动作用。本章详细描述了：经验研究也引发、重新阐释、重新确立目标，并对社会学理论予以澄清。可以说，经验研究促使理论发展起来。很明显，远离经验研究的理论家，仅仅凭对经验研究的道听途说行事，这样的理论家冒着与经验隔绝的危险，而经验很可能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新的、富有成果的方向。他的头脑里没有经验准备。总而言之，他脱离了经常使人灵感倍生的经验，因为他缺乏一个发前人所未发的头脑，他也失去了有所发现的机会。也许韦伯的话是对的，为理解凯撒，不必本人是凯撒。但是有一种魔道，使得我们的社会学理

论家有时好象要去理解凯撒，但同时又觉得没必要去研究凯撒。

这样的一本小书——部分是新作，部分是旧著——也得益于多方协作。我特别感谢巴巴拉·本金(Barbara Bengen)，她对本书前两章作了精心审定，特别感谢哈里特·A·朱克曼博士(Dr. Harriet A. Zuckerman)，他对本书草稿提了一些批评建议，还特别感谢玛丽·迈尔斯夫人(Mrs. Mary Miles)，她把满纸涂鸦打成了清样。在准备序言章节时，我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罗伯特·金·默顿

致　　谢

没有人完全了解是什么铸就了自己的思想，我也很难详细说明本书提出的各种概念的来源，以及多年来我对它们所作的一些修改的理由。很多社会科学家都为发展这些概念作出了贡献。因此，只要知其来源，我就在书中各章大量的注解中予以标示。但在这些学者中，有六位尤其使我在不同程度和方面获益匪浅，在此特致谢忱。

霍布金斯(Charles H.Hopkins)对本书写作起了最早最大的影响，现在才对他致谢已是言不及意和为时过晚。因为有了他——我姐姐的丈夫——很多人都提高了人的尊严。只要我们这些与他接触过的人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心中，满怀热爱、尊敬和感激之情．我将此书献给霍布——一位通过自学而可施教于他人的人。

我感激我的好朋友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他现在奥伯林学院任职，是他使得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了解到进行社会关系系统运行研究这一令人神往的学术境界。要不是他，我决不会如此顺利地步入社会学领域。

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对我帮助很大，在他从事大规模的历史运动研究(其代表作为《社会和文化动力学》)(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之前，他就帮助我摆脱了思想的狭隘性，即把社会的有效研究局限在美国本土，他也帮助我摆脱了在贫民窟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方式，即把社会的基本主题集中在社会生活的表层问题上，如离婚和青少年违法行为。我对他怀有深切的敬意。

萨尔顿(George Sarton)在科学史学家中享有盛誉，我感谢他

的指导和友谊，感谢他使我得天独厚地在哈佛189图书馆中他有名的工作室里工作了将近两年。在论及社会学理论史之要求的本书第一章中，他对我的启发随处可见。

看过本书之后，读者会马上意识到，我从我的导师和朋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里师承优厚。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很早就将他的热情倾注于分析理论。他善于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情，而不是将其培养成唯命是从的信徒，由此可见他为人师表的气度。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哈佛大学小小的社会学研究生班里，具有学人之间的良好学术气氛，象我这样的研究生都可能与导师保持一种密切的工作关系，帕森斯博士就是我的这样一位导师。那确实是一个同仁团体。而今天，在那些有很多研究生，而只有很少一小群疲于奔命的教授组成的系，则很难发现这种关系。

最近一些年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协会工作，我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进行合作时，我从他那儿受益不浅。在我们无数次的交谈中，很明显，他根本没觉察到我从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非常高兴地借此机会公开地使他注意到这一点。他的怀疑者的好奇心对我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我曾认为，功能分析对研究人类社会的广泛问题尽管不是唯一的，也是目前最有发展前途的理论取向；是他促使我更详尽地说明我持上述看法的理由。总而言之，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强化了我的信念，即社会科学与社会上的附庸风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系统性和严肃性，也就是说，从学术上负责地、严格地追求那个首次被认为是有趣的念头。我想，这也是怀特海(Whitehead)在本书第一章卷首格言中所表达的意思。

还有四个人需要在这里一提：一个是，所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她的感恩之情，另外三个，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将会认识他们所给予我的无穷乐趣。

目　录

第一章　论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

"一种跟在先驱后面亦步亦趋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

"早期学科的特点……是目标弘大、抽象，研究琐碎具体"。

"科学史告诉我们：建构真正的理论和将其精确地应用完全是两码事。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出自常人之口"。

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思想之组织》

虽然本文主要讨论过去社会学家们的著作，但书中并不论及社会学理论史，而是借此评论当今社会学家研究的某些理论之类别实质(Systematic Substance)。两者的区别决不是随意的，然而这两者经常在教科书和出版物中混为一谈。确实，除了日趋成为例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一般社会科学的现存理论都趋向与本学科的历史混在一起，以达到比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更大程度上之理论与历史的合流。①

---

① 此观点引自早期论文"社会学理论的地位"，载《美国社会学评论》("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9，13，164—8。关于社会思想史之作用的适当观察与流行社会学理论观察的区别，参见Howard Becker，社会学理论的生机(Vitalizing Sociological theory)，出处同上，1954，19，377—88，esp.379—81，以及当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参见，Joseph Berger，Morris Zelditch，Jr.and Bo Anderson，《前进中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Progres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6)，ix-xii，and William R.Catton，《从泛灵论的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的社会学》(From Animistic to Naturalistic Sociology)(New York，Mc-Graw Hill，1966)。对社会理论的性质与功能的略有差异的观点，参见，Theodore Abel，"社会理论目前的地位"(The present status of social theory)载(接下页注)

性，它们将涉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社会学观念之间复杂的秉承关系，发展方式，理论与其社会起点(Social origins)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各部分之社会地位的变化之间的联系，理论与变化中的社会学之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理论从社会学思想中心的扩散以及在扩散中对其所作的修正，以及文化与社会结构环境的行变化对理论产生影响的方式。简言之，如果在实践中注意这些，就会有利于产生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史。

然而，社会学家们固守一个很狭窄的，几乎是不太严肃的社会学理论史的概念，他们把社会学理论史看作对过去理论的批判性总结之集大成者，并有主要理论家的小传点缀其中。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把自己看作教授和写作社会理论"史"的当然人选——毕竟，他们熟悉早期学者的经典著作。因而，理论史的概念既非历史也非分类学，而是一个拙劣杜撰的大杂烩。

实际上，这个概念在当今学术界是一个畸形物，它预示：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正在发生一种角色的逆转。因为社会学家对狭隘、肤浅的思想史的概念依然抱残守缺，与此同时，专业化的科学史学家的新军正广泛而深刻地以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作为理论指导，来解释科学的发展。① 专业化科学史包括各种具有理性但不完善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形成之时还能自圆其说，而后来为令人深信不疑的经验检验所否定，或者为适应性更广的概念所取代；它也包括错误的起步，包括现在已陈腐的学说和过去不结果实与结了果实的错误(fruitless and fruitful error-

---

① 新的科学史更为重要的阐述包括在下列各家的著作中，Charles Gillispie, Henry Guerlac, Rupert Hall, Marie Boas Hall, Thomas Kuhn, Everett Mendelsohn, Derek price, Robert Schofield, L.pearee Williams, and A. C.Crombie.

s)。科学史的基本原理是力图了解事物是怎样发展的，这正如某些学科或某一学科群过去所做的那样，而不仅仅按照年代顺序编制科学理论的纲要。总而言之，这种历史并不是用来在流行的操作理论、方法论和所属学科的技术方面指导今天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之所以有联系，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区别。

二、社会学理论的公共档案

以另一密切相关的方式，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已经戏剧性地调换了角色。通过集中访问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并录音，历史学家正在勤勉地编纂各学科的当代“口头历史”①；而社会学家的注意力还是局限于公共文件上。另一个例子是：越俎代庖的历史学家正在超过科班出身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公然借用了社会学家的访问技术。简言之，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历史学家正要写的分析史，其中某些部分属于科学社会学，② 而社会学家却继续把社会学理论史看作是对连续性理论体系的批判性总结和大系。

---

①口头史为历史学家Allan Nevins所发明，作为收集历史遗赠的散失资料的方法，它已经从社会学家的领域里吸收了访问技术，而不是从历史学家那里，也不是从传统的收集和整理文件资料的大师那里。有关口头史的报告，一个研究模式（它早以超出它在哥仑比亚大学的起源地之范围），参见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1964) v.1及每年的增补本。

例如，美国物理学会在Charles Weiner的指导下正在编写一个核物理的口头史和文件史，而关心本学科历史的社会学家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技术。

② 带有社会学色彩的科学史的例子，参见年刊History of Science，1962年由A.C.Crombie and M.A.Hoskins创刊，另外参见Marshall Clagett,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社会学家提出这个范围狭窄的概念，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来源是描述这些理论体系的已发表了的著作，如马克思、(Marx) 韦伯(Weber)、迪尔凯姆(Durkheim)齐美尔(Simmel)、帕累托 (Pareto)、萨姆纳(Sumner)、库利(Cooley)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较不知名学者的著作。但编著成书的科学著作的结构与研究人员所遵循的实际探索过程之间的差别，犹如一片参差不齐的礁石，它使上述这种似乎不言自明的对原材料的选择在这片礁石上触礁搁浅了。这种差别有点象"科学方法"的教科书与科学家实际上进思维、感受和进行工作的方式之间的那种差别。论及方法的各种书籍提出理想的模式：科学家应该怎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但是正如每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所知：这些有条不紊的规范模式并不重视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所采取的那些杂乱无章、因势利导的适应性调节措施。一般而言，科学论文或专题著作代表了一种纯净的样式(appearance)，这种样式不会再现直觉的跳跃、错误的起步、失误、夭折以及其中的某些巧合，而这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探索过程。因此科学的公共档案不能提供很多这种原始材料，来用于重视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

社会思想史，作为对已发表的思想之一系列评论性的说明，其概念远远落后于早已被认识到的现实。甚至在科学论文逐渐地出现之前，即三个世纪以前，一般的、非个人的和习俗化的科学词汇能传达科学的新贡献之精髓，但是不能再现探索的实际过程。换句话说，甚至在那时人们就认识到：科学理论的历史和分类学需要不同的基本材料。十七世纪初，培根(Bacon)进行了观察并抱怨：

> 从来没有任何知识按照被发现时的顺序得以传播，在数学方面也是这样，一般说来，为了对后面的命题进行证明和表述，得使用前面的命题和条件，可实际上情况往往与此相

反。①

从那时起，头脑敏锐的人们已重复地，并且似乎是独立地进行了同样的观察。因此，一个世纪之后，莱布尼兹（Leibniz）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提出过大致相同的观点，从那时起该信就成为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笛卡儿想要我们相信，他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这有点言过其实。然而，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去研究别人的发现是有益的，所谓适当的方式是向我们开放所有有关发现的史料，并且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他们，我希望，作者能给我们提供他们发现的历史以及完成发现的各个步骤。当他们忽略了这些时，我们必须尽量去猜测这些步骤，为的是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如果批评家们在评论书刊时为我们做了这一工作，（这里，批评家肯定要去请教大数学家和大哲学家：弄清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们就为公众做了一件大好事。②

事实上，培根和莱布尼兹两人所说的意思是：科学史和科学分类所需的原始资料有很大区别。但是：科学家们最初发表他们的观点和发现，不是为了帮助历史学家重现其方法，而是向他们的同时代人，并指望可以向子孙后代报告他们对科学所作的贡献。因此，他们以逻辑上令人信服而不是以历史描述的风格继续大量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继培根和莱布尼兹之后，有人对这种实践活动继续予以观察，几乎在莱布尼兹之后两个世纪，马赫

---

① Francis Bacon，《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由James Spedding, Robert leslie Ellis, and Douglas, Denon Heath编辑，(Cambridge, England: Riversiae Press, 1863)，VI，70。

②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C.I.Gerhardt，编辑(Berlin, 1887)，II．568，在他从维也纳致Louis Bourquet的信中，22March 1714。

(Mach)提出：他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出现之后几千年来，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科学和数学的表达，还是趋于逻辑的决疑法，而不是描绘出实际的探索途径：

> 欧几里得体系以其逻辑上的完美使一些思想家赞叹不已，在这一片称誉之中，人们忽视了它的瑕疵。即使是当今的大学问家也以欧几里德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探索结果而误入歧途，以致实际上遮蔽了他们的调查方法，这对科学极为不利。①

从某种角度来说，马赫的看法是一种倒退。他不了解培根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十分明确的观点，即科学的记录由于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必然不同，其目的或者是对当前的系统知识作出贡献，或者是为促进人们对科学工作是怎样发展的历史性理解作出贡献。但是象培根和莱布尼兹一样，马赫确实认为：我们不能希望，只凭利用所发表的规范化报告来重视科学探索的实际历史。

最近，物理学家莫尔斯(A.A.Moles)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科学家是"经过职业训练，以致会掩盖自己最深层的思想"以及"不自觉地夸大过去所做工作的理性方面"。②此处所要强调的是：掩饰探索的实际过程这种做法大都由于科学出版的惯例，它要求用非人称的被动词汇和格式书写报告，这意味着，观点可以不依赖于人的大脑而发展，调查可以不依赖于人的一系列劳动而进行。

植物学家阿尔伯(Agnes Arber)已对这种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概括，他声称："科学研究的表达方式……为当时的思想偏见所

---

① Ernest Mach,《空间和几何》(Space and Geometry), T.J. Mc Cormack翻译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06), 113, 斜体字部分。

② A.A.Moles, La création scientifique(Geneva, 1957)Jacgues Barzun引用、参见《科学：荣耀的娱乐》(Science:The Glorious Entevtainment)(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93.

铸就"。虽然科学报告的风格随着当时知识界流行的作法之不同而异，但他们都代表一种规范化的对探索过程的再现，而不是忠实地描述它的实际发展过程。阿尔伯观察到：在欧几里得时期，演绎法得到高度评价之时。"以武断选择的演绎思路贯穿命题的人为方法"，完全掩盖了探索的实际过程，这种方式使得研究的经验方面含混不清。今天，科学家"在归纳法的统辖之下，即使他事实上是用类推的方法证明了假设，他的本能反应是掩盖他的踪迹，并以归纳的形式表达他的所有工作——而不仅仅是他的论证，好象他真是通过归纳过程才得到了他的结论"。①

阿尔伯注意到，仅在非科学文献中，我们才能发现对思想网状特性所作的记录：

> 斯特恩(Lawrence Sterne)，以及某些在技术方面受其影响的现代作家(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印象主义者乔伊斯(James Joyce)和伍尔夫(Virginia Woolf)早已看到这复杂的、非线性的人类思想的行为，并试图用语言将其描绘为来回摇摆、无视世俗后果(temporal Seguence)的缆绳(Shackls)。但是很少有人(科学家)敢于冒风险再现这些行为。②

然而，不仅仅是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持有这样的观点：社会学不能区分理论史和理论的分类学这种现象最终将被消除。首先，一些社会学家认识到：一般的公共档案为发掘社会学理论和调查的真正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完备的基础。他们留心其他一些原始材

---

① Agnes Arber, Analog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见M.F· Ashley Montagu编辑的Studies and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offered in Homage to George Sarton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44), 222—33，尤其见229。

② Agnes Arber, The Mind and the Eye: A study of the Biologist's Standpoi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46。Chapter Five: "The Biologist and the Written Word"，的确，所有学科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对这博大精深的巨著进行研究，社会学不应该排除在外。

这是专门研究介绍行为科学的第一家刊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却有二十多种主要杂志和一百多种较次要的杂志)。第三个迹象是人们研究社会调查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例如，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其《欧洲社会研究的兴起》(The Rise of Social Research in Europe)这一言之有据的历史论文中，指出了这种方向，而拉扎斯菲尔德却写出了一系列专题论文，专门论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低地国家(Law Countries)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经验社会研究的早期发展。① 同时，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在他最近关于柏拉图(Plato)社会理论的著作中，为论述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形成的环境与社会理论的联系开了一个好头。② 社会学家正转向对理论发展分别进行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上述只是许多迹象的其中几例。

三、社会学理论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思想史学家象其他技工一样，也面临着各种各样职业上的风险。而在这些风险中更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出现于每当历史学家试图确定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时候。这种事情有点象走钢丝，因为直立姿势稍有偏离，就会马上失去平衡。思想史学家可能遭受两种风险：或者是在并不存在思想连续性的地方却宣称发现了思想的连续性，或者是在实际存在思想连续的地方却未能发

---

① Nathan Glazer, "The rise of social research in Europe" 载于The Human Mean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作者Daniel Lerner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9,)43—72。参见拉扎斯菲尔德主要著作 Anthony Oberschall,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Germany 1848—1914(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5)中的第一篇专题论文。

② Alvin W. Gouldner, Enter Plato; Classical Greece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当然，这并不是说某些科学思想已被巨细无遗地预见到，而没有给后人留下丝毫余地。知识的历史连续性肯定包括对以前尚未预见到的知识加以新的增补；同时，对思想的形成和经验一致性(empirical uniformities)的发现中，真正的非连续性也要用量的飞跃形式来度量。的确，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第一步必须解决包括认清有关情况和过程的问题，以弄清科学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重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范围问题，同整个科学史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它们在这些历史中呈现不同的特点，例如社会学的专门史，就主要局限在按年代顺序整理的思想总述。由于在形诸文字时排斥了思想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严肃研究，而早期思想和近期思想之间被认可的关系则被置于该项工作的中心。因此，思想史学家(不管他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区分早期和近期思想的类似范围。不同的分类用一些不同术语来阐明，如：重新发现，预见，预示，或者在极端的意义上，是预示主义。

1.重新发现和最初发现(Rediscovery and prediscovery)

严格说来，在科学上多元的独立发现意味着：实质上相同或功能上同等的思想和经验上的发现，它们由两个或者更多的科学家所提出，而每一个人都是在不了解其他人工作的情况下单独提出自己的见解。若这些发现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它们就被称之为"同时的"独立发现。历史学家还没有发展出被普遍接受的"同时性"标准，但是实际上，若这些发生在很短时间内，人们就将其称之为同时的。若这些独立的、功能同等的发现间隔时间较长，则后者被称之为重新发现。由于科学史学家对早期的发现尚未确定任何称谓，我们不妨采用"最初发现"这一术语。

(接上页注) discoveries"，引文同上，以及 "Resistance to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ultiple discoveries in science"，载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4,237—82。

弄清独立发展的思想之间相似的程度，实非易事。即使在较为精确的学科，例如数学，独立的多元发明的宣告也经常引起激烈的争执。问题在于：有多少相互重合的部分才算是"同样的"？例如，鲍里埃(Bolyai)和罗巴契夫斯基(Lobachevsky) 所发明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的仔细比较表明，罗巴契夫斯基更为系统地、更为有效地和更为详尽地完成了重合概念中主要成分的九分之五。① 而且，人们发现：在把握能和能的守恒概念的本质部分的十二位科学家中；没有任何两个人采用一套相同的概念。② 然而，只要稍微放松标准，这些概念一般就被说成是多元独立发现。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多数领域都欠缺精确的系统阐述，要弄清独立发展的概念之实质上的同一性和功能上的同等就更为困难。

在对"相同"发现的早期和近期阐述进行全面比较时，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实质上的同一性和功能上的同等，另一种方法似乎是假定：它们是同一类发现。预先假定：这些有关发现的报告是真实的；既然现代科学鼓励创造性思想(不象过去，古代权威对新思想采取很保守的态度)，发现者们不可能不报告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独创性。我们发现，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有这样的事情：较后的发现者将自己的发现报告作为最初发现。例如，具有高度发明才能的物理学家杨格(Thomas Young)报告说："有几个英国数学家所不知道的事情，当时我认为是我发现的，但后来我

① B.Petrovievics, "N.Lobatschewsky et J. Bolyai: étude comparative d'un cas spécial d'inventeurs simultanés", 载Revue Philosophique, 1929, cviii, 190—214；同一作者对另一情况相同影响的早期论文，见"Charles Darwin und Alfred Russel Wallace: Beitrag zur höheren psychologie und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Isis, 1925, vii, 25—57.

② Thomas S.kuhn, "Energy corservations as an example of simultaneous discovery"见于Clagett的著作中，引文同上，321—56.

发现外国的数学家已经发现了它们并予以表述"。反之，杨格也接到了弗雷斯内尔(Fresnel)的道歉，因为弗雷斯内尔得知，在光波理论方面，他无意地重复了杨格的研究工作。①同样，罗素(Bertrand Russell)评价他与怀特海合写的《数学原理》的贡献时，他说，这一工作的大部分早已为弗雷奇(Frege)所完成，但是我们原先并不知道"。②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每一领域都有它自己的补充说明：较后的作者声明他们的贡献已有人捷足先登。这样，就为这些学科的多元发现的事实提供了雄辩的证明。只要适当考察一下这些事例分散的状况：巴甫洛夫(Pavlov)公开承认：这条路(巴甫洛夫的新调查方法)走出头几步的荣誉应该属于桑代克③(E.L.Thorndike)。弗洛伊德(Freud)在150多个场合给出了他的发现优先权的书面证据，他在报告中说："我后来在一位熟悉哲学，但不熟悉医学的工程师波珀(J.Popper)所发表的著作中，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本质特点和最重要的部分——把梦的变形译解为内心冲突，一种内心的不诚实——他以林柯斯(Lynkeus)这个名字发表了他的著作：《对现实的幻象》(Phantasien eines Realisten)。④艾

---

① Alexander Wood,Thomas Young: Natural Philosophers,1773—182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65, 188—9。Fresne对Young写道："当我向协会提出它(他的关于光理论的研究报告)时，我并不知道你的实验和从中引出的推论，所以我提出了好象是新的解释，而这些你早在很久以前就已提出了。"

② Bertrand Russell, "My mental development",见于James R.Newman的书中The World of Mathematic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6), I, 388.

③ I.P.pavlov, Lectures on Conditioned Reflexes, 由W.H.Gantt译，(New York: L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8) 39—40.

④ Sigmund Freud, Collected Papers, 由Joan Riviere译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9), I, 302。有关弗洛伊德对预见，重新发现，最初发现和先决条件的见解的详细说明，参见Merton, "Resistanee to the systematic stuay of multiple discoveries in science", 出处同上，252—8.

伦(R.G.D.Allen)和希克斯(J.R.Hicks在1934年各自独立地完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他们后来发现了一位俄国经济学家尤根·司鲁斯基(Eugen Slutsky)所提出的最初发现，1915年Slutsky在一意大利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最初发现，当时的战争妨碍了思想的顺利流通，因此，艾伦和希克斯不遗余力地呼吁公众注意司鲁斯基的最初发现。艾伦为司鲁斯基的较早的理论写了一篇文章，而希克斯则把价值理论中的基本方程命名为司鲁斯基方程。①

相同的模式在哲学家中经常出现。摩尔(Moore)的《伦理学原理》可能是二十世纪伦理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人们所熟悉的那类报告："本书一经完成后，在布伦塔诺(Brentano)论述'正确与错误知识的起源'时，我就发现他的观点比较起其它我所熟悉的研究伦理问题的作家来，要更接近我的观点"。然后，摩尔继续总结了四个主要概念，但写得很别扭，并说："布伦塔诺似乎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②

前面表述的报告甚至扩展到了最新创造的修辞手法这样琐碎的细节。因此，里斯曼(David Riesman)引进了"心理陀螺仪"的比喻，后来他在报告中说："写了上述篇章以后，我发现，在墨菲(Gardner Murphy)的著作《个性》(Personality)中，他用了同样的暗喻"。③

---

① R.G.D.Allen, "Professor Slutsky's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载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6年二月号, Vol.Ⅱ, 2, 120; J. R.Hicks, Value and Capital(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6).

② 摩尔,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x-xi。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摩尔也说明了他与布伦塔诺在思想上的一些基本差异。然而，他举例说明了这种观点的主要成分是缓慢发展的，即使是在两个或更多独立发展的理论中，某些思想的一致性也不意味着整体理论之间的完全一致。社会理论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以及有时物理和生物学理论都并没有这样紧密编织的逻辑凝聚力，即不意味着：部分的一致就相当于整体的一致。

③ 里斯曼与丹尼和内森(Nathan Glazer)合作的著作,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6, 6n.

偶然发现一个与自己见解相同的最初发现，就象无意中在人群中碰到了一个与自己相当的人那样令人困窘。经济学家彭罗斯(Edith Penrose)说出下面的话，她无疑是为其他科学家和学者说话："当我不辞劳苦地独立得到一种我认为是重要的和新颖的思想而且发现其他作家已更好地表达了与我同样的思想时，我经常有一种惶乱的感觉"。① 后起步者需要更善于觉察其他人的早期工作和他们目前所从事工作之间的细微差别；放弃他们的研究意味着：在他们看来，这项研究在他们之前就已得出重要结论。例如斯皮尔曼(Curl Spearman)谈到：他已经发展了一种"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的详尽理论，以度量相关程度，结果发现"我的相关理论的很大一部分早已被其他学者，特别是高尔顿(Galton)和尤尔(Udney Yule)所提出——并且更为完善。因此，这里又白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很多被认为是首次发现的工作是很蹩脚地拼凑而成"。② 捷足先登的探索也适用于解释学院派研究(Scholarly research)的细节。例如，历史学家赫克斯特(J.H.Hexter)以他悠闲、坦率的笔调报告：他早已完成了一个对下例说法提出质疑的附录，即"莫尔在《乌托邦》中不同意希斯洛戴(Hyth loday)所提出的私有财产的观点，当时我的同事帕克斯(George Parks)教授使我注意到一篇优秀文章，这是由瑟茨(Edward L.Surts)所写的对上述说法提供证据的文章……这篇文章使我那篇附录成为

---

① Edith Penrose,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the Firm (New York, John Wiley, 1959), 2.

② Carl Spearman, in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Carl Murchison 编辑,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1), 322.

判断，以使其含义充分明确。①

但是思想史学家经常忽略了这些基本区别。有时真正高频率的重新发现，导使他们放宽了实质上同一或功能上对等的标准，并且宣布那些过去只是模糊感觉到的表述为"重新发现"；在极端情况下，历史学家整个取消这些标准，于是在所有领域内开展一场发现"预见"和"最初发现"的竞赛。这种夸大早期和近期系统阐述之间的类似之处，而忽略其差别的倾向是一种职业病，它使得很多思想史学家身罹其患。

在较为精确的学科中，现代科学史学家对他们的先驱们杜撰出预见和预示的倾向深感失望，他们也许可能愤怒地拒绝比较性探索的价值。但事实上，这种病症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中似乎更为扩散和更为严重。其原因不难发现，看看社会学的历史——此处作为一个例子，料想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世代衔接，大多数社会学著作(包括这本小书)都已具有科学论文的风格。然而，不象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那样具有早已确立的论文版式，只是最近才对社会学论文提出某些具体要求：要写出对问题简洁的陈述、调查程序和工具、经验发现和对上述各项的讨论以及对调查所得

① 弗洛伊德用下面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事件是有象征性倾向的，即："我很了解，用语词来表达思想是一二次或更多的事情，所表达的思想则以转瞬即逝的灵感形式到来，而严肃地思考它，认真地对待它，在各个细节上，不管多大的困难也要追踪到底，并且在已有真理之中为其夺得一席之地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偶尔的调情和承担所有责任和困难的严肃婚姻之间的区别。'出于一种想法而结婚'并不是一种罕见的修辞手法"。参见 Sigmund Freu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l"，第一版1914年，重印时收入 Collected Papers 出处同上，I，287—359，尤见296。奉献到思想史的这篇独具个性的论文充满了适切我们之直接主题的观察。

的理论推断。[①] 过去的社会学论文，尤其是专著的写作风格是：很少对基本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而程序逻辑以及变量和特殊理论之间的关系相当含混，保留了一种长期以来人文科学的传统。这种做法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由于没有对一些隐晦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予以明确的定义，因而它们易于为人们忽略，这样，他们后来才实际上被发现。第二，早期表述的含糊性使思想史学家流于轻易确定最初发现的同一性，而在很多情况下，较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之间仅有含混和无关紧要的相似性。

这些含混给思想史学家造成很大的负担，使他们难以区分真正的预见和虚假的预见，所谓虚假的预见是指，偶然使用一些与以后著作中相同的词汇就被认为是类似，而且被历史学家注入从后来的知识中所得到的意义加以补充。真正预见和虚假预见之间的区别很不清楚；然而，如果历史学家不积极主动去探索，并且随便认为新旧表述在任何程度上的类似都可以是预见，那么，事实上他们是在杜撰思想的神话，而不是思想史。

至于最初发现，只有当后来的科学家本人承认在他之先有人已经提出了与他相似的某些思想，才能提供真正预见的假定证明。因此，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一锤定音地制定了功能自主(functional autonomy)的原理：在能详细说明的条件下，行为方式本身就成了目的或目标，尽管这些行为肇始于其他的原因。关键之点是：即使行为不为创新的驱力或动机所强化，它也能长此以往。当奥尔波特首先提出这个有影响的，在一些方面也是一个

① 为了保持记录的完整，我们现在不宜说或不宜暗示：社会学的论文版式就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一些真正采用这种版式的论文，也只是明显地表明它们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一些其他保留这种科学论文风格的文章，有时离我们对社会中人的理解相差甚远。此处这个问题并不是社会学不同写作风格之相关的科学优点，而是"社会学"文章的特点，以鼓励社会学史学家将预见和预示纳入它的发展过程。

互相矛盾的概念后，① 紧接着他说明了该概念早期的含义，譬如，伍德沃思(Woodworth)观察到：心理机制可以转换成驱力(drive)，斯特恩(Stern)观察到：表现动机(phenomotives)能转变为基因动机(genomotives)，托尔曼(Tolman)观察到："手段一目的"可以凭它们自身的价值而自立于世，人们把这些作为预见而不是作为最初发现，因为早期的发现仅仅部分与后来的观念重叠。更为显著的是，早期发现并没有得出很多奥尔波特所描述的逻辑推论和经验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奥尔波特的系统阐述改变了功能自治的历史进程，而预见则对此无能为力。这种差别迷失于思想史之中，思想史主要对分配人们在贡献方面的"资格"感兴趣，因为思想史倾向于将最初发现和预见混合成一团迷雾。与之相反，那些致力于重视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的思想史，注意一种观点早期的相近物与后来系统阐述的根本差别，后者通过归纳作者和其他人的系统探索，而在该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若一科学家偶然发现一早期的和为人所忘却的思想，他往往先考察一下它的意义，然后才沿着它追究下去，尽管岁月流逝，相隔多年，此时我们就有了思想之历史连续性的真实情况。然而与科学探索的传奇(Story—book version)相反，这种模式似乎不太常见。更为普遍的是：一种思想得以明确地和强有力地系统阐述，以致同时代人不得不重视它，那么，要对其思想进行预见和预示就较为容易了。但是对于思想史的某一理论来说，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早期的含义湮没无闻 而在新的和暂时确定的系统阐述使它们重新为人们所注意之前，没有人对其进行系统探究。

---

① Gordon W. Allport, "The functional autonomy of motives", 载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37, 50, 141—56. Calvin S. Hall and Gardner Lindzey 一直注意着 Allport 有关预见的说明，参见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270—1.

最初发现、预见和预示的认同可能是迅速的，或者是延迟的。在科学家和学者的社会系统中，发现的迅速认同仅取决于有心人的多寡。当最新形成的思想或经验发现发表之时，很可能已有一小批科学家完成了这个思想的早期阶段，尽管他们尚未在其著作中加以使用。当早期的探索被新思想的系统阐述所激发时，那么，这些科学家们就向该系统中的其他人报告他们的最初发现、预见和预示(《科学》杂志的某些篇章就是为使用这种模式的科学界同仁提供这种信件的园地)。

当早期的看法很快被遗忘时，对它的认同是延迟的。也许它早已在某些不出名的杂志上发表过，或者夹在另一主题的论文中，或者被保存在未被发表的实验笔记、日志和信件中。同时代人在某段时间里可能把一种发现看作全新的，但是一旦他们完全了解了这个新思想，一些科学家在他们后来重读早期著作时就会意识到：其中某些系统阐述与这种新思想有相似之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过去的科学史不断地被稍后的历史所改写。

奥尔波特有关功能自主的系统阐述，作为一条心理学基本原理，为第二种发现模式提供了范例。因为奥尔波特已经使我们接受这个原理，当我们阅读早期著作时，我们对有关观点也就十分留心。因此，多亏奥尔波特，我在重读米尔(J.S.Mill)的著作时能够说：早在1865年他就已提出同样的原理："只有当我们的目标独立于痛苦与愉悦之情时，我们才能被认为具有坚强的个性。"[1]然而，问题是，当我第一次读米尔的书时，由于我那时不了解奥尔波特的阐述，所以我对米尔的观察就熟视无睹。或者，可以说，1908年齐美尔已经预见到奥尔波特的基本原理，不过他是用社会

[1]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65), 423.

学的术语来表述的：

> 最具社会学重要性的一个事实是：无数的关系保持它们的社会结构不变，甚至当其所由产生的情感或实际场合已不复存在时也是如此。……确实，一种关系的产生需要一定数量的正反条件，即使缺乏其中之一也会马上中止它的发展。然而，一旦开始，它就决不会被某个条件的随后消失所破坏；如果这个条件在早期消失的话，那将会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人们对〔政治〕国家有一种说法——维持国家只有用建立它们时所使用的手段——仅仅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真理，并且也决不是一个广泛适用的一般社会原则。不管社会联贯性的起源是什么，它发展了一种对其形式的自我保护和自主存在，而这些因素独立于其最初的联接动机（Connecting motives）。①

米尔和齐美尔两人的系统阐述都代表着对奥尔波特基本原理的真实预见。他们明确地陈述同一思想的部分内容，他们没有充分地使用这个思想以便使之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所接受(尽管齐美尔称之为“一个最具社会学重要性的事实”)，并且，尤有甚者，他们的早期表述在从他们提出到奥尔波特对功能自主作描述之间的这段时期并未得到重视和发展。事实上，如果他们在该间隔期间对其深究下去，奥尔波特也就没有机会来阐述这个原理了；充其量，他只能对其加以扩充而已。

上例提供了一个比喻，说明在思想史上，应怎样适当地对待预见。奥尔波特系统地研究了米尔和齐美尔之后才发现了他们的种种预见，真正的思想史学家马上看出这一紧迫的历史问题：为

① George Simmel, Soziologi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582—3，由Kurt H. Wolff翻译成英文并收入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中(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 380—1。

比起弗洛伊德的"初级群体"术语来说，库利的概念则是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更为适意的温床。①

镜中我(The looking-glass Self)。库利对这个概念的经典性阐述表明：在社会过程中，自我形象通过感知我们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形成。众所周知，由于库利这样告诉我们，这个系统阐述扩展了早期由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所提出的较早的概念 由此，我们看到在理论中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累积增加的一个明显例子。鲜为人知的是苏联最近关于自我发展和社会化的研究来源于马克思的一段话，即理解自我时，每个人都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当这种观点显然尚未传到基辅和安阿伯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采用了镜子的比喻：这个镜子由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所组成，它可以使我们成为自已行为的旁观者。亚当·斯密说："这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用别人的眼光审视我们自已举止特性的唯一镜子。"斯蒂芬(Les-

---

① 人们从库利自己的申辩中了解到，在他的 Social organization 中关于初级群体的讨论仅仅是作为一种启思想 (after-thought) 进行介绍，而根本不是一种创见。注意到该思想和该术语的预见性同时单独讨论的历史学家，是豪斯 Floyd, N. House, 参见 The Range of Social Theory(New York,Holt, 1929), 140—1。库利的传记作家，在库利的申辩文稿中，找到了预见该思想有关历史的重要内容，参见 Edward C. Jandy, Charles Horton Cooley: His Life and His Social Theory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42), 171—82。弗洛伊德使用该术语以及他的概念与库利的概念部分重叠，参见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Leipzig, Wien, Zwrich,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21), 76, as follows: "Eine Solche Primare Masse ist eine Anzahl von Individuen, die ein lind dasselbe Objekt an die Stelle ihr es Ichideals gesetzt und Sichinfolgedessen in ihrem Ich mit einander identifiziert haben" (在书中，所有这些都拉开间隔，以示强调)。因为 James Strachey 在翻译时，把英文的"群体"(group) 用更为便于理解的德语"人群"(Masse) 所取代，本段决无意仿效库利，而意指，"这种初级群体是指那些已经出于自我的理想而取代一个或同一个目标之个人的集合。其结果是在他们的自我中互相了解"，"初级群体"这个术语属于库利，然而对其进行清晰的理论阐述则无疑属于弗洛伊德。

lie Stephen)几乎是用詹姆斯的语言扩充这个比喻，他在上个世纪末写道："我们必须不仅仅考察最初的也要考虑随后的反映；的确，我们必须想象两面相对的镜子以模糊的演替顺序反映各种形象"。表面上看来，以上所述是在相当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对这个思想的多种互为独立的阐述。但是，这些情节仅仅是分析该思想进化的原始材料，而不是该思想偶然发生的多方交织与部分重叠的终点。①

我拿出了许多仓促拼凑的、未加引申的例子，以作为社会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最初发现、预见、预示和虚假预见的引喻，以求说明下列两点：(1)这些概念极易获得，(2)它们容易退化为一种好古主义(antiquarianism)，即根本不推进社会理论史的发展而仅仅是重演古代与现代辩护者之间的争斗，而这些争斗在17、18世纪耗费了人类的大量智能。

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亨利四世》中明显地预见到弗洛伊德有关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和文饰作用 (rationalization)等概念的内涵："哈里，你过去想当父亲，现在你再想想。"

爱比克泰德② (Epictetus)，更不用说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很多其他人，假定性地预见我所描绘过的东西是托马斯的原理，即人们的情景定义影响他们的后果："扰乱和惊吓人的东西不是各

① 库利后来的系统阐述，参见他的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order (New York, Scribner, 1902), 183—4。Jandy 在他的著作(出处同上，103—26) 中，重新对库利的思想进行扩展，然后也对米德的思想进行扩展。在马克思著作中该思想的独立来源为基夫心理学会中的社会心理学家所证明，这些社会心理学家对马克思很了解，但对库利和米德则一无所知(此为1961年我和 Henry Riechen 多次交谈所得)。Leslie stephen 重提了亚当·斯密的隐喻，参见他的History of English Thon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 G. P.Putnam's Sons, 1902, 第三版)，I, 74—75。

② Epictetus(爱比克泰德)——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种事物，而是人们关于事物的观念和想象"。①

萨姆纳(Sumner)明显地预见到李普曼 (Lippmann) 的原型(Stereotypes)概念，他在《民俗论》(Folknays)中写道：很多事情是"原型化了的"。

斯宾塞(Spencer)写道："城市的引力与其质量成正比，而与其距离成反比。"他如此明确地预见到斯托福(Stouffer)的介入机会理论(theory of 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又一种完全是言词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相似性。

哈默顿(Philip Hamerton)在他于1873年出版但早已为人忘却的书中明显地预见到维布伦 (Veblen) 的"训练无能" (trained incapacity)(该术语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所发现、发展和应用)他把"心智拒答"(mental refusals)〔受阻〕(inhibitions)解释为"没有天生的无能，而〔只有〕由于习得的习惯和普通的职业使心智无能"，然后产生一个"习得性不适应"(参见The Intellectual Life)。

米尔(John Stuart Mill)预见到在一般规则中霍索恩 (Hawthorne)效应的特殊情况，而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证实："在实验中，效应不是由于变化而产生，而是借助于这种手段产生变化。然而，这个最后的假定的可能性一般允许由其他实验来进行结论性验证"。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预示了米德(G.H.Mead)"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概念，他在《修辞学》一书中写道："我们

---

① 托马斯和米德生于同一年，在本世纪三分之一的时间内，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种适宜于从事社会学探索的活跃气氛，他俩几乎使用相同的语言来阐述原理——托马斯使用一般的术语，米德采用更为严谨的方式。然而，托马斯说："如果人们把情景定义为现实，那么，在他们的推论中，它们就是现实。"米德说："如果人们认为某种事情是虚假的，那么，它在该社区中就不具备真的功能。"参见，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29.

希望得到其好感的人，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至关重要……等等……。"

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预言的特例在17世纪由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伽桑第(Pierre Gassendi)提出，他认为：占星学关于个人命运的预卜通过对这些个人施加使其振奋或沮丧的效应以获取占星学的名声。

屡见不鲜的例子表明：格言充分抓住了广为接受的社会学思想，一个行为不轨的人接受了被反映的个人形象，结果就会产生反常行为，例如："称一个人是贼，他就会行窃。"

以上这些随手拈来的例子，任何有学问的社会学家都能够随心所欲地生发开去，它们仅仅表明：只要理论思想和经验发现一旦提出，则易分辨出真正的或似乎是的预见和预示。这类特性无助于理解思想的历史发展。象对物理学和生物科学中多元发现的调查一样，富有成果的历史探索需要对早期和后期思想的理论实质进行详尽的分析，以及对有助于认识到思想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各种情况进行详尽分析。这种探索的最好例证是施本格勒(J.J.Spengler)对洛夫乔伊(Lovejoy)的主张所进行的辛勤考察，洛夫乔伊认为：曼德维尔(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1714)中早已充分预见到了维布伦(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所提出的主要思想。① 施本格勒对这两种思想进行了彻底分析，揭示它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以及偶尔的相似性，而不是将表面上的某些类似作为足够的证据。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表明，在后继者们发掘出并加以发展的不同理论推断中，最初的系统阐述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小，却引起

① J. J. Spengler, "Veblen and Mandeville Contrasted",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Zeitschrift des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an der universität Kiel, 1959, 82, 3—67.

后来功能上的巨大差异，结果产生不同的理论推断。

3.预示主义(adumbrationism)

前面论及最初发现、预见或预示的认同已被纳入科学和学术之社会系统的信息渠道；但并未得到尽力发掘。然而，预示主义意味着对科学和学术思想早期的各种观点进行全力的认真研究。在极端的情况下，预示主义者把早期和后期思想之间极为模糊的相似迹象捕风捉影地描述成实际上的同一。

这种激发探索的根源差异很大。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似乎执意证明在太阳之下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这一说法也是对某些学者和科学家展现的人类奇观的真实写照，这些学者和科学家认为：任何有结果的事情，都一定是以前已被发现的；同时，他们每人又都孜孜不倦地探索，试图得到新的发现，以促进其学科的发展。①在另一些情况下，探索为沙文主义式的忠心所激发。当一个新的看法被外籍科学家，或其他学派科学家，或更一般地说为一其他群体的人所提出时，预示主义者们就被激励起来，从与自己学术渊源相同的先辈著作中去寻找一些似乎是预见或预示的东西，以便在该系统内适当地分配荣誉。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探索似乎为对当代发现者的敌意所激励，这些发现者很可能由于他们所宣称的新贡献已被预示而极为沮丧。预示主义在厚古薄今和抑今扬古的言行得以制度化时，会更加甚嚣尘上。②

至于预示主义者的动机是什么，最好能从预示主义的著作中尝试性地推衍出来，并使可观察的模式也与之大致相同。实际

① 象其他人一样，学者和科学家经常从事行为研究，研究拒绝他们正试图主张的假定行为。怀特海谈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行为学家，该学者宣称他的目的在于说明：在人类行为中没有明显的目标。

② "古老派"和"现代派"之间战斗由来已久，且声名狼籍。有关这场毫无意义已转入决定性战争的战斗，我十分熟秀，其报导参见Merton,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不住脚时，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他们又说：该发现都是对的，但这不是哈维的发现，许多人在哈维之前就已经作出了这种发现……正是林登(Van der Linden)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希波克拉底①(Hippocrates)首先宣称……'丝毫不容怀疑，希波克拉底就知道血液的循环！'这是一个语言意向起作用的极好说明，它把词语误认作现实了。"②

预示主义者在人文学科中也起作用，在那里预示主义者得到了一个坏名声 Quellenforscher(即资源猎人)。塞恩茨伯里(Saintsbury)已经发现了一位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兰贝恩(Gerard Langbaine)，《英国戏剧大览》之小有名气的作者。一位英国批评家直言不讳地将其描绘为法国的预示主义者：

> 他读过一些著作并且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发现：一般来说，诗人并不发明他们的诗，在他看来，似乎指出诗人们的诗怎样得来，就是一种胜利。只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妥；它是有趣的，而且无伤大雅。事实上，它经常被弄成有伤大雅，兰贝恩就总是做这种事。……"如果W先生曾戴上了他的眼镜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这早已公诸于众了"。等等，等等……如果但丁(Dante)知道兰贝恩的话我

①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译注

② George Sarton, "Johannes Antonides Vander Linden (1609—1664) Medical Writer and Bibliographer"，载 Science, Medicine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dical Practice, Written in Honour of Charles Singer，由 E. Ashworth underwood 收集整理出版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Ⅱ，15。一历史学家对这种模式进行描述的另一例证见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00—1800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4)，255 页及其后各页，书中简述：牛顿的光学理论以与其他理论大致相同的步骤得以承认。

动摇于我们前面描述的有关社会学是怎样发展的两个基本假设之间：一方面是预示主义；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发展的境况，通过偶尔的新取向，通过在这些取向的指导下在探索中获得知识的增加——有时也包括汇编成册的最初发现、预见和预示。

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在他的鸿篇巨著《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ory Sociological Theories)① 中，充分地讨论了最初发现、预见和预示等事项，该书自第一版后四十年来历久不衰。恐怕没有其他社会学理论史学家有这样专注与持久。该书以社会学思想学派为结构主线，把当今的社会学与过去的社会学联结起来，并以每一学派的先驱人物展开说明。可能因为它以不同的详略程度论及一千多个人物，在鉴别早期和后期的思想时，该书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标准。

索罗金在该书中有一个极端的观点，即断言：古代的著作——如，《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论语》、《庄子》等等——包括了当代社会学和心理学学说中的"所有精华"，于是人们把后者称之为"纯粹的重复"或说是除了重复以外什么也没有(参见该书第5n，26n，309，436—7页)。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性是指早期经典著作的某些地方提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因素，而后来的著作也讨论了这些因素。例如，《圣书》"强调种族、选择和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P.219)；也强调这个"事实"，即自从太

(接上页注) to Science (Washington：Harran Press, 1952, 2nd ed.); Charles P. Loomis and Zona K. Loomis, Modern Social Theorists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1961); Harry Elmer Barnes,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Lewis A.Coser and Bernard Rosenberg,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2nd ed.).

①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28.

古以来，思想家都知道在人类行为、社会组织、社会过程中‘经济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第514页)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一个思想学派太陈旧则产生厌恶。然而，理应被称之为新的规范学派如齐美尔、滕尼斯(Tönnies)、威斯(Von Wiese)却被说成是“很古老的学派，甚至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派更古老”(第495页)；经济学派——主要是指有争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被描绘为“象人类思想本身那样古老”(第523页)；而心理—社会学“理论也许是社会理论最古老的形式，这些理论主张：信仰，特别是迷信或宗教信仰是人类命运中最起作用的因素”(第662页)。

另一方面，在索罗金的书中还有一种观点：后来的著作显然是发展了古老的思想，它们不“仅仅是重复”。下列这种矛盾心理的观察表明了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末的社会学家中，既不是孔德，也不是威尼阿斯基(Winiarsky)，也不是其他人能宣称有创立以上或实际上任何其他理论的特权，他们一直在发展许多世纪以前的东西，甚至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第368 I 页)。他还说：几乎象当代所有的社会学体系一样，社会学派都是在遥远的过去所创立的。自从那时以来，学派、体系虽然千变万化，但纵观社会思想史，各学派的基本原理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第437页)。

这种演变的观点允许在社会学思想史中出现新的明显的分离。这样，罗伯迪(E.De Roberty)被说成是社会学“最早的先驱者之一”(第438页)；科瓦里伍斯基(Kovalevsky)比洛威亚(Lovia)“早三年独自建立了他的(人口学)理论”(第390n页)；杰出的塔德(Tarde)“留下了很多新颖的计划、思想和理论”(第637页)；最近有关公共舆论的研究“已经将我们关于现象的知识澄清到一个可观的程度”(第706页)；吉丁斯(Giddings)是“美国社会学和世界社会学的先驱”(第727n页)；作为积累性发展的最后一例，“社会

心理学……用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得到扩展，而在当前，我们正开始第一个尝试，以建构一个普遍的，而且是真实的社会流动理论"(第748页)。

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发表三十多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其姊妹篇《今日社会学理论》①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书中区分古老和最近理论之间类似程度的趋向尤为明显。一些在早期著作中被描述为最初发现的东西现在实际上被当作了预见；而先前被认作是预见的东西，现在被说成是预示。这部新作象它的姊妹篇一样具有强硬的批判精神。尽管偶尔有违宗旨，它仍然使人感觉到理论在成长和发展。下面两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状况。

(1)施本格勒(Spengler)和达尼列夫斯基(Danilevsky)：从最初发现到预见

半个世纪之前，施本格勒的理论就被预见到了。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施本格勒的工作确实是利昂第也夫(Leontieff)和达尼列夫斯基的社会推测的纯粹重复（因为达尼列夫斯基先于利昂第也夫四年提出他的观点,一般也假定利昂第也夫的工作也是"纯粹的重复")(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第26n页)。

作为一种"纯粹的重复"，施本格勒的研究就会显得肤浅，而与先驱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索罗金后面的看法却与前述观点大相径庭：

> 施本格勒于1918年发表的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西方之衰落》)已经证明：该书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文化社会学、历史哲学和德国哲学诸领域内最有影响、最有争议、最为持久的杰作之一。虽然《西方之衰落》(The Decline

① New York：Harper & Row，1966。

of the west)① 的整个特点不同于达尼列夫斯基的研究成果，然而，它的基本概念框架在所有重要方面都类似于达尼列夫斯基的结论……施本格勒对这些转换(在社会形式和社会系统的循环中）予以详细分析的很多篇章是新颖、深刻和经典的……尽管有种种缺点，《西方之衰落》也可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著作而长存于世。(Sociologicol Theories of Today，第187，196—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先驱者：从预示到预见

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理论的内容及其首创性来说(并不是出于马克思的实际影响)，现在……似乎不可能宣告：马克思给这个领域添加了任何新的观点，或者对在他之前就已存在的思想给予了一个新的和更为科学的综合。(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第520n页)

在其早期著作中，索罗金不断重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具体思想的综合都没有丝毫的首创性；然后他以预示主义的经典信条对其下结论：

首先，从纯粹的科学观点来看，就其基本原理而言，他们的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前人所没说过的；第二，真正有独创性的东西则谈不上什么科学性；第三，该理论的唯一优点是：以略微强硬和夸张的形式，概括了马克思之前的各种思想……甚至没有理由把他们的科学贡献看作出类拔萃。(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第545页)。

在他后来的著作中，索罗金虽仍然对马克思的理论持激进的

① 《西方之衰落》的英文版发表于1926年。——译注

批评态度，但是，他也认为，它并不是一无是处。① 他乐于给它一个显要的学术(不仅仅是政治)地位。

>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文化关系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他们对二元理论(the dichotomic theories)的经济变体提供了新的生命和充分的发展。最近，几乎所有诸如此类的各种理论只不过是马一恩这种划分的翻版和阐释……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是所有现存的其他晚期理论的原型(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第289，296页)。"

如果索罗金的后一部著作是一个典范(archetype)，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思想发展中对各个概念的逐渐明确，这样大有好处。如果摒弃预示主义，社会学家将能自由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确定具体的方面，在这些方面，新思想建立于旧思想的基础之上，以便分析社会学知识的连续性特性和条件。

四、社会学的人文主义和科学方面

人们经常注意到伟大的古典作品之科学取向和人文主义的取

①马克思关于科学和思想的历史发展理论假定：任何现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如马克思在区分早期的思想内核与自已的增加部分时所表述的那样："……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写给Joseph Wedemeyer的信，载《马克思选集》Selecled Works (Moscow：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1935)，I，377。我们无需按表面意义来接受马克思的自我评估，因为其中对未来的雨点推测还有待商榷，正如后来索罗金所证实的，马克思的贡献远远不只是社会阶级理论。马克思和索罗金都试图对纯粹的重新发现和促进知识的分析或综合性增殖作出区分。

间之间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源于选择性积累方面的深刻差别。这发生在文明(包括科学和技术)和文化(包括艺术和价值结构)的選择性积累中。① 在更为精确的科学中，知识的选择性积累意味着：过去的天才人物或极为聪明的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大都在后人的工作中才得到长足的发展，而这些后人并没有象他们的先驱者那样卓绝的才能。

对真正积累性知识最严格的检验是：才智平庸的人能够解决当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伟大人物当时所不能够解决的。一名数学专业的大学生知道怎样去认识和解决莱布尼兹、牛顿(Newton)和柯西(Cauchy)曾无能为力的问题。②

在更为精确的科学中，由于非常遥远之过去的理论和发现大量地结合进积累性的现有知识，因此，人们对过去伟大贡献者的

---

① Alfred Weber 就曾强调社会过程、文章过程与文明过程三者的区别，见 Alfred Weber, "Prinzipielles zur Kultursoziologie, Gesellschaftsprozess, Zivilisationsprozess und Kulturbewegung,"载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20, 47, 1—49。类似的分析见 R. M. Maciver, Society: 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 (New York: Long & Smith, 1931), 225—36以及后来的讨论 R.K.Merto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载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1-12, 1936, 21, 103—113。将理论史和理论分类相混合之倾向的说明，见下例著作中对 Herder, Humboldt, Guizot, E. Du Bois-Reymond, Wundt, Ferguson, Morgan, Tylor, Buckle, Gothein 等人所使用的"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的简要评论：Paul Barth,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bbe als Soziologie (Leipzig: Reisland, 1922), 597—613; H. S. Stoltenberg, "Seele, Geist und Gruppe", 载 Schmo Hers Jahrbuch, 1929, LV, 105 及其后各页；R. Eucken,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Grundbegriffe der Gegemvart (Leipzig: 1878), 187 及其后各页。索罗金在其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 一书中的第十章对这一分析框架作了批评性评论。

② Charles C.Gillispie, The Edge of Obiectivity: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Id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8……每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所知道的物理知识都比伽利略要多，但是，享有创立现代科学之誉，非伽利略莫属，每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物理知识也比牛顿懂得多，但唯有牛顿具有向自然界进军的杰出才华。

纪念实际上被保存在所属学科的历史中。在科学家们的工作台上和在他们的论文中，他们主要利用最近的资料，即利用那些在早期发现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的资料。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由于结合进后期的研究成果，较早的和通常是更有份量的科学贡献通常为以后的工作所湮没(虽然并不是没有偶然的例外，有时或者是显著的例外)。

在人文科学中，通过直接的对比，每一经典作品——每一首诗、戏曲、小说、散文或历史著作——趋向于保存若干代人文主义者直接经验的一部分。正如普赖散(Derekprice)以一种有启发的形象比喻所说的："科学的累积结构具有象织物那样的短距相连的组织，而人文主义学术领域的组织是一个较为随意的网络，好象它的任何一点都与任何其他点发生联系"。① 简言之，在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中，直接精通经典著作的作用甚小，而在人文学者中则作用甚大。

另一位科学信息系统的学者凯斯勒(Kessler)故意用挑衅性的语言——如果不是令人恼怒的语言——指出了这一点。

> "除了历史原因，即使是科学文献的杰作，到一定的时候也将变得毫无价值，这就是科学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基本差别。例如，一位严肃的英国文学的学者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米尔顿(Milton)和司各脱 (Scott) 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位严肃的物理学家完全可以不读牛顿、法拉第 (Faraday)和麦克斯韦(Maxwell)的原著"。②

凯斯勒的话在于激起读者为之不平。的确，从人文主义和科

---

① Derek J. de Solla Price,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Science Policy", 载 Nature, 1965年4月17, 206, No.4981, 233—8.

② M. M. Kessl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flow patterns", 载 Proceedings, Western Joint Computer Conference, 1961年5月9日, 247—57.

学史的观点看，这种说法只是当今不规范语言的一种表述。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要对两种兴趣（interest）进行区别是困难的：一种是进行科学的开创性工作的历史性和纪念性兴趣；另一种是促进当代科学发展的兴趣，即促进那些几乎不需直接研读牛顿的《原理》或拉瓦锡的《论著》的当代科学发展的兴趣。然而，当代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马克斯·韦伯雄辩地提出了与凯斯勒相同的观察，韦伯以拟人化的语言描述科学中合作和扩展的主要过程，他观察到：

>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科学中，一个人所致力的工作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即为陈迹。这就是科学的命运；这就是科学工作的真正含义，比较起其他有着永恒主题的文化领域来，应该给科学工作以一个特别的观念。每一科学"成就"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它要求不断地新陈代谢。不管谁希望献身于科学，他都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若科学著作具有艺术价值而使人们感到"愉悦"，那它们肯定能够持久，或者它们可以作为训练手段而得以保持其重要性。但这样，它们将不再被称之为科学——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命运，进一步说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在工作中不得不持这样的信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般说来，这种进步不断进行乃至无穷。①

介于自然科学家、生命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之间的社会学家，在确定他们对古典贡献的取向中，他们承受着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s），而且并不能愉快地胜任韦伯所提出的使命。只有少数社会学家适应这些压力，他们完全依照韦伯所设定的科学

---

①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 in Sociology, H. H. Gerth 和 C. Wright Mills 翻译和编辑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38; 摘录引自韦伯长期以来雄辩的主张"科学是一种职业"。

角色或者人文主义角色而行事。也许大多数人在这两者之间左右摇摆，而有少数人试图将它们结合起来，这种在科学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之间摇摆的骑墙态度往往导致社会学理论的分类学与社会学理论史的混同。

社会科学在知识积累上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所谓的引证研究(Citation Studies)戏剧性地证实了这一断言，这种研究只是对几个领域所引用的出版物资料的发表日期之分布进行比较。这样的研究结果明显地一致。在物理科学中——其代表性刊物为《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和《天体物理杂志》(Astrophysical Journal)——大约有60%到70%的引证材料来自最近五年所出现的出版物。在人文科学中——代表性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艺术论坛》(Art bulletin)以及《美学和艺术批评杂志》(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ficism)——相应的比例只有10%到20%。社会科学介于这两者之间——其代表性刊物，如《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以及《英国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其中有30%—50%的引证材料来自最近五年的出版物。① 对

① 我非常感谢 Derek J. de Solla Price 提供给我他从不同领域的154种杂志上收集起来的资料，大量的引文研究包括：P. E. Burton and R. W. Keebler, "'Half - life' of Som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s", 载American Documentation, 1960, 11, 18—22; R.N.Broadus, "An analysis of leiterature cited in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载Am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2年6月号, 17, 355—6 and "A Citation study for sociology," 载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67年2月号, 2, 19—20; Charles E.Otgood and Louis V. Xhignesse. "Characteristics of bibliographical coverage in psychological journal published in 1950 and 1960",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3年3月。有辨别的引文研究必须能区别用于研究的引文和作为原始资料的引文——如历史文献、诗歌、和人文学家进行批判性重新考察的其他古代文献。

引证模式的其他研究表明，这些研究结果在它们的主要方面有代表性。

在某些方面，社会学采用自然科学的取向与做法。在那些由过去若干代人进行积累工作所推的前缘地区，经验研究非常活跃；就此而论，社会学确实是历史的短视，偏狭而过于实际。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学与人文主义保留亲缘关系。对于那些社会学和前社会学(Pre—Sociology)的经典著作，如果放弃对它们的直接了解，并放弃将其作为社会学家知识整体的一部分，则难以差强人意。任何一位有社会学造诣的当代社会学家都要直接和反复地与先驱者们的著作打交道，如孔德、马克思、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帕累托、萨姆纳、库利和维布伦以及在当今社会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的那些声名稍逊的有识之士。我不愿在发现一些基本的原理之前失去了解经典著作的机会，今后我将一如既往，这可能就是我思索它的特性和渊源的充分理由。

五、博学与创见

社会学家与他们先驱者的著作相亲和，这不足为奇。不同血统的近期成员与先前社会学理论所发生的联系，有一个直接程度的问题。而在对于那些很多先驱者们提出过但现在仍未解决的问题之认识上，现行理论与之有一个共鸣程度的问题。

然而，对过去之经典著作的偏爱在思想史上也导致学术上的退化趋向。第一，对几乎所有名家的思想盲从，这种情况经常可以在对名家思想之虔诚的，然而对于科学来说是僵化的评注中见到。正是对于这种做法，怀特海在本章卷首格言中指出：“一种跟在先驱者后面亦步亦趋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等二种退化是庸俗化。真理若老是被那些并不懂行的人简单地重复，并且往往是滑

稽可笑的模仿，它就会变成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例如，人们经常肯定地说：迪尔凯姆通过将他的强制(Constraint)概念发展为各种社会事实的一种特性，而在社会生活中赋予强制概念一个重要的地位。〕庸俗化是窒息真理的优良武器。

简言之，研究经典著作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获益匪浅。这主要取决于研究所采取的形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取纯粹的评注或将其庸俗化这种毫无生气的做法；另一种是积极探索和不断发展杰出先辈们的理论提示。正是上述差异使得科学家们在广泛阅读过去的著作时，具有一种矛盾心理。

科学家的这种矛盾有其历史根源和心理根源。近代科学伊始，有人主张：为了通晓往事、分辨良莠，科学家应该了解其先驱者的研究工作，甚至最激烈的反烦琐哲学的预言家培根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希望研究某一事物，他必须首先了解在他之前关于这个问题别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他才开始作研究计划……。"① 在科学论文中，这已成为一种规章化的格式，它要求对所研究问题的有关理论和调查给予总结。这样做的理由很清楚：不知道过去的研究成果，常常使得科学家去发现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索罗金举例说明：

> "不知道某些理论早已为人所提出，或者不了解某些问题被很多先驱者认真研究过，社会学家则极易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去发现一个别人早已发现的社会学的新美洲。这样的社会学家必须经历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所有艰辛，而不是先花很短的必要时间研究前人所做过的事，因而得以轻快地横越科学的大西洋。只是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才发现他的工作早已为别人做过了，因而他付出的艰辛毫无

① Francis Bacon, Novum Ocganum (London: Ceorge Routledge & Sons, n.d.)Aphorism LXXXII, page 105.

价值。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一位学者来说是一种悲剧，对社会和社会学来说是人才的浪费。"①

在科学的其他领域，经常有这种类似情况。物理学天才麦克斯韦(他对当时的社会科学有浓厚的业余兴趣)在他的科学生涯中很早就提到："我已经谈了很多有关光学的旧著，从中发现了很多比新提出的见解更好的东西。不少外国数学家正在探索各种方法，而这些方法1720年在剑桥大学就为人所熟知，只是现在已被人忘却。"②

因为在科学中，探索先前文献的方针和部分做法早就已成惯例，因此无须再对它三令五申。但是，需要作相应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了解科学家在博览群书问题上的矛盾，那么，对于那些还几乎无规律可循但经常为人所涉猎的事情需要作很多分类整理工作。

至少已有四个世纪之久，科学大师们一直提请人们注意所谓博览群书的危险。这种态度的历史根源起于反对评论家和注释家的繁琐哲学的论战中。因此，伽利略吹起了嘹亮的号角：

> 一个人若老是盯着别人的著作，在认识已有的真理和探索无数有待发现的事物时不抬起自己的头看看大自然的著作，那他永远也成不了哲学家，而只能是哲学家的学生或者本行的一位专家。③

哈维 (**William Harvey**) 响应了这种思想(用一种使麦克斯韦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来表达，麦克斯韦本人也陷入对博览群书的矛盾心情之中)：

---

① Sorok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xviii—xix.

② Lewis Campbell and William Carnett, The Life of James Clerk Maxwell(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84), 162.

③ Le Opere di Galileo Galilei, Edizione Nazione(Firenze: Tipographia di G.Barbera, 1892), Ⅱ, i.395.

> 无论是谁阅读其他作家的著作，而不开动自己的脑筋从中揣象出事物本身的真正意义（从作者的表述中所理解到的），他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思想，而只是引出一些虚假的偶像和幻觉；这意味着他们为自己生造了一些幻影和怪物，而他们的理论和计划(他们的所谓科学)只不过是白日梦话和病人的狂言。①

有时，一些人把在博览群书问题上的矛盾看成是致力于学习与从事开创性科学工作之间的一种选择问题。十七世纪末，一位仅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科学的古人辩护者坦普尔(Temple)蓄意讽刺挖苦现代人，其理由是：

> 如果这些看法是真的话，那么我不明白，我们能赋予现代知识什么优越性，我们的一切都承自古人；不仅如此，现代知识对人们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把现代知识强加于人，只会压制天才的出现，妨碍天才的成长；现代知识会使人们没有足够的自己的见解与前人一竞短长……而且，谁能说清：学问是否不会削弱一个具有极高天赋的人的创造能力，又有谁能说清，如此多的思想和观念之重荷不会压制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或妨碍它们的活动和传播，从而失去进行发明创造的条件。②

坦普尔对科学家极不了解，他所认为可笑的东西，已被后来的伟大科学家们作为一种非常严肃的工作来进行。他们用下列话语表述了对于博学的矛盾心情，例如，伯纳德(Claude Bernard)认为：一位献身科学的人必须了解他的先驱者的研究成果。然而，他继续说："即使是很有用的科学文献……也不必读得太多，

---

① Campbell and Garnett，出处同前引书，227。

② Sir William Temple's Essays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由J.E.Spingarn编辑(Oxford：Clarendon Press，1909)，18。

以免它们使大脑僵化、窒息发明和科学创见。发掘那些年深日久的理论和未曾使用适当调查手段而进行的观察，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一言以蔽之，"充满谬误的博学一直是（而且现在仍是）实验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①

伯纳德颇有气度地、较为轻易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其方法是：有选择性地阅读与自己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直接有关的一些著作。象伯纳德一样，数学家利特尔伍德(Littlewood)对处理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他的方法是：首先尽力发掘自己的思想，再去检索已有的文献。然后才发表自己的结果。②在这样做的时候，伯纳德和利特尔伍德实际上是回到了早期学者和科学家所提倡的做法。③

---

① Claude Bernard, An Lw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New York:Henry Schuman, 1949; 1865年第一次印刷出版), 145, 141.

② J.E. Littlewood, A Mathematician's Miscellany (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 Co., 1953), 82—3."这无疑是个有效的措施，我就是常常不从过多的文献研究开始."Charles Riche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Savant, 由 Sir oliver Lodge 翻译(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7), 43-4, 书中这样叙述这一措施："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可能过于熟悉他人的著述，已难以保持真正的自我。也许，在对有关的文献目录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最好永远不要公布一项实验，在实验之前，最好不要让自己纠缠于过多的信息。"

③ E. Bernard 博士在1671年4月3日致 John Collins 的一封信中写道："书籍和实验可以相辅相成；而一旦分开，则暴露出彼此的缺陷，因为古代的劳动者往往不自觉地忽略书本知识，而学者不是被科学实验而是被假话所欺骗。"参见 Stephen Reter Rigaud 编辑的 Correspondence of Scientific Men of the 17 th Century (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41), I, 158. 有关博学与个人观察的相互作用，见十七、十八世纪的物理学家 John Freind 所说："每一个物理学家都要，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事物，但若同时比较一下所读过的书籍和所看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会做出公正的观察和判断。因而在探索和研究前人的观点和方法时，有效地采用和适当地改进某些观点或方法，既不会有损于个人的理解，也不会束缚个人的天才发挥。尤其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进行判断，都无需过分地深究他人的见解，只需知道这些见解符合理性，能还原于实践。所以，任何人都不必担心自己的睿智会因为阅读书籍而变得困惑，以致误入歧途。"见 History of physics (London, 1725—6), I, 292.

人孔德也是一个典型。十二年间，孔德致力于写作《实证哲学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他遵循"大脑卫生学原则"(Principle of Cerebral hygiene)——除了自己的思想之外，他把所有东西都清除掉，其方法很简单，即不读任何东西，甚至与自己的主题不甚相关的东西也不读。他在给约翰逊(A.B.Johnson)的信中得意地说道："对于我来说，除了古代和现代伟大的诗作以外，我什么东西也不读。大脑卫生对我极为有益，特别是为了保持我独特的静思默想的创见。"① 因此，我们发现孔德对社会学的历史和分类学作了最终的区分(然而，达到这种极端是荒唐的)；作为一位科学史学家，他试图通过阅读相当广泛的经典著作来重视科学的发展过程，而作为社会学理论实证体系的创始人，他对直接先辈的思想也不予理睬——对他以前的导师圣西门的著作也是如此——以便获得独特的创见。

如上所述，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有关博学和创见之间的对立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自从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提醒人们注意：博学常常只是鼓励对早期著作进行烦琐的评论，而不是促进人们从事新的经验调查，他们还发出警告：过深地卷入早期的思想会产生僵化的头脑，这只能阻碍创见。但是尽管有如此的风险，大多数科学家为促进科学的发展，一直将博学和有创见性的探索结合起来，所采用的办法是：仅仅阅读在他们之前与他们的问题直接有关的少量研究，人们认为：这些研究把过去累积而成的有关知识都包括在内；他们所采用的另一方法是：发现已有探索已到某处截止之后，他们再查询更久远的资料。然而，从先辈思想的束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极端行为——就象孔德所做

① 该信寄给 Alexander Bryan Johnson，发表在他有名的 Treatise on Language 新版上，由 David Rynin 编辑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59)，5-6。

经典理论的引证具有各种功能范围所证明。

所谓引证既不是指对经典著作的评论也不是借助权威去建立流行观点的信誉。引证表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我们先辈的思想之间的亲和之处。不止一位社会学家有过这种令人沮丧的经历，即发现他们的独立发现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重新发现，并且，更有甚者，他发现表述经典的最初发现所使用的语言是如此简明、如此雄辩或如此蕴含深远，相形之下他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二流货。在此为自己的发现已被他人捷足先登而痛苦和为其早期阐述的完美而高兴的矛盾状态中，他就引用这种经典思想。

当读者在早先的著作中发现了恰恰是自己脑子里早已思考过的东西，这时他去引用古典著作就不会发生多少偏差。这个也隐藏在其他读者头脑中的思想之所以能得到精确的引证，是因为它与读者原来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人们常常认为，引证一个早期史料一定意味着引言中的思想或发现必定是在读到它时才第一次出现在读者头脑中。然而事实常常表明，人们之所以注意到这个早期片断，仅仅是因为它与读者早已独自发展的思想相吻合。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似乎是不可能事情：一种死人与活人之间的对话。这些与当代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并无多大差别。在这种对话中，当他发现对方对自己原来孤芳自赏的，也许甚至是遭到怀疑的思想持赞同观点时，彼此都感到愉快。他人在书面上或在谈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时，这些观点就显示出新的效度。从书面上看到一种观点的优越性在于，人们得以了解到，在这本书或文章与自己同一观点先前的表述之间，没有无意的互相混杂。

社会学家也以另一种方式与经典思想进行“对话”。当代社会学家在阅读经典著作时，经常对他已经视为完善的观点提出质疑。随后的反映是清醒的：首先他重新考虑他的观点，以反省他是否可能搞错了；如果他发现被质疑的观点确实有缺陷，那么就

这种不遗余力的方式为真正有献身精神的学者所采用。威尔逊(Edmund Wilson)形容这种人的专心程度为：敲门声打断了他的工作，他打开门，扼死站在门旁的陌生人，然后继续工作。

若对重新阅读经典著作潜在的创造性功能进行一次非正式检验，我们仅需检查一下我们在以前读过、若干年后又重读的经典著作中所作的旁注和笔记。如果读过第二遍对该书并无新发现，那我们就面临学术上的严重停滞，或者该经典著作没有如我们所想象那样的学术深度，或者两种扫兴的情况兼而有之。

单个社会学家所熟悉的学术生活经历能够在若干代社会学家中流行。因为当新的一代积淀了他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对新的理论问题较为敏感时，他就会逐渐在早期著作中看出更多"新"东西，然而，这些著作通常是以前被考察过的。关于重读旧著还有很多话要说——特别是在不完全稳固的学科，例如社会学——只要这种研究不只包括不动脑筋的模仿(平庸之辈以这种模仿向巨著顶礼膜拜)。用新的眼光重读旧著使当今社会学家发现新的想法，而这些新想法在他们的最初研究过程中显得模糊不清。其结果，社会学家们将旧的、不完善的洞察力与新的、正在发展的探索结合起来。

除了出于撰写社会学理论史的目的阅读大师们的作品之外，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再学习还具有其他种种功能，例如，其一：从中发现有美感和与自己的观点相吻合的思想而享受直接的快乐，由于自己独立证明这些伟人们的观点而感到极大的满足；其二：发展对社会学著作高水平鉴赏力的教育性功能；其三：在当代知识背景中学习旧著以促进新思想的互相影响。每一种功能都是由于对过去社会学理论的回溯不完全所致，过去的社会学理论尚未被完全吸收进后来的思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必须更多地致力于了解与我们相距不是太远的经典作家们，而不能象自

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中的同时代人那样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想有效地而不仅仅是虔诚地使用早期理论的系统阐述，不仅仅是简单地评价它们，那么他们必须将烦琐的评论和注释与扩展前人理论的科学实践活动区分开来。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必须把发展社会学理论史和发展它的流行分类学的不同任务区别开来。

第二章　论中层社会学理论

一、概　　说

若随意摆弄众多的词语，那么，这种由词语堆砌而成的理论势必毫无意义可言。因为，社会学理论有着如此不同的所指对象，从微观的操作性假设(Working hypotheses)，到模糊杂乱的全面推想，以及公认的思想体系，所有这一切都包容在内。理论一词的滥用往往不仅不能有助于理解理论反而使理论更加晦涩难懂。

本书中，社会学理论一词是指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这一章着重讨论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大批涌现的微观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①，也不是一个包罗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成体系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②。

---

① "操作性假设类似我们经常运用的常识性程序，当我们遇到某些事实以及对它们的其他解释，于是就对它们进行验证"。引自 (James B. Conant, On Understanding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 年，137页。

② 这一讨论吸收并发挥了帕森斯在1949 年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宣读的"论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一文的评论，(该文的摘要发表在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9年13期，164—168 页)；同时进一步讨论了 R.K.merton, "The role-set: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载 The British Journal of (接下页注)

社会学中的中层理论主要用于指导经验探索。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远离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已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而对于特定事件的详尽而系统的描述又缺乏整体的概括性，中层理论则介于两者之间。当然，中层理论也具有抽象性，但它非常接近各种命题中的观察资料，而这些命题是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中层理论正如字面上所表明的，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人们讨论参考群体理论，社会流动理论，角色冲突理论，以及讨论社会规范的形成理论，就如同讨论价格学说、病源学说及气体动力学说一样。

诸如此类理论的萌芽思想常常特别简单，例如：吉伯特（Gilbert）的磁学、波义耳（Boyle）的大气压力学说、达尔文（Darwin）的珊瑚环礁构成学说都是如此。吉伯特的研究是从把地球看成一个磁体的简单设想开始的，波义耳把大气看成一个空气的海洋，而达尔文则把环礁看成滋生在很久以前沉入海底的岛屿上的珊瑚。每一种理论都提供了一个设想，都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推理，例如，如果大气是一个空气的海洋，那么，帕斯克尔（Pascal）就推论出，山顶的气压应小于山底。因此，最初的想法只提供特定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必须通过考察它们的推论是否为经验所证实来检验。而该想法本身是否成立要看其在理论上和假设的范围内能不能使人们确认大气压力的新特性。

同样，参考群体和相对剥夺理论也起于简单的观念，即人们往往把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标准作为自我评估的基

（接上页注）Sociology，1957年8期，106—120页，见其中108—110页）。参考R.K.默顿R.K.merton为Allen Barton, Social Organization under Stress: A Sociological Review一书所作的序言。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63年17—36页，见其中24—36页。

础，这一简单设想始于詹姆斯(James)、包尔文(Baldwin)，米德(Mead)后由海曼 (Hyman)、斯托弗(Stouffer) 予以发展。从这一设想得出的一些推断与常识是不吻合的，例如，从常识上讲，一个家庭在一场大灾难中经受的实际损失越大，它所产生的剥夺感就越强烈。这种信念出自未经检验的假定，认为客观损失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主观对损失的评估，而这一评估又局限于个人的经验范围。而相对剥夺理论把人们引向一个截然不同的假设——自我评估依赖于人们把自己的处境与那些可以与自己相比的其他人相比较。因而，这一理论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若损失严重的家庭把他们的境遇与损失更为惨重的家庭相比，他们所产生的剥夺感可能比损失轻微的家庭还要小。例如，尽管处于深重灾难中的人们自身的确产生一种剥夺感，但他们往往更易于发现周围有损失更为严重的人。经验探索证实了相对剥夺理论，而不是常识假定，即"相对幸运感是随着别人的客观损失逐渐增大而递增的。"正是由于大众传播侧重于让"极限受难者成为其它受难者可以相比的参照团体"，这种相对剥夺的自我评估方式得以加强。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些自我评估模式反过来又影响幸存者所在社区的道德信仰和幸存者帮助他人的动机①。因而，在特定的行为中，相对剥夺理论指导我们作出一组可以接受实验检验的假设，简单地说，确定的结论就是，当几个人受害程度相等时，每个人的痛苦和损失似乎都很严重，而当许多人受害程度大大不等时，即使受害严重的人，只要与受害更为严重的人相比，再大的损失也感到小多了。能否相互比较取决于损失大小的可见度。

特例不应掩盖中层理论更为一般的特点。显然，人们面临重

① 巴顿(Barton)，同前引书，62—63，70—72，104页和引言24—25页。

大灾难的行为表现只是参考群体理论应用到特定情况下加以说明的无数例证之一，如社会分层变迁理论、权威论、制度互赖理论以及失范论一样。同时，我们还应当清楚，尽管一旦中层理论得以发展完善，可能与某一综合理论相吻合，但至今中层理论在逻辑上还不是源自同一包罗一切的社会体系理论 此外，比起纯粹的经验概括——两个或更多的变量之间关系一致性构成的独立命题来，中层理论范围要广，程度要深。而一个理论仅包括一组能推导出经验概括的假定。

在社会学领域，中层理论的又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它的特性和用途。角色丛（rolesets ）理论① 开始于一个在社会结构中社会地位如何排列的设想，这一设想如同波义耳想象大气是一个空气的海洋，吉伯特想象地球是个磁体一样简单。然而，象所有的中层理论一样，证实这一设想不在于我们是否能迅速辨认出萌芽设想是一目了然，还是失于怪异，是源自一般理论，还是只涉及特定的问题。

社会地位这一概念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但历来社会学一直用它来指社会体系中具有明显特定权力和义务的地位。以此类推，正如阿尔弗·林顿（ Ralph Linton ）所示范说明的，社会角色概念就是指地位占有者的行为，其他人赋予某种社会角色模式化的期望(权力和义务)。阿尔弗·林顿，象遵守这一传统解释的其他人一样，继而阐述了早以得到承认的基本观察结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占有多种地位，而每一种地位都有其相关的角色。

正是在这一点上，角色丛理论的设想与长期以来的传统解释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一开始是微小的，有人甚至认为不值一

---

① 下列数页引自默顿"The role-set"，见前引书。

提出可供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各种问题。事实上就是这样①，它首先提出确定各种社会机制的一般性问题——即社会过程表明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外显结果，社会机制协调角色丛中的不同期望，以减少角色冲突。此外，角色丛概念进一步引起了对社会机制如何形成这一问题的探讨，以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机制在一些社会体系中不能起协调作用，或根本不可能出现 最后，如同大气压力学说，角色丛理论直接指导着相应的经验研究，有关各种正式组织运行状况的专题论述已经发展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以说明角色丛的实际情形②。

角色丛理论阐明了中层社会学理论的另一特点，中层理论往往与称之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某一派别的观点相吻合。正如人们所说，角色丛理论与大的理论取向是一致的，如：马克思主义、功能分析学说、社会行为主义、索罗金的整合社会学和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对于我们这些历来认为社会学思想体系应是一组逻辑严

---

① 这一观点的早期论述，参考默顿" The social-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anomie, "载(Helen L. Witmer和Ruth Kotinsky) 编辑的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Juvenile Dilinqnency，这篇报告在有关犯罪社会学、犯罪精神病学某些概念相互关系的讨论会上宣读，会议于 1955 年5月6—7日召开，Washington, D.C.U.S.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24—50页。见其中47—48页。

② 如果我们从科学发展动力的角度来判断，(在本书前面已经做过简介)处于科学研究前沿的中层理论特别易于成为多元和似乎是暂时发现的产物。角色丛的核心思想在重要的经验研究中独立地得到发展，见 Neal Gross, Wards. mason and A. W. mc Eachern的重要经验论著Explorations in Role Analysis ; Studies of the School Superintendency Rol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8年伴随实际调查而发展起来的重大理论可参考下列著作：Robert L Kahn等著的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4年 13—17 及后诸页，Daniel Katz and Robert L.Kah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1966年172及后诸页。

谨相互独立的命题的人来说，这可能令人不能容忍，在本书中，我们将要看到综合性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实际上是结构松散、内容各异并部分相互重叠的。正是这一点使现存的可以接受经验验证的中层理论可以归属于自身还存在着差异的不同的综合理论之中。

只要我们把角色丛理论作为一种中层理论重新进行一番研究，我们就可以为这一合理的观点提供例证。首先，我们与传统概念的分歧开始于假定一个社会地位不只包括一个角色，而是联接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一组相关角色。其次，角色丛这一概念引起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问题、假设以及经验探索。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确定协调角色丛、减少角色冲突的社会机制。第三，角色丛这一概念使我们注意到认识的结构问题，即鉴别社会布局如何综合与离散角色丛中各成员的不同期望。另一方面，角色丛概念使我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到一个不同的但同样重要的问题上：一个拥有各种地位的人是如何应付各种地位对他们的不同要求，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局面的？第四，角色丛概念使我们进一步注意到社会机制是怎样形成的，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使我们能够解释许多角色丛未能有效运行的具体实例。(假定所有社会机制有正功能，与生物进化论假定不存在反功能的发展相比，两者有所区别）最后，体现在中层社会学理论中的分析逻辑主要依靠对社会结构要素进行研究而得到发展，而不依赖对特定社会体系的具体历史性的描述。因此，中层理论使我们摆脱了阻碍我们研究工作的理论冲突，这些冲突存在于综合学科与分支学科、一般与特殊、一般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循环论之间。

总之，角色丛理论造成一个明显的研究趋向：区别角色丛各个不同的角色期望，以找出适合本地位的适当行为。冲突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社会结构中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都期望维护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各种一般理论，如：马克思、

斯宾塞、齐美尔、索罗金和帕森斯的理论，是相吻合的。角色丛的各种角色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上，它们有不同的兴趣，有时甚至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期望，总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假定之一，也是其它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假定：社会分化使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学校行政人员的经济社会地位显然与教师不同，其兴趣、价值观念和愿望也就与教师有所区别，因而教师可能要满足从他的角色丛中这些或那些成员各种相冲突的期望。对其具有期望的人如学校同僚、学校当局负责人、或美国军团委员会成员。一个人认为具有教育实质的东西往往被另一个人看作只是教育的点缀，而第三者或许认为这恰恰是与教育实质背道而驰。占有这个地位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占有其它地位的资本，人们就是通过角色丛在社会结构中与占有不同地位的人发生联系。

作为一种中层理论，角色丛理论从一个概念和相应的设想着手，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理论问题，因此，假定角色丛冲突是社会结构造成的，我们就推导出一个双重问题（这一问题因缺乏理论阐述一直没人提出）：究竟哪一些社会机制能够消除理论上假定的角色丛不稳定性？在哪些情况下这些社会机制不起作用，以至形成无效、混乱和冲突的局面？如同历来从功能分析的一般取向引发的问题一样，这些理论同样不假定角色丛永远会良性运行，因为，这一中层理论不对社会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冲突作历史性的概括，而是分析如何确定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冲突的社会机制。

二、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

探索中层理论需要社会学家有一个不同于探索包罗万象的统

一论的信念。以下论述假定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如同建立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一样，虽具有令人振奋的挑战色彩，但成功的希望同样渺茫，一旦如此，这样的体系则成为废品。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相当的重视。一些社会学家依然满怀希望地在撰述一般的社会学理论，试图囊括所有可观察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具体细节，并希望它们指导研究者注意实验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启示性信念，我们还不具备创立综合理论的条件。

回顾社会学发展的知识脉络，乐观主义者就会放弃这些奢侈的希求。我们太受历史的影响，我们必须记住，早期社会学是在创立高度综合的哲学体系的学术气氛[①]中成长起来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都要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最著名的有康德(Kant)、费希德(Fichte)、席勒(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每个人都企图使自己创立的体系对天地万物和整个人类提供一个权威性的总看法。

为创立综合体系而做出种种努力的哲学家也就成为早期社会学家遵从的典范，因而，十九世纪是一个创立社会学体系的世纪。一些创始人象孔德、斯宾塞就深受创立体系风气的影响，这一点不仅在他们的哲学研究中有所体现，而且，也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其他人象甘普洛威奇（Gumplowicz)、沃德（Ward）和吉丁斯（Giddings)，都无不在努力确定社会学这一“主题古老的新科学”在学术界的合法地位，因而，它要求建立一个明确的一般社会学思想框架，而不是在尚未完善的框架中建立指导具

---

① 参考John Theodore merz,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1904年，第四卷。

体社会学调查的专门理论。

在这种风气下，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开拓者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体系，并认为自己建立的是真正的社会学体系，繁多的体系自然形成了各种学派，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大师、弟子和追随者，社会学不仅从其它学科中分化出来，而且自己内部也在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不同于科学中专门性的分化，而同哲学一样，是整个体系的分化，它们相互对立或背道而驰。正如罗素（Berfrand Russell）在讨论哲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整体社会学没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而是去一笔书成一个庞大的综合社会学理论"。①

一些社会学家使本学科立足于学术界的另一途径是：他们不是把哲学体系，而是将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他们的理论原型。这种方式有时也使他们试图建立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一目标是基于我们对科学的三种基本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假定思想体系可以在积累大量的基础观察经验之前得到充分的发展。按照这种观点，爱因斯坦可以跨越几个世纪的探索和对探索结果的系统研究，即跨越整个必要的准备阶段，而直接接上开普勒的研究。因而，源自这种假定的社会学体系就同过去医学界人士跨越了150年所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一样不完整和不全面。如斯丹尔（Stahl）体系，索维基(Boissier de Sauvages)体系，布朗塞斯（Broussais）体系，布朗（John Brown）体系和罗西（Benjamin Rush）体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医学界的一些卓越学者依然认为，远在作充分的实际调

---

①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年834页。

查研究之前，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疾病理论体系①。尽管后来医学界认为这条路行不通，但在社会学界仍然有人在做这种努力，正是这种研究趋势使生物化学家和业余社会学家汉得森（L.J.Henderson）观察到：

"社会科学中大多数理论体系的建立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学说和分类体系的建立。自然科学中，理论和描述体系是随着科学家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得以日益发展和完善，而社会科学中，各种体系常常脱颖于一个人的思想，随后，如果这些体系能引起注意，人们就会对它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多方合作共同努力使其不断完善的情况则很少见。"②

第二种误解是认为所有学科与物理科学具有历史同时代性的错误假定——认为同一历史时期的所有文化产物有相同的成熟度。其实，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差别则会发现它们的发展并不同步。虽然物理科学与社会学同处于二十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毫无疑问，当今社会科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已相对而言达到理论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就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

---

① Wilfred Trott,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年150页。这些体系创始者的介绍可以在各种医学史中见到；例如，Fielding H. Garri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hiladelnhia; Psaunders 1929年；Ralph H. major, A History of medicine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54年第二卷。

② Lawrence J. Henderson, The Study of m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41年19—20页，正如书名，阅读全书会使大多数社会学学者受益匪浅。

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力，一些社会学家气馁了。他们开始怀疑：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之前真正的社会科学可能出现吗？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和二十世纪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学科化的和积累性的研究。社会学或许还不到出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要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

第三个误解是社会学家往往错误地理解物理科学的实际理论状况。令人可笑的是物理学家们自身都承认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包罗一切的理论体系，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近期之内也没有这种可能。物理科学的特点是先建立起一批大大小小的专门理论，随之将它们并入理论族系．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的确都希望未来有一个综合了一切物理学原理的理论，但是在获得重大的科学进展之前，我们不能坐等其成"。[①] 就在最近，理论物理学家淮曼(Richard Feynman) 并无丧气之意地说："今天的物理学理论、物理定律仍是一群互不相同、难以成为一体的局部理论和理论碎片"。[②]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试图建立综合性理论的学者的观察，他们将自己的余年不屈不挠地投身于并无成功希望的研究，"希望用最少的概念和一些基本关系来统一所有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些概念和关系可能都将为逻辑过程所否定"。爱因斯坦尽管自己执著地孤独地献身于这一追求，然而他承认：

---

① Henry margenau, "The basis of theory in physics," 未出版，1949年，5—6页。

② Richard Feynman, The Characfer of Physical Law London: Cox & Wyman Lfd, 1965年30页。

物理学的大部分研究旨在发展物理学的各个分支，而每一分支的研究宗旨是对有限的经验领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其定律和概念也就与经验保持着尽可能密切的联系。①

这些观察报告可能会引起那些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或不久的将来建立的一个真正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社会学家们的深思。如果几个世纪以来理论已经不断得到概括的物理科学尚未能建立起一个包罗一切的理论体系，那么，才刚刚开始积累经验基础上的中小型理论概括的社会学，就应该收敛一下企图建立综合体系的热望。

三、综合社会学体系的功利压力

一些社会学家之所以坚持我们现在就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不仅是由于不自量地与物理科学相比的结果，也是社会学在当今社会中作用模糊的反应。正因为社会学不断积累的知识能否满足决策者、改革家和反对派、商人和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和大学生、即各界人士的广泛要求还是个未知数，社会学家才采取自卫，狂热地坚信：无论社会学知识多么不完善和多么虚夸，都必须责无旁贷地满足这些需求。

这种信念是错误的假定：一门学科必须能满足一切需求，无论这需求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亵渎圣明甘愿受罪的假定——认为一门学科可以象上帝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似乎承认认识中还有未知数就等于承认全然无知。因而经常

① Albert Einstein,"The fundamental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 载L.Hamalian和E .L . Volpe编辑的Great Essays by Nobel Prize Winners New York：Noonday Press1960年219—230页，见其中220 页．

出现这种情况，一门学科羽毛未丰，其代表人物就虚妄地宣称，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解决本学科中的一切问题，这正是怀特海在本书卷首所指出的："早期科学的特点是目标弘大、抽象，研究琐碎、具体"。

如同社会学家因为与物理学家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不加思索地把自己与他们相比一样，公众和决策人物也往往错误地根据社会科学解决当前社会中迫切问题的能力来评价学科的价值。社会科学家的受虐待狂和公众无形中形成的虐待狂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社会科学象所有的学科一样是不断发展的，除了有时能解决一些问题外，它并非全智全能。从历史上看，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苛求正如十七世纪医学的状况一样，其地位和前景往往是根据它诊治和预防心脏病的能力来判断。如果当时医学界普遍只注意到冠心病的死亡率在不断增加，那么，就会忽视了对如何使1650年（1850年或1950年）的医学知识能够解决一系列其他健康问题的研究。恰恰是这种缺乏逻辑的功利主义对社会科学提出如此多的实际要求。因为战争、暴乱、贫困、种族歧视和心理紊乱象瘟疫一样折磨着当今社会，社会科学就应该通过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今天社会科学家解决这些迫切问题时，他们的条件并不比1655年医学家哈维（Harvey）和希德汉姆（Sydenham）确诊，研究和治疗冠心病的条件好。因而正如后来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医学没有能力处理个别问题绝不意味着它没有力量来发展自己。如果每个人只关注确定的事情，谁又来研究将要面临的新问题呢？

我强调社会学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他所积累的知识以及技能状况之间还存在着差距，这当然不是说社会学家不应该发展综合理论或不应该结合迫切的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更不是说社会学家应该着意去研究琐碎的实际问题。各种基础研究和理论概括

都相应地与特定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至少也有着潜在的相关。①但是，认识到历史发展不平衡很重要，一个社会实际问题再急迫、再重大，并不一定能得到及时的解决。②在任何时候，科学工作者都只能解决某一些问题，而对另一些问题则无能为力。我们必须记住，需要是发明之母，社会范围的知识积累才是其父，除非两者结合在一起，否则，需要永远不能产生发明。当然，在未来某个时候，需要与知识可能结合在一起，可这种结合需要时间和耐心，只有知识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满足各种要求。

本文中，对当今社会学与社会实际问题的关系，对社会学与综合社会学理论的关系，都倾向于用不断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依靠某一个社会学家的突然顿悟，去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或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尽管这一看法没有任何令人振奋的宣言，但却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估了社会学的目前状况，并指出了社会学实际发展的方式。

---

① 这一概念在默顿，" Basie research and potentials of relevance " 一文中有所发展（载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63年5月，第六章，86—90页。）前见我早期的研究文章The role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载Philosop hy of Science，1949年，16期，161—181页。

② 更为详细的阐述参见下列著作：Paul F．Lazarsfeld，William Sewell and Harold Wilensky编辑的The Uses of Sociology（New-York：Bsasic Books，）正在印刷Alvin W．Gouldner and S.M.Miller，applied Sociology：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年）；Bernard Rosenberg，Israel Gerver ard F．William Howton，Mass Society in Crisis：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Patholog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4年 Barbara Wootton，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athology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9年。）

析，它们提供理论必须说明的各类变量，而不是对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做清晰、系统的阐述。概念很多，已被证实的理论很少，即观点不少，定理不多，一句话，探讨多，结论少。也许侧重点的进一步改变将是大势所趋。

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平均地分配给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和探索上。这种状况反映了他们的基本假定。我们关于中层社会学理论的讨论试图阐明所有社会学理论都面临的一个决策问题：哪一种研究能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精力，从事能得到证实的中层理论的研究，还是从事包罗一切的概念体系的研究？我相信，尽管各种信念可能遭到误解，只要对中层理论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将专门理论整合成较为概括的概念和相互吻合的命题，中层理论将展示最广阔的前景。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应采纳我们老大哥的应变观点，尤其是但尼生（ Tennyson ）的观点：

体系出自专论；

专论来于实证。

五、对中层理论截然不同的反应

侧重中层社会学理论研究这一主张正式倡导以来，社会学家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这些反应取决于社会学家们各自的工作类型。大多数从事理论性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家同意这一主

(接上页注)是象帕森斯这样的综合理论家也承认：1)事实上综合社会学理论很少能推导出具体假设；2)与物理学这样的学科相比，推导出具体假设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3)综合理论只提供一个一般取向；4) 它只能作为汇编经验概括和具体理论的基础。承认了这一点，从事综合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家实质上与认为今天社会学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层理论的社会学家没有什么不同。

张，赞同对早已认可的基本原理做系统的阐述，相反，献身于社会思想史的人文主义研究并试图建立综合社会学理论的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这一主张缺乏远大抱负。第三种反应是折中态度，这些人既认识到侧重中层理论并不意味着只注意这一种研究，又看到高度概括性理论的发展有待于中层理论的不断综合，而不是突然全部脱颖于个别理论家的冥思苦想。

六、分化过程

象大多数科学争论一样，这场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学研究应投放何种科研力量比例的论战不仅是场学术论争，而且也涉及社会性冲突①。也就是说，与其说这场辩论是社会学根本观点的对立，还不如说是在如何看待社会学家在当今时代怎样最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这一争论是遵循历来已被认同的社会冲突程序而进行的相互抨击。随后，两派更加分化，冲突更大，到一定的时候，冲突公开，就成为地位争夺之战，而不再是对真理的探索。观点的分化是一派社会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只对另一派社会学家的成文观点做出反应。中层理论家被称为对立派、实地调查者或社会描述者。而试图建立综合理论的理论家则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思辨家，全然不考虑不容置疑的经验证据，或不可避免地遵循无法检验的教条。

这些成见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象大多数成见一样，它们只是各种实际观点倾向的歪曲夸大。然而，在社会冲突过程中，当

① 下面几页引自默顿"Social conflict in styles of sociological work"，载Jransactions，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1961年3月，21—46页。

在这两种极化的观点之间，甚至没有空隙能容下独立自由的第三派别，使之能把社会冲突转变为学术之争。的确有一些社会学家不采取社会冲突中非此即彼的态度，然而，常常是这些不想应战的人在两大敌对阵营的交叉火力下被抓获，他们或者成为纯折衷主义者，使两派都不必研究这第三立场的观点及其正确与否；或者被打上放弃真理沦为变节者的标签；甚而更糟的是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中间派或骑墙者，由于自身的胆怯和机巧而回避社会学正统与社会学异端的基本冲突。

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既有正功能，也有反功能。社会冲突过程中，人们歪曲认识上的争端以驳倒对方。这些可笑的学术争论耗费了人们的大量精力，但是，当冲突由全体公众所左右时，即使那些扭曲的争论也可以调整科学中日益积累的不平衡。在一个科学领域中，做到史料的最佳使用是很不容易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对确定最佳使用参照的标准意见不一。① 只要一种特定的调查方法，如小群体和大社会，或一组特定的观点，象功能分析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或某一特定的研究方式，如社会调查和历史社会学，一旦引起注意，投入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数量迅速增加，社会冲突就逐渐明朗化。这一发展方式越来越普遍，因为它已在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有效的证实，并且也符合人们的观念。在当今不热门的领域和研究工作中，素质较高的研究新手寥寥无几，而随着成就的减少，这项研究也就越没有吸引力。如果不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冲突、理论上正统观念的统治和社会学研究分布比例不平衡的现象会更加明显。因而，人们纷纷主张，越是被忽略的问题、方法和理论倾向，越应受到公

---

① 物理学家和科学政策学者Alvin M. Weinberg 曾强使自己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考他的著作Reflections on Big Science 中第三章" The Choices of Big Science"(Cambridge mass ; The M.I.T.Press1967年。)

众的关注，即使这些主张对以往的发展方式有着过激的抨击，也会促使社会学注意研究小问题。激进的异端观点在成为新的正统观念之前，提供了科学探险的前景。

七、赞成侧重中层理论研究这一主张

如前所述，在从事理论性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家中，侧重中层理论研究的主张最能产生共鸣，这就是为什么中层社会学理论的主张直到现在才引起反响，而早期的说法——我们就要研究的——无人问津的原因之所在。用一句更为精确通俗的话说，就是"时机还未成熟"，也就是说，直到最近二三十年，除了极少数例外，社会学家才不再献身于包罗一切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和毫无理论性的描述性经验研究。因而要求研究中层理论的呼声也就有所反应。

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阐述的，① 这一主张既不是新提出的，也不是借用的，它有着广为人知的历史根源，培根远比他的所有前辈更为强调科学中研究"中层理论"的重要性：

> 无论怎样，认识世界都不是从具体事物一下子跃到远离具体事物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原理（例如，人们称之为学科和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固执地认为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层理论要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建立；这就是历来遵循的做法；这样认识世界不仅仅是由于自然而然的推动而形成的，而且也是演绎推理的论证不断迎合这一做法的结果。然而，我们往往希望科学研究能顺利进行，在上升的阶梯中，

① 默顿，"The role-set"载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57年6月，108页。

能一步接着一步，毫不受阻地从具体事物进展到低层原理，随后才到中层原理，一步高于一步，最后到达最为一般的原理。最低层的原理几乎与纯经验没有什么区别，而高度概括性的原理往往是抽象的纯理论，缺乏坚固的基石。只有中层理论是真实可靠和富有生命力的原理，人们的实务和机遇都建立在这一原理上，最后才是概括性最强的高层次理论，在此，我并非有意要将它神秘化，但中层理论的确可以起到限制作用①。

培根随后引用了一段前人的说法：

柏拉图在他的《泰阿泰德》（Theaetetus）一书中曾论述得很清楚："具体的事物是无穷的，高度概括的理论并不能给予足够的指导；"一切科学中，区别高手和生手的关键就在中层命题，这些命题在每一特定的知识系统中来源于传统和经验②。

正如培根称柏拉图为其前辈，约翰·史伯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乔治·葛尼维尔·刘易斯（George Cornewell lewis）也称培根为他们的前辈，尽管在一般法则和中层法则的逻辑关系问题上，米尔不同意培根的观点，但米尔还是这样评价培根：

① 培根，Novum Organum，Book I，Aphorism CIV；and Book I，Aphorisms LXVI和CXVI Herbert Butferfield认为培根Bacon 似乎"好奇地但意味深长地预见了未来科学采用的结构"。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1300—1800London：G.Bell & Sons 1949年91—92页。

② 培根，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编入 Basil montague编辑的Works London：William Pickering 1825年第二卷177和181页。

培根明察到每一门科学的中间原理一般都包含其价值观。最低层的概括，除非它们作为推断结果溶合进中层原理，由中层理论来解释。否则，都不过是经验法则不完善的具体再现，而高度概括法则太笼统，包含的实际事例太少，事经验基础上的理论研究的结果。

不能给予发生在个别情况中的事情以足够的指导，实际事例往往是无穷的。因此，培根赋予每一科学学科中中层法则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我认为培根关于中层原理推导方式的信念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例如，培根一味地醉心于归纳法，不给演绎法留一席之地）①。

据历史记载，与米尔同时，刘易斯也以培根为例来阐述政治科学中的有限理论(limited theories)。他发展了以往的观点，认为大量的有效原理需要把观察限制在确定的社区层次上才能得以发展：

……我们可以形成各种有限的理论，预测出一般的趋势，但将通行的因果律应用于整个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立的，若只限于某些民族，其推导可能与事实相符。……

……只要我们自始至终地坚持实事求是地陈述事实，把观察范围压缩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就完全可以扩大推测政治（Speculative Politics）的领域。运用这种办法，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正确的并来源于事实的政治原理，同时也可以完善原理，赋予它们生命力和实质内涵。它们不再是枯

①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865年454—455页；Mill把同样的概念作为中间原则应用于社会变迁法则，同前引书，520页。

燥空洞的概括，而是类似培根的中层原理，既是事实的概括性描述，又接近实践足以成为生活的指南。①

尽管这些早期的陈述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培根与米尔的区别就很明显——但他们都强调建立不同层次的可以接受实验检验的中层理论的战略重要性。

随后，一些学者作了更进一步的类似但不尽相同的阐述，其中有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中界原理"概念；罗厄（Adolf-Löne）关于把经济与社会过程连接起来的"社会学中程原则"；吉斯柏格（Morris Ginsberg）研究米尔的社会科学中层原则的成果。② 因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中层社会学理论是由我们的许多先辈提出来的。但是，如果说这一取向中的操作哲学（Working Philosophy）不完全是创新的，那么它至少对预示者们的信条进行了修正。

---

① (George Cornwall Lewis, A Treatise on th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n Politics,) 同前引书，第二卷，112、127页和200，204—205页。

② Seymour marfin Lipset在他为T. H. marshall著的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84年一书所作的序言里（16页）验证了这些阐述。引文引自Karl mannheim, mensch und Gesell schaft in Zeitalter des Umbaus Leiden, 1935年和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fructi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50年) 173—190页；Adolf Löw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London, Allen & unwin, 1935年)和morris Ginsbe rg, Sociology(London, Thornt on Butter-worth Ltd., 1934年）下面一本书出版时我注意到对同一历史时期先辈观点的详尽说明及其严格的批评，C. A.O. van Nieuwenhuijze, intelligible Fiel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7年) 第一章，"The Quest for the manageable Social Unit—Is There a middle Range?"这一研究提供了一系列中层理论所面临的严肃问题。以我个人之见，所有这些问题正在澄清，还没有找到一个严肃的答案。然而，因为这本书正在撰写过程中，这一观点就缺乏Nieuwenhuijze阐述中所有的详细分析。

迪尔凯姆的专著《自杀论》就是发展和运用中层理论的典型事例。因而，迪尔凯姆学派的社会学家，象柯维廉（Armand Cuvllier）①也赞同这一理论倾向就不足为奇了。柯维廉的论述提醒我们意识到，中层理论涉及微观和宏观社会学探索，既有小群体的实验研究，也有社会结构中特定方面的比较分析。宏观社会学观察不推测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也是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立场。他坚持要"多研究中层理论问题，少谈论惊人突破性发展，少涉及原理研究、少发表宣言"。②

我们可能会假定，长期以来以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为研究目标的欧洲学派，要否定中层理论。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在研究近代社会学思想史和预测其发展前景时，一位观察家曾希望中层理论会减少社会学思想学派之间的两极对立，使它们趋于相容。③其他学者对这一理论的逻辑结构作了详尽的分析，著名的有巴巴诺（Filippo Barbano），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层理论的专著和文章。④

---

① Armand Cuvillier, Où va la sociologie française?（Paris: Libraire Marcel Riviere & Cie, 1953年）和Sociologie et problèmsactuels(Paris: Libraire Philosophique J.Vrin,1958年)

② Davi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older' and the 'newer' social sciences," 载L.D. White编辑的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19—339页，见其中339页。里斯曼(Riesman)所主张的理论倾向应参照即将讨论的斯坦(maurice R.Stoin)的观点。斯坦认为中层理论贬低了象米尔斯和里斯曼这样的学者为解释现代社会所做的执著努力。

③ Salustiano del Campo 载 Revista de Estudios Politicos 1957年1—2月。208—213页。

④ Barbano 的著作有：Teoriae ricerca nella sociologia contemporanea（milano；A.Giuffrè,1955年）100—108页；"La metodologia della ricerca nella sua impostazione teorica," 载 Sociologia, 1958年7—9月，3期282—295页；"Attività e Programmi di gruppi ricerca (接下页注)

也许，对中层理论的逻辑结构作过最彻底的详尽分析的，要数泽特柏格（Hans L.Zetterberg）的专著《论社会学理论和证据》①（On Theory and Verificatior in Sociology）和马莱斯基(Andrzej malenski）的《举止和交往》②（Verhalten und Interaktion）。更重要的是泽特伯格和马莱斯基超脱了两极化倾向，不再认为中层理论是一系列并不相联的专门理论，他们运用富有寓意的具体事例，指出专门理论是怎样相继综合成系列理论的。伯杰（Berger）、泽尔迪西(Zelditch)、安德森(Anderson)和他们的合作者也阐述了同一理论倾向，认为中层理论适用于研究揭示社会现象某些方面的有关情况，进而说明了各种中层理论的用途③。

中层理论几十年来的发展过程，远远不是以上篇章所能说清楚的。但也许随便举出一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讨论问题的

（接上页注）sociologica"载IL Politico，1957年2期，371—392页；"strutturee funzioni sociali, l'emancipazione strutturale in sociologia，"载Quaderni di Scienze Sociali，1966年四月，5期，1—38页，同时，参考Gianfranco Poggi，"Momento tecnico e momento metodologica nella ricerca，"载Bollettino delle Ricerche Sociale 1961年九月，1期，363—369页。

① Totowa, N.J.：The Bedminister，1965年，第三次修定版。参考Zetterberg，"Theorie, Forschung und Praxis in der Soziologie，"载Handbuch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Stuttgarto Ferdinand Enke Verlag 1961年），第一册，64—104页。

② 由Wolfgang Wehrstedt译自波兰文，Tübingen：J.C.B.mohr (Paul Siebeck)，1967年。他在书中列出了波兰最优秀的社会学家之一、仅活了34岁的malewski以观察独特严谨见长的全部论文目录。今天我们很少有人能这样清晰严密地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层理论之间的关系。参考Malewski的重要文章"Der empirische Gehalt der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载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59年11期，281—305页。

③ Berger，Zelditch和Anderson，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Progress，同上，29及后诸页。

多样性。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些中层理论是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包括一系列已被证实的假设，而不仅仅是一些逻辑上并不相关，被编织在一起的描述性材料、经验概括和假设。在科层组织的调查研究中，涌现出一批中层理论家，著名的有塞尔兹尼克(Selznick)、古尔德纳(Gouldner)、布劳（Blau)、利普塞特-特罗和科尔曼（Lipset-Trow-and-Coleman）、克罗泽（Crozier）、凯恩(Kahn)、凯兰（Katz）和一些其他调查家。① 麦克（Raymond Mack）建立了职业子系统中层理论，佩利格林（Pellegrin)把流动理论运用于群体分析将其发展到了顶峰，阿贝（Junkichi Abe) 提出了建立在微观和宏观社会学资料基础上的中介理论，把越轨行为模式与社区结构联系起来，海曼（Hyman）把公共舆论的经验一致性（Empirical uniformities)综合成一个合成理论，希利勒（Hillery）则发展了人口统一(Demographic uniformities) 理论。②

① Philip Selznick,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49年) ; A.W.Gouldner ,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1954年) ; P . m Blau,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年, 第二次再版); S.m.Lipset, martin Trow and James Coleman, Union Democracy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56年) . James G . march 和 Herbert A . S imon 综合了以上专著中的理论结论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8年)36—52页。这个领域的其它重要中层理论实例，见michel Crozier ,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rnon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年); Kahn和Katz, 书名如上。

② Raymond Mack, " Occupational determinatedness, a problem and hypotheses in role theory, "载Social Forces, 1956年十月, 35期, 20—25页 ; R.J .Pellegrin, "The achievement of high statuses, ""载Social Forces, 1953年十月,32期, 10—16页; Junkichi;Abe, "Some problems of life space and historic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elinguency, "载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1957年7月, 7期, 3—8页; HerbertH. Hyman, "Towarda the ry of Public opinion,"载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接下页注)

可是，当前社会学家的中层理论倾向有着更为深远的发展基础，远远不是这几个例子就可以阐明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索罗金从事宏观社会学理论研究，却一再给予中层理论以重要的评价。索罗金在他最近的大多数著作中，从理论是否能解释中层一致性（Middlerange uniformities）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当今理论的发展。例如，他回顾了以往的社会学统计调查，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提供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总体一致性或中层一致性、因果律和基本准则。在其它地方索罗金运用这一标准去衡量同时代的研究，认为只有当研究能提供出适用于许多人、群体和文化的普遍一致性或至少中层一致性时，研究才有价值。甚而在其它地方，他谈到，只要文化体系选择类型学象中层理论一样不过于概括，还是可以接受的。索罗金在总结社会学近期研究时，着意把实地调查与中层概括一致性区别开来，实地调查只提供纯地方的暂时的信息资料，缺乏普遍的认识价值，而中层概念一致性使得：

> 一堆杂乱费解的历史事件变得清晰易懂。没有这些概括我们就迷失于杂乱，无数事实就毫无意义，丝毫不能说明事实本身为什么存在和怎样存在。而有几条主要准则做引导，我们就可以在没有地图的、混乱的黑暗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有限的普遍准则和一致性的认识作用。①

(接上页注)1957年21期，54—60页；George Hillery,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demography," 载Social Forces, 1958年十月，37期，45—51页。

① Sorok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 106, 127, 645、375页。索罗金以他炽热直率见长的文笔，指责了我对于宏观社会学体系与中层理论的矛盾心理，以及一些其它矛盾心理。但是，在这一点上，尽管自我申辩可以维护尊严，但与讨论主题毫不相关。最重要的是索罗金尽管继续致力于整体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但也在或多或少地接近我们在这场讨论中所持的立场。

因此，索罗金不赞同热衷于寻找不阐述社会学观点的事实，他建议中层理论要指导实验调查，可他自己仍然探索综合社会学体系。

八、否定中层理论

关于中层理论的辩论已花去社会学界不少笔墨，那么，研究一下对中层理论的批评是有益处的。据说中层理论不象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那样有远大的学术抱负，很少有人阐述这一观点象比斯塔(Robert Bierstedt)那样有说服力：

> 人们居然劝说我们放弃对曾使我们的先驱在社会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大人类社会问题的探索，而去研究马歇尔在伦敦大学就职演说中所讲的中途驿站，也就是其它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层理论。但这是一个多么渺小的志向，难道我们中途而止吗？最先引导我们走进知识世界的想象力哪里去了？我曾一直认为社会学家非常清楚如何去梦想，他们懂得勃朗宁手枪可以让人的触及范围超出手中的枪柄。①

我们从这段引文中也许推论出，比斯塔特更愿意建立起包罗一切的综合理论，坚守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志向，而不愿意接受建立中层理论这一渺小的志向，或者还可推论出：他把社会学能否提供解决人类社会重大紧迫问题的答案看作是社会学理论是否有价值的试金石。但是，这两种推论显然都是错误的。因为中层理论常常被那些公开提出质疑的人所接受，因此，比斯塔特继而

① Robert Biestedt，" Sociology and humane learning，" 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年25期，3—9页，见其中6页。

说："就我个人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研究专著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我认为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我完全同意对韦伯专著的这一评价。象许多熟悉围绕韦伯专著所展开的争论的社会学家一样，我同样认为这部论著是一个巨大的贡献。① 但我难以使比斯塔特对韦伯论著的评价与认为中层理论苍白无力、没有远大志向从而应予以抛弃的观点相吻合。因为这一专著恰恰是中层理论最好的例子，它涉及一个有严格界限的问题，一个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又对其他社会、时代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它呈现的是一个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相关的理论，而且为建立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制度互赖模式理论做出了贡献。韦伯究竟应该属于抱负狭小的平庸之辈，还是努力发展经验基础上规模适中理论的楷模呢？

比斯塔特否定中层理论，我猜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认为中层理论远离学术先辈的设想，言下之意就是这一概念标新立异。然而，正如我在前面一章和其他地方所提到的，② 中层理论这一主张由来已久，已为很多人所采用。

第二，比斯塔特假定，中层理论完全排除宏观社会学探索，不涉及一个特定理论如何操作特定假设，以说明系统收集到的资

① 我甚而探过了韦伯在一部专著中所阐述的，关于韦伯生活时代社会组织互赖的专门理论，这部专著研究了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科学与当代经济和宗教制度的功能互赖。参考George Sarton编辑的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Osiri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and Culture (Bruges, Belgium: St. Catherine Press, Ltd., 1938年)，增添新序言，再版(New York: Howard Fertig, Inc. 1970年; Harper & Row, 1970年)。尽管韦伯关于清教主义与科学互赖只阐述了寥寥数语，但只要我开始调查，这些阐述就密切相关。这正是中层理论不断积累研究成果的特点：即一个人从先辈理论和调查出发，试图把理论发展到新的经验领域。

② 默顿"The role-set," 载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7年6月，108页。

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假定毫无根据，事实上，当今宏观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大部分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具体而有限度的理论基础之上，而这些理论可以进行系统的经验检验，可以采用宏观社会学研究的相同逻辑和同种指标。①

把理论问题极化到非此即彼的程度的，还有一位批评家，他将中层理论家的主张曲解为宣称已经找到了当今社会学理论的万应良药。达伦多夫(Dahrendorf)"承认马歇尔和默顿的大部分著作涉及了我提出的问题"，继而又说：

> 因此，我否定他们的阐述并不是否定他们的研究，而是针对他们显而易见的假定，即认为近来理论的错误完全是概括性过强造成的，只要减弱概括性，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②

然而，我们论述得很清楚，中层理论家并不认为，社会学理论的缺陷仅仅是概括性过度。事实远非如此。实际的中层理论——如失调论、社会分化理论、参考群体理论——也有超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文化背景的高度概括性。③但这些理论决不是源于同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与各种理论取向是一致的。它们为各种经验资料所证实，如果任何一个综合理论断言中层理论不需要经验资料作基础，那么，这种综合理

---

① 若要了解这些发展的详尽摘要，参考Robert m marsh, Comparative Sociology, Toward a Codification of Cross-Societal Analys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年)。

② Ralf Dahrendorf, "Out of utopia, toward a reorientation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载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8年64期，115—127页，见其中122—123页。

③ 科贝(William L. Kolb)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简明地指出中层理论并不只限于具体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见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8年3月，63期，544—545页。

论越发糟糕。

另一种非难认为中层理论是把社会学领域分裂成若干个互不相关部分的具体理论。①社会学的分裂趋势的确在日益发展，但这不是研究中层理论的结果，相反，中层理论是在综合经验成果，而不是分裂。我已运用参考群体理论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考群体理论吸取了不同人类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象：部队生活、种族与种族关系、社会流动，轻度犯罪、政治、教育、和革命活动②

这些批评显然是试图确定中层理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框架中的位置。但极化过程使这些批评早已超越这一目标，进而歪曲现有信息。否则，人们不可能注意到罗斯曼(Riesman)在支持中层理论的声浪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仍然认为中层排他策略（the middle Range strategies of exclusion)包括一个：

> 针对当今那些仍在研究传统问题的社会学名流的系统抨击，这一抨击经常采取的形式是把此类社会学研究工作归为印象主义的纯理论，甚而归入纯粹的新闻工作之类。因此，正因为米尔斯（C.Wright Mills）和罗斯曼敢于涉及传统学派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学派保持着有机联系，所以他们为解释现代社会所做的全部努力也遭到同行的蔑视。③

---

① E . K . Francis ,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Soziologischen Denkens(Bern:Francke Verlag, 1957年), 13页。

②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ture , 278—280,97—98,131—194页。

③ maurice R . stein, " Psychoanalytic thought and sociological inguiry, "载Psychoanalysi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1962年49期,21—29页，见其中23—24页。本杂志编辑纳尔逊(Benjamin Nelson)继而观察到："每一门希望成为科学的学科都必须从中层入手研究,若基本方针与此相悖，在我看来，这在极大程度上犯了指导性错误。"引自"Soci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on trial : an epilogue, "出处同上，144—160页，见其中153页。

按照这一说法，罗斯曼恰恰是遭到了倡导同一理论的同行的蔑视。同样，尽管这里阐述的是中层"排他策略""蔑视"米尔斯的研究，但是，对米尔斯的部分研究成果——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学提供的系统分析，一位中层理论家所给予的充分肯定也是有案可查的。①

近代苏联社会学家已把声名狼藉的中层理论看成一个实证概念。按照安德娃(G.M.Andreeva)的说法，这种理论：

> 建立在抽象化较低而原则上又不超过实验资料的层次上。这一层次上的理论知识还属于经验知识范畴，因为理论本身实质上只是经验概括……②

在此，对中层理论这一概念的误解需要商讨一下。本书第四章"社会学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已发表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

① 我在这儿所指的是米尔斯与第一稿的起草者Hans Gerth合作进一步完善了的重要理论著作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stitutions(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1953年)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我这样评述这项重大研究工作："本作者无意要建一个自圆其说的综合体系，以能包括一切影响社会结构中品质性格形成的心理学概念和社会学概念，这还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短期之内不可能达到。然而，作者综合了这一领域中的实质内容，提供了研究其它部分的出发点。"与格什合作的这项学术研究截然不同于米尔斯的其它著作，如：Listen Yankee，The Revolution in Cuba和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这些阐述不用因他人称之为"彻头彻尾的新闻报道，而贬值，它们就是新闻报道，但这一评介很少源于中层理论倾向"。

② 这些观点的表述见：A.G.Zdravomyslov和V.A. Yadov，"On the programming of concrete social investigations，"载Voprosy Filosofi，1963年17期81页，G. m.Andreeva，"Bourgeois empirical sociology seeks a way out of its crisis，"载Filosofskie nauki，1962年5期、39页。两篇论文摘要由George Fischer译成英文，Science and Politics The New Soc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64年)。

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把理论与经验概括两种概念区别开来，理论是一组逻辑上相关并可以推导出可检验的经验假设的假定；而经验概括是总结了观察后两个或更多的变量之间关系的一致性所得出的独立命题。但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用那些已被排除在外的措词来解释中层理论。

这种误解可能是由于对综合社会学理论的信奉，以及对中层理论将威胁到综合理论地位的担心。然而，应注意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理论取向成为系统经验研究的指导，就必须发展中层专门理论。否则，就象斯威德拉夫(Sverdlov)对工人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一样，最多只是一系列经验概括(诸如有关工人受教育的水平与他们加入各组织的人数，阅读书刊的数量等等之类的指标。

前面一章曾提到，相信可以建立起一个包罗一切社会学知识的综合理论的社会学家，同样相信社会学完全可以满足实践提出的所有需求。这一观点可以用来反对中层理论，正如奥塞波夫(Osipov)和杨夫契可(Yovchuk)所观察到的：

> 默顿认为建立社会学综合理论的时机还未成熟和中层理论才寥寥无几的观点只能暂时成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说法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马克思在大约125年前建立的唯物史观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被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唯物史观建立在具体社会生活的研究之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其后的发展，一直与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并为其所证实。①

① G.Osipov和m .Yovchuk, "Some principles of theory,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in sociology in the USSR: a Soviet view, " 由Alex Simirenko再版编入 Soviet Sociology, Hrstorical antecedents and Current appraisals (Chicago , Quadrangle Books 1966年), 299页。

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苏联社会学家所说的具体社会学调查——逻辑上并不出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理论取向。当中层理论还未发展时，这些调查更接近“实用经验主义”，也就是说，系统积累的信息足以给实际决策提供参考。例如，就工人行为做过各种时间预算研究，但都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索罗金的研究没有多大区别。工人们被要求叙述他们是怎样分派时间的，花多少时间去工作、干家务、满足生理需要、休息、与孩子消磨。以及参加有益的社会工作(包括参加国民地方议会、工会，出席演讲或做大众文化工作)，分析时间预算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就是发现和解决有效安排时间时所遇到的问题，例如，调查中发现工人夜校教育的最大障碍就是考试时间安排得不合理，大多数工人要放下工作而不是挤时间参加。分析预算时间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指导如何改变工人的活动，例如，当预算时间资料与工人动机调查联系起来研究时，我们就可以断言，青年工人更愿意学习，更热衷于提高工作效率。这些例子说明这些都是实用经验主义式的研究，而不是渗透在这些研究中的理论概述。这些调查结果的抽象概括程度就如同对其他社团的市场调查一样处于较低层次。如果想填补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取向与经验概括之间的空白，这些调查研究必须包容在更为抽象化的中层理论中。①

---

① 这一段论述出自R . K.merton和Henry W . Riecken, "Notes on Sociology in the USSR ," 载Current Problems in Social-Behavioral Research, (Washington , D. C. ; Nn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962年), 7 —14页。若查阅这类具体的社会学调查概括，参考A.G. Zdravomyslov和V.A .Yadov, " Soviet workers'attitude toward work: an empirical study, "编入Simirenko, 书名如上, 347—366页。

九、总结与回顾

前面阐述的拥护与反对中层理论的两个极端的观点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永远不能摆脱形式主义。我们不欣赏那些只会空谈不会观察，或只会观察不会思想，或只会思想而不能使自己的思想经受系统经验调查检验的社会学家，而不管他们是什么权威。

以上讨论了对中层社会学理论的极化解释，也许重申一下这一理论的特性是有益处的：

1.中层理论由有限的几组假定所组成，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能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

2.这些理论并非互不相关，而是综合于更为庞大的理论网络，例如：志向水平、参考群体和机遇结构等理论。

3.这些理论的抽象概括足以应用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不同领域，因为它们超越了纯粹描述或纯粹经验概括范围。例如：社会冲突理论可以适用于种族冲突、阶级冲突和国际冲突。

4.这一理论划清了微观和宏观社会学问题的界限，前者如小群体研究，后者如社会流动与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社会制度互赖。

5.整体社会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索罗金的整体社会学，只代表综合理论倾向，而不是物理学在探索综合理论时所设想的那种严谨的统一体系。

6.因而，许多中层理论与各种社会学思想体系是一致的。

7.中层理论是传统理论研究的直接继续，我们都是迪尔凯姆和韦伯理论的继承者，他们的著作提出了可供追随的观点，示范

了建立理论的策略，并提供了选择问题时可遵循的模式，以指导我们如何根据他们的观点提出理论问题。

8.中层倾向指明了研究中的未知数。这一理论没有自命通晓实际上未知的事物，而是公开承认建立知识体系还有待研究的问题，没有认定自己可以对当今一切紧迫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解决的办法，而承认只能解决现有知识可以澄清的问题。

十、范式：社会学理论的汇编

如上所述，本书主要涉及实质理论的汇编和社会学定性分析的程序。汇编就是系统严谨地分类编排富有成效的探索程序和运用程序所产生的实质性研究成果，这一过程确定和组织过去的研究成果而非发明新的研究策略。

下面一章涉及功能分析，将提出一个范式，作为汇编这个领域里以前成就的基础。①我相信这些范式有重要的基本价值。首先，它们使社会学分析中的一系列假定、概念、和基本命题公开化了，因而，也就避免了人们无意中把分析核心隐藏在尽管富有启发但散乱的评论和观点之中。除了已出现的几组命题，社会学几乎还没有系统的阐述，只有社会学变量之间关系高度简略了的符号式说明，所以社会学阐述就容易东拉西扯。程序的逻辑性、关键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常常失落于雪花般散乱的语言中。每当这个时候，眼光敏锐的读者就必须费力地去发现作者含蓄的假

① 我也提出过其它范式，如社会越轨行为范式，见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第四章；知识社会学范式，见上书第十二章；种族通婚范式，见"Intermarriag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载Psychiatry，1941年4期，361—374页；以及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范式，见"Discrimination and the american creed,"载R.m mac Iver编辑的Discriminatior and National Welfar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8年）。（接下页注）

定。而范式可以减弱理论家使用含混概念和假定的倾向。

社会学企图生动地描述人类丰富的全部画面的传统，造成了社会学论著冗长哆嗦而非言简意赅的状况。这一传统很少是从哲学，实质上是从历史，大部分是从文学那儿继承来的。那些继承这一可观的外来遗产的社会学家执著地寻找绚丽惊人的词句，以最完美地表达研究中的社会学现象的特殊性，而不是找出客观的概括性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科学的内核，使其区别于艺术。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用错了地方的艺术技巧得到公众的称赞，他们常常鼓励社会学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文笔象小说家，而不象过于死板、学术味太浓的博士。而社会学家越迎合这种公众的赞扬，就越近于口若悬河，也就越不顾忌阐述方法。正如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很久以前曾温和地辩驳说："一个观点因为阐述得糟糕未必就是真理，而阐述得动人也未必就是谬误。"

清晰的科学报告往往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搞得含混不清。极端的时候，事实、推理和理论结构组成的坚实骨架上负担了过多的技巧装饰脂粉。其它科学学科，象物理、化学甚至生物学、地理学和统计学，都已不再误用优美的文笔，为了科学化，这些学科选择了简洁、准确、客观地使用精湛的语言韵律、涵义丰富和敏感的语言意象。但是即使人们不同意社会学应该遵守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所制订的表述方法，也不应要求社会学必须与历史、推论哲学和文学同步。每一位社会学开拓者在其晚年以及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一直在头脑清晰地探索逻辑上相关的、并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即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在结构中人类行为和行为结果的命题。社会学分析范式可以帮助社会学

(接上页注) 应当注意，范式一词在库恩（T.S.Kuhn）最近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意义有所扩展，指一门科学学科在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采用的一组基本假定，参考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同上。

家从事社会学的事业。

既然一般的社会学阐述不可避免地包括理论范式，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它接受大家的评价。如果说，真正的艺术包容在含蓄的艺术符号里，那么，真正的科学不仅要揭示其完美的结构而且要阐明其论点的支柱。

我认为社会学定性分析范式至少有五个紧密相连的功能，当然，这并未包括一切论述。①

第一，范式有注释功能。它们简明扼要地汇编了可以用于描述、分析的中心概念和概念关系。范式提供在小范围可以同时检验的概念，有助于人们修正自己以后的解释，而如果概念分散在零乱的阐述中，人们就难以做到这一点。〔正如凯乔里(Cajori)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这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符号式的作用：它们提供了对参与分析的所有术语可以同时检验的机会。〕

第二，范式减少了无意引用模糊假定和概念的可能性。因为每一个新的假定概念必须逻辑上源自以前的范式或直接能纳入范式，因此，范式指导人们避免做随意假设。

第三，范式促进了理论解释的积累。范式是解释大厦的地基，如果一个新的解释不能直接建筑在这个地基上，那么，它只能是整个结构新添的一个新耳房，概念和假定这块地基就需要扩建出支撑这一耳房的地基。而且，只要每一个新解释可以建筑在原有地基上，我们就确信它作为一个新的扩展部分具有实质性内容，若需要新加一个地基，我们就得怀疑原有子结构是否坚固。一个信得过的范式在一定时候将会支撑一个摩天大厦般的解释结

① 这一讨论中肯的评介，见Don Martindale,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the ideal type," 载Llewellyn Gross编辑的Symposium on Sociological Theory(Evanston: Row, Peterson, 1959年)57—91页，见其中77—80页。

构，并且每一个后来的阐述都证明原有地基的坚固，而一个有缺点的范式将只支撑一个杂乱无章的只容下一个阐述的结构，每一组新的一致性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地基，因为原有的地基承担不起新加阐述的重量。

第四，范式以自身特有的条理化提供了重要概念的系统交点分类表格，从而使分析家意识到他可能忽视的实际和理论问题①，范式促进了分析，而不只是具体细节的描述。例如：范式使我们注意到社会行为的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的种类和相互制约状况，从而找到失范行为的根源。

第五，范式可以使我们以近似定量分析的严密逻辑来汇编定性分析。计算统计测量的程序和它们的数学基础也理应汇编进去，也就是说，假定和程序接受所有人的批评检查。对比之下，社会学的定性资料的分析常常是在深不可测、不可言喻的顿悟和理解的隐密世界中进行。的确，并非建立在范式基础上的随意陈述也会包含真知灼见，正如通常所说的，它们富有"启发性见解"，但是，包括在这些见解中的分析概念并没有阐述清楚。有时，甚至出现这种情况，即如果有人认为：若需要使辛劳所得的个人体验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必须将其重新组合以遵守公众认可的程序；这种看法被当作朦昧邪恶的标志。然而最富有洞察力的社会学家，他们提出的概念和程序必须是能派生的，而且他们的观察结果也必须可以接受检验。科学(包括社会学)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社会学家决不应希望占有一切才能。只要推进了社会学的发

---

① 尽管Joseph Bensman和Arthur Vidich对系统理论的运用表示怀疑，他们还是在论文里非常赞赏地陈述了范式的指导性作用，见"Social theory in field research,"载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0年65期，577—584页。

难，还牵涉到根据理论的要求来安排资料的问题。这是我们最起码的前提。因此，我们对于分析方法的说明将与功能论主要概念的系统评述交错进行。

二、功能分析的词汇

功能方法在社会学中，一开始就为术语的混淆所苦。一个术语经常用来代表不同的概念，犹如相同的概念经常为不同的术语所代表。这类文字的轻率使用，同时断送了分析的清晰性与沟通的确当性。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分析的过程中，一个术语的概念内容不自觉地转移了。若本质上相同的内容为一些不同的概念所混淆，则与他人的沟通势必中断。我们只要简略地追溯功能这一概念的变化无常，就可以发现概念的清晰与沟通都被功能分析各种竞相使用的词汇破坏无余。

（一） 一个术语，不同的概念

功能（function）一词早已是若干学科和一般言谈的用词了，意外的结果是：在社会学领域，它的内涵变得含混不清。在此我们只讨论这个术语五种通用的内涵，而不计其他。第一种是通俗用法，function意指某种公共集会或节日庆典，通常都带有仪式的含意。我们猜想，正因为人们赋予这个术语这一含义，某一报纸的标题断言："托宾市长不支持social Function"，新闻内容进一步解释："托宾市长今日宣称，他对任何social function都不感兴趣，他也未授权任何人替任何活动出售票券或做广告。"由于此一用法的大众化，因而它很少进入学术文献，因此对于目前术语的混乱，影响不大。显然，function的这一含义与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风马牛不相及。

function 的第二种用法与职业（occupation）一词同义。例如韦伯定义职业为一个人 functions 的专门化、具体化与组合化的方式，因而成为他继续获得收入或利润的基础。[①] 这是一些经济学家通常的用法，而且几乎是典型的用法。他们在研究一个团体的职业分布时，即称之为"一个团体的functional analysis"。在这种情况下，遵照弗洛伦斯（Sargant Florence）[②] 的建议也许较为适当，即在此类研究中最好采用更确切的用词"Occupational analysis"而不要用functional analysis一词。

第三种用法系第一种用法的特例，在一般言谈和政治科学中都可发现。function 通常意指委派给公职人员（特别是指享有官职和具有政治地位的人）的种种活动。因此产生职员或官员等术语。虽然这种意义的 function与该术语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中更为广泛的意义颇有重叠之处，但最好还是放弃这种用法，因为它忽略了：功能不仅为特定位置之占有者所履行，而且为社会中各种标准化活动、社会过程、文化模式以及信仰体系所履行。

在数学中，function[③] 一词最初为莱布尼茨所用，它具有精确的含义它指一个变量与其他某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它的变量可以用来表示该变量，或者说，从其他变量的数值，可以决定该变量的数值。这个概念以一种较为广泛（通常是较不精确）的意义表现于下列用语中，如 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 与（functional relations），这些用语经常为社会科学家所采

---

① 韦伯，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London : William Hodge and Co., 1947)，230.

② P. Sargent Florence，Statistilal Method in Economic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29)，357—58n.

③ 在数学中，Function一词称作"函数"而不称为功能。——译注

用。①例如曼海姆（Mannheim）发现："任何一个社会事实都是它所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的function"，又加一位人口学家断言："出生率是经济地位的function"，他们显然都是利用该词在数学上的含义，只是前者不是以方程式的形式表述，而后者则是。虽然这个脉络清楚地显示function一词是在其数学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社会科学家却经常徘徊于此一用法与另外一个与之相关但并不相同的含义之间，该含义也涉及"互赖"、"相互关系"或"相互依存而变化"(mutually dependent variations)等观念。

第五种含义是为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进行功能分析所一直沿用的中心含义。该用法虽然部分源于function一词的数学意义，但严格说来，它是从生物科学转借过来的。在生物学中，function意指"维持某种有机体的生命或有机之过程"。②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这种含义经过适当的修正之后，与人类学的功能论者（极端的或温和的）③所用的功能概念颇为吻合。

---

① Alexander Lesser说："在逻辑本质上，什么是功能关系？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功能关系有不同的含义吗？我并不这样认为。本质上的功能关系表示两个或多个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一给定条件下（确定关系的一方），这些条件的确定表达（该关系中的另外一方）也就确定了。界定文化方面的功能关系必须能解释在特定条件下该领域的性质和特点。"参见："Functionalism in social anthropology"，载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S.37(1935), 386—93, at392。

② 参见Ludwing von Bertalanffy, Modern Theories of Developmew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9ff.，184ff.；W.M.Bayliss, Principles of General physiology（London, 1915），706，他（指Bayliss）在该文中介绍了关于荷尔蒙功能的研究（荷尔蒙是Starling和他发现的）；W.B.Cannon, Bodily Changes in pair, Hunger, Fear and Rage(New York: Appleton & Co., 1929), 222，本书阐述了"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的应急功能"。

③Lowie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单一功能主义（Pure functionalism）和Thurnwald的混合功能主义（tempered functionalism）进行了区，分其不同之处如名称所示。显然，这与本讨论的目的并无多大关系。参见：R.H.Lowie,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7)。Chapter 13。

布朗（Radcliffe— Brown）经常将他的社会功能的工作概念（working conception）追溯到生物科学中。他依照迪尔凯姆(Durkheim)的方式，断言："一种周期性的生理过程的功能与该有机体的需要(即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协调一致的。"在社会领域中，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为社会关系网络所联结而成为一个统合的整体，"任何经常发生的活动——如惩治罪犯或丧礼仪式——的功能，就是该项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也是该活动对于维持社会结构延续所作的贡献"。①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论述在许多方面都与布朗不同，但二者都认为研究"社会或文化事项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功能分析的核心。马林诺夫斯基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曾对功能论的宗旨有所说明："这种理论的目标在于以人类学的事实（anthropological facts）的功能，以其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其在体系中相互关联的方式，来说明人类学各个发展层次上的事实……"②

稍后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象在社会或文化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类经常出现的语句，似乎抹煞了诸如"互赖"与"过程"等功能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任何文化事项都与其他事项有某种持久的关系，都在整个文化中有特定地位。这一假设并未在研究

①A.R.Radcliffe-Brown, "On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in Social Science", 载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5, 37, 395—6。同时参见他后来在皇家人类学会上的就职演说，在演讲中，他说："……我把社会标准化活动模式或思维模式的功能定义为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功能对结构的存在与延续作出贡献。类似地，在生命有机体中，心跳或胃液分泌的生理功能是器官结构的关系……"参见"On Social structure"载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0, 20, pt.I, 9—10。

② 马林诺夫斯基"Anthropology"，载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First Supplementary Volume, (London and New York, 1926), 132—133。

程序上给实地观察者或分析者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这些我们不在此详细说明。在此，我们只要知道晚近的论述都是透过渐进之辨析（progressive specifications）而廓清、扩展功能的概念。因此，克拉克洪（Kluckhohn）说："……如果某一特定文化单位界定了一种反应模式（a mode of response），而这种反应模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合适的，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适应的，则此一文化单位就是有功能的。"①

上述"function"一词的含义只不过是从其庞杂系列中仅抽取少数几个说明而已。该词包含许多概念，因此极易造成混淆。而以许多不同的术语表示相同的概念时，混淆更加严重。

（二）一个概念，不同的术语

很多术语与功能（function）一词混用，而且几乎变成功能（function）的同义词。这些术语包括使用、效用、目的、动机、意向、目标、后果。假若这些术语以及其他类似的术语确实是意指同一经严格界定的概念，那么注意其各种变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事实上，这些表面上具有类似之处的术语之滥用却使分析者逐渐偏离严谨的功能分析。每一个术语的含义都与它们共有的含义有所不同，而这些术语的含义却被当作推论的基础（不自觉地）。一旦这些含义逐渐偏离核心的功能概念时，这些推论就更加有问题了。用词的转移造成诸多的误解，我们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

下面一段文字是从一篇犯罪社会学的文章中摘录下来的，我

① Clyde Kluckhohn, Navaho Witchcraft, Papers of the Peabody Maseume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1941), XXII, No. 2, 47a.

们可以发现：表面上同义的术语，其意义暗中转移了，而基于这种转移所作的推论非常有问题。（引文中的关键词都加上着重号，借以帮助读者掌握论证的思路）。

> 惩罚的目的：很多人都试图去确定在不同时代对不同团体惩罚的目的或功能。许多研究者认为，惩罚系基于某一种动机。而有人则强调惩罚对于恢复因犯罪而削弱的该团体团结的功能。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曾经指出：在波兰农民中，惩治犯罪主要是为了恢复犯罪前的情境与团体的团结，报复则是次要的考虑。从这个观点来看，惩罚主要关切的是团体，犯罪者是次要的。另一方面，赎罪、威慑、报复、矫治、国家收入等等都可列为惩罚的功能。人们始终不明了上述何者为惩罚的动机。惩罚似乎出于许多动机，并履行许多功能。对犯罪之受害者以及国家而言都是如此。当然，现在的法律在目标或动机上并不一致，早期社会的情况可能也一样。①

我们首先应注意上述表面上意指相同概念的一些术语：目的、功能、动机、缘由、次要考虑、主要关切、目标。经过仔细推敲之后，可以看出，这些术语其实分属于极为不同的概念参考框架。在很多情况下，某些术语——动机、设计、目标和目的——显然是从官方的立场而言的；而其他术语——动机、次要考虑——则是从犯罪之受害者的观点而言的。而这两组术语都是指对于惩罚之结果的主观期望。但功能的概念仅牵涉到观察者的观点，而不必然涉及参与者的观点。社会功能系指可见的客观后果，而不是主观的意向（目

① Edwin H. Swtherland,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third editionl,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1939), 349—350.

观念能使我们脱离糊海，获致清明。①

以上对于各种术语及其不良后果的简要述评，可作为以后整理功能分析之概念的一个导引。从事功能分析时，对社会学之功能概念的使用应加以限制，同时也必须分清主观范畴的意向与客观范畴的后果，否则功能取向的真义可能随着各种定义的含糊而丧失。

三、功能分析中常见的几个假设

主要在人类学领域(但不仅限于人类学)，功能分析者通常采用三个相关的假设，下面将对它们进行介绍。这三个假设一直有争议，而且它们也表明对功能分析没有什么必要。

实际上，这些假设主张：第一，标准化的社会活动或文化事项对整个社会或文化体系是有功能的；第二，所有这些社会与文化事项都履行某种社会功能；第三，因此这些事项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这三个观念通常都是连带出现的，但我们最好分别加以考察，因为每一个观念都会产生各自的困难。

(一)社会功能一体的假设 (postulate of the functional unity of society)

布朗曾明白地提出这一假设：

一种特定社会习俗的功能，对作为系统运转的整个社会

①这两个关于动机和功能之间混淆的例子是从同一补充材料中引来的。即使布朗——虽然他通常避免这种事情——有时也不能对其作明确区分。例如"……在较为发达的社区内，互赠礼物与买卖或易物不是同一目的。如果要说它们是出于同一目的的话，那只是从道义上而言。赠物的目标是产生友情，而不这样做，就不能达到此目的"。究竟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或从当事者的角度，还是两者兼有，可以把它看作是交易的目的呢？参见，A.R. 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48), 84。

功能，这似乎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而不是一项公设。

克拉克洪考虑到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s)"对于社会成员或对于社会整体……是适应还是适合的可能性"，[①] 可见他察觉到这个问题。这是允许功能所助益的部分(unit)有所变异的第一步，一旦为经验观察所逼迫时，我们将会更进一步扩大这个部分变异的幅度。

功能一体的观念显然不是超乎经验检验的一项假设，恰恰相反，整合程度是一个经验变量，[②] 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或在不同的社会都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必然有某种程度的整合，这只是从定义上这样说——一种以假定为论据的狡辩。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有高度的整合——在这种高度整合的社会中，任何标准化的文化活动或信仰对于社会整体都有功能，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也都有同样功能。其实布朗只需要看看他所类比的领域，就会怀疑他的功能一体假设的正确性。因为我们发现，即使是生物有机体，其整合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常识性的假定告诉我们，有机体的所有部分必然朝向一个"单一"的目的而运转。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 我们知道，在神经系统或荷尔蒙的严密控制下，高度整合的有机体丧失躯体任何重要部分都将严重地影响整个体系，并且经常会造成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有些结构松散的低等有机体，即使丧失躯体某一重要部分，在替代的组织再生之前，也只是造成短暂的不便而已。这类组织较松散的动物，有的整合程度非常低，因而各部分可能彼此尖锐对立。因此我们若把海星倒翻过来，它的一部分脚会试图使身体朝某个方向

① Kluckhohn, Navaho Witchcraft, 46b。

② 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是索罗金早期有关社会整合理论的贡献。参见P.A.Sorokin, "Forms and problems of culture-integration", Rwral Sociology, 1,936, I, 121—41; 344—74。

翻转，而其他的脚却往相反的方向挣扎……。海葵(Sea anemone)由于稀松的整合，可能在离开一块岩石时，把紧附在岩石上的脚的一部分遗留在岩石上，这种动物遂遭受严重的分裂。①

假如有机体就已经是如此，则复杂的社会体系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很容易证明，人类社会功能一体的假定一再地违反事实。在同一社会中，社会习俗或情操对某些团体可能具有功能，而对其他团体则可能具有反功能。人类学家经常以"增进社区的团结"和"增进家庭的荣耀"当作情操顺应功能的例子。但正如贝特森(Bateson)②所指出的，增进个别家庭的荣耀足以破坏一个小的地方社区的团结。功能一体的假设不仅经常违反事实，而且它所具有的启发价值也不大。因此这一假设导致分析者忽略了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文化事项(习俗、信仰、行为模式、制度)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以及对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有不同的后果。

假如否定功能一体假定的观察与事实如此之多，而且如此容易得知，那么了解布朗及其追随者为什么还墨守这一假定是极为有趣的。下述的事实也许能够提供一条线索，即这一概念，就其最近的论述而言，是社会人类学家所发展的，即主要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学者所发展的。雷丁(Kadin)描述了"大多数原始文明的高度整合性"，这一假定对某些(即使不是全部)无文字社会可能相当合适。但这一可能有用的假定，一旦从小型的无文字社会，转用到庞大、复杂而且高度分化的文明社会，我们却在知识上付出了过

① G.H. Parker The Elementary Nervous System, quoted by W.C.Allee, Animal Aggreg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81—82.

② Gregory Bateson, Naven (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36), 31—32.

作为这些价值的仪式性表现，并作为失望、死亡与灾难所需要的情绪上的调整。①

这些观点是从迪尔凯姆的理论取向推演的，而迪尔凯姆的取向大抵基于无文字社会的研究，所以作者们倾向于只选取宗教的整合后果，而忽略了宗教在某种社会结构中可能带来解体的后果。试考虑下述非常普通的事实与问题：(1)不同的宗教并存于同一社会时，宗教团体之间经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只要了解一下欧洲社会宗教冲突的浩瀚文献)。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社会，宗教如何能造成该社会的整合？(2)人类社会得以统一(就其所显示的这种统一而言)主要是由于其成员拥有某些共同的终极价值与目的。但我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说，譬如在我们的社会，"无宗教信仰"者比起服膺宗教信条者，较少赞同某些共同的"价值与目的"？(3)如果一种宗教的内容、价值，与同一社会许多人服膺之其他非宗教的价值相左时，宗教又如何造成该社会的整合？(例如天主教会反对童工立法与世俗之制止剥削年幼的佣人的价值之间，显然有冲突。或者，在美国社会，各种宗教团体对生育控制的不同评价之间也有冲突。)

这类有关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之角色的普通事实，还可以大量列举。某些将宗教说成整合的，并且对其所适用之社会结构的范围不加限制的功能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当然都知道这些事实。我们至少可以说，从研究无文字社会所推演出来的一个理论取向，业已抹煞了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社会中，有关宗教的功能角色原本非常普通的事实。或许就因为功能一体假定的转用，遂抹煞了宗教战争、宗教法庭(这造成社会的分裂)、宗教团体之间惨烈冲突的整个历史。事实是，所有这些尽人皆知的资料都被忽略了，以迁

① 同前页注文，246。

就从无文字社会的宗教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解释。更为惊异的是，在上引的文章中，又说到"宗教根据情操、信仰与仪式提供整合"，而对宗教可能有的分裂作用竟然只字不提。

当然，这类功能分析可能意指：对于信仰同一宗教价值的人，宗教能够提供整合。但究其深意，似乎又不是这样。因为这只是断言，对于任何一套价值的任何共识(consensus)都可以提供整合。

这再次表明，把功能一体的假定(此假定可能相当切合某些无文字社会)并入一般功能分析的模型中是很危险的。典型的无文字社会，只有一个盛行的宗教体系，因此除个别的越轨者外，整个社会的成员与宗教社区的成员实际上是相同的。在这种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一套共同的宗教价值可能有的一个后果，就是增强共同的感情与社会整合。但这并不是一项可以应用到其他形态社会的通则。

我们还有机会再回来探讨时下宗教功能分析的其他理论含义。上文的分析仅说明不加限制地采用功能一体假设的危险。整个社会的一体性不可能在观察之前就断定，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观点。功能分析的理论构架必须要求明确地指出进行功能分析的各种单位，而这些分析单位对某一特定社会或文化事项具有功能。这个理论构架必须容许某一特定事项对个人、对次团体以及对较大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具有不同的后果、功能或反功能。

(二) 泛功能的假设 (Postulate of Universal Functionalism)

简言之，该假设主张所有标准化的社会或文化形式都具有正功能(Positive function)。和功能概念的其他层面一样，马林诺夫斯基又是以最极端的形式来表述：

文化功能观坚持下述原则，即在任何形态的文明中，任

何风俗、物件、观念与信仰都履行某种重要的功能……①

虽然克拉克洪认识到对于一种文化形式有功能的单位可以有所变异，但他和马林诺夫斯基一样，都假设所有现存的文化形式均有功能价值。("我的基本假设是……在某种意义上，除非文化形式构成的反应是合适的或适应的，否则它无法存续……")② 这种泛功能论是否是一项具有启发性的假设，还有待观察。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此一假设可能使分析者忽略既存文化形式的一些非功能的后果。

事实上，当克拉克洪将"功能"归之于似乎无功能的事项时，就等于承认任何既存文化事项都履行了某种功能，所以这种功能的赋予系出于"定义"而非出于"考察"。因此他说：

> 欧洲人的袖扣在现代并无实际的用途，不过却履行保存熟稔之事物与维系某种传统的功能。一般而言，人们若感觉行为上有一种连续性，若感觉他们自己贯彻正统的以及社会所赞许的行为模式，就会比较舒服。③

这种方式的功能赋予和直接描述文化模式或行为模式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大可假定所有既存的文化要素(可笼统地称之为"传统")都有(虽然并不是只有)最低限度"保存熟稔之事物，维系某种传统"的功能。这等于说，顺从任何既定之行为方式的功能使顺从者免受制裁。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很难有什么启发性。不过这却提醒我们应该探讨社会学者所赋予之功能的型态。在此

① 马林诺夫斯基，"Anthropology"，op, cit.，132。(虽然是用斜体字排印、但是用原文的精炼语言来衡量、它们也许是多余的。)

② Kluckhohn, Navaho witchcraft, 46.

③ 同上书，47.

我们可以提出一项暂时的假定，即虽然文化或社会结构的任何事项都可能有功能，但断定任何此种事项必然有功能，则言之过早。

泛功能论的假设显然是本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关于"遗存"(Survivals)之争辩的产物。社会遗存若按照里弗斯(Rivers)的说法是"一种风俗习惯……它不能以其目前的效用来解释，只有借其过去的历史才能理解"①的话，这个观念至少可追溯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②但是一旦文化进化论得势，遗存的概念对于重建文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无文字社会，似乎更重要。功能论者企图抛弃他们认为是零碎而且经常是臆测性的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因此对于功能论者而言，攻击遗存的观念就是攻击整个演化思想体系的象征。其结果，他们或许就是因为对于进化论的这个中心概念过度的反动，因而提出一项同样夸大的"假设"，即"任何风俗习惯在任何地方……都履行某种重要功能"。

遗憾的是，人类学先驱的论战却造成目前的过度夸张。社会遗存一旦被发现、承认与研究之后，就不可能以一项假设来排除。而且如果这些遗存的样品无法制造，这种争辩就会自动消释。进而我们可以说，即使此种遗存在当代文明社会中能够辨识，对我们了解人类行为或社会变迁的动力也没有什么帮助。遗存是记录历史的拙劣替代品，研究文明社会的社会学者不需要这种可疑的角色，即使忽略它们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失。但社会学

① W.H.R.Rivers, "Survival in sociology", 载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13, 6, 293—305。也见E.B.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1874), esp.I, 70—159；关于该问题最近的评述见Lowie,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44ff.，81f。有关该问题敏锐和有节制的说明，参见Emile Durkheim, Rules of Socio Logical Method, Chapter 5, esp. at 91。

② 修昔底德(Thucydides)(460？—395？B.C.)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译注

者实不必为了一场古老而不相干的争论，而采用一种不加限制的假设，称任何文化事项都履行重要功能。因为这也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而不是研究之前的一项结论。对研究真正有用的指导思想似乎是这样的暂时性假定，即现存的文化形式对社会整体或对某一次团体具有一种功能后果(functional consequences)的净均衡(net balance)，该次团体是指具有足够力量来维护这些文化形式使之完整不变者，不论是以直接的强制或间接的说服。这种观念可以避免功能分析集中于正面功能的趋势，而提醒研究者同时注意其他后果。

(三) 不可或缺性的假设 (Postulate of indispensability)

功能论者普遍采用的三个假设中的最后一个，就某些方面而言，最为含混。这种含混性在马林诺夫斯基下列引文中最为明显：

> 在任何形态的文明中，任何风俗、物件、观念与信仰都履行某种重要的功能，必须完成某种任务，因而是一个工作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①

从这段文字看，我们很难确定，他所断言的究竟是功能的不可或缺，还是履行功能之事项（风俗习惯、物件、观念、信仰）的不可或缺，抑或二者兼有。

这种含混在文献中甚为普遍。因此前引戴维斯与摩尔之宗教角色的说明，开始似乎是坚持此制度之不可或缺：“宗教之所以

① 马林诺夫斯基“Anthropology”，op cit.，132(斜体字部分)。

概念，对此概念下面就会略加考察。第二：假定为了履行这些功能，某些文化或社会形式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另一回事。这涉及“专门化的结构”以及“不可替代结构”的概念，因而产生种种理论上的困难。因为这一断言不仅明显地违背事实，而且随之而来的几个辅助性的假定，一开始就围绕着功能分析。这个假定忽略了下述事实，即其他社会结构（与文化形式），在某种尚待考察的条件下，可能履行对于团体之存续所必需的功能。下面我们必须提出一项功能分析的重要原理：正象同一事物可以有多种功能一样，相同的功能也可以为多种事物以不同的方式来履行。在此，功能需要乃是被当作特定社会结构变异的限度，而不是决定因素。换言之，履行某种功能的结构，可以有一个变异的范围。（此变异范围的限制涉及结构限制的概念，此容后详述。）

与不可或缺之文化形式（制度、标准化行为方式、信仰系统等等）的概念相对的是功能选择（functional alternatives），或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ts），或功能替代（functional substitutes）。这个概念受到广泛的承认与运用。但应注意的是，假若一个理论体系接受了特定文化形式不可或缺性的假设，则在该理论体系无法安置这个概念。因此，帕森斯在评价了马林诺夫斯基“诸如巫术等机制（mechanisms）的功能必要性”的理论之后，审慎地说：

> 在追求情绪上重要的目标（不限于巫术）时，这种不确定要素一旦掺入，至少功能上对等的现象就可能出现。① 而马林诺夫斯基却坚持：
>
> 因此，巫术在文化中履行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它满足

① 帕森斯，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Pure and Applied,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49), 58.

原始文明中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满足的一种需要。①

不可或缺的功能和不可替代的信仰—行动模式，这一对孪生的概念势必排除功能选择的概念。

事实上，功能选择或功能对等的概念，在任何采用功能分析框架的学科中都一再地出现。例如，在心理学中就被广泛运用，英格利希（English）的一篇论文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②又如在神经学中，拉什利（Lashley）根据实验证据与临床证据指出，“个别神经细胞已被专门化，以履行特定功能的假定”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某一特定功能可以为若干可能的结构所履行。③

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则更有可能避开特定结构之不可或缺性的假设，而有系统地运用功能选择与功能替代的概念。因为正如一般人长久以来所犯的错误——认为其他社会的“奇风异俗”与信仰“只是迷信而已”，功能论的社会科学家则可能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危险，第一：急于要发现这些行为与信仰的功能价值或适用价值；第二：拘泥于这些表面上有功能的行为方式，因而无法察觉其他可行的行动方式已经被排除了。因此在功能论者中，不乏有准备下述这种结论的人，即巫术或某些宗教仪式与信仰是有功能的，因为它们对于信仰者的心理状态或自信心是有效果的。然而，在一些事例中，这些巫术行为却抹煞而且代替了其他世俗的、而且更能适应的行为方式。如韦尔斯（F.L.Wells）所观察到的：

① 马林诺夫斯基，"Anthropology，"op.cit.，136。（斜体字部分）。

② Horace B.English，"Symbolic versus functional equivalents in the neuroses of deprivation"，载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37，32，392—94。

③ K.S.Lashley，"Basic neural mechanisms in behavior"，载Psychological Review，1930，37，1—24。

的假设时，我们发现不能假定所有社会都充分地整合，这是事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准备去发现不同程度的整合。而在检查宗教之功能解释的特例中，我们甚为警觉的是注意到这种可能性——虽然人性可能是相同的，但不能因此就断定无文字社会的结构和高度分化的"文明"社会一样。二种社会在程度上的差异——如一个社会存在若干不同的宗教，另一社会则不如此——可能使其间概念的转用非常危险。从对该假设批判性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个功能分析理论必须指明特定社会功能所助益的"社会单位。"此外，我们必须承认文化事项可能有多种后果，其中有些是功能的（functional），而其他或许是反功能的（dysfunctional）。

我们对第二项泛功能论假定（即主张所有现存的文化形式必然是有功能的）的评述，获得其他几点的考虑，在进行功能解释的整理时必须正视这些考虑。我们不仅要着意去探寻这些文化形式的功能后果和反功能后果，而且理论家的研究若要和社会工艺学（Social technology）有所关联，终究会面临一个难题，即发展一种评估各种后果净均衡的原则。显然，如果专家的建议只是根据对有计划之行动的部分后果（也许是随意选取的）所作的评估，则经常会发生错误。因此也就可能被认为无多大价值。

我们发现不可或缺性的假设伴随着两个不同的命题：其一断言某些功能的不可或缺性，由此产生功能必要性(functional necessity）或功能前提（functional Prerequisites)的概念；另一命题断言现存社会制度、文化形式等的不可或缺性，这一命题若加以适当探究即产生功能选择、功能对等、功能替代的概念。

此外，这三个假设（单独的以及共同的）乃是一般人指责功能分析必然牵涉到某种意识形态投注(ideological commitments）的根源。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功能分析的概念

时将会一再出现，所以往后的分析若要免去这种困扰，最好现在就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加以探讨。

四、功能分析与意识形态

(一)功能分析与保守的意识形态

在许多领域里，对功能分析都有一种日趋强硬的谴责，认为不论功能论在知识上有何价值，它不可避免地会投注于一种"保守的"(甚至一种"反动的")观点。对于某些这类的批评者而言，功能分析简直是十八世纪公共利益恒等于私人利益的论调之翻版。功能分析被视为亚当·斯密学说的世俗版，例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写道："自然的和谐，在神的引导之下，通过个人才能的发挥，促进人类的福祉。"① 这些批评者说：功能论只是保守的社会科学家的取向，他们为事物的现存秩序辩护，认为现存秩序本该如此，并且攻击变革的合理性，无论这种变革是多么的温和。这些批评者认为：功能分析者一贯忽视托克维尔(Tocqueville's)的警告，托克维尔告诉我们不要将熟悉的制度与必要的制度相混淆："……一般我们所说必要的制度，经常只是我们一向所习惯的制度而已……"功能分析是否必然会陷于这种谬误尚未可知，但我们考察不可或缺性的假设之后，充分认识到一旦采用这种假设，则极易遭受这种谴责。在指责功能分析中必然有保守偏见的批评者当中，麦达(Myraal)可算是最近而且是相当典型的一位，他说：

> 假若一事物有一种"功能"，则它是好的或至少是重要

---

① Jacob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载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7, 35, 206.

的。①"功能"一词只有根据一个假定的目的才可能有意义。②假若该目的未予界定或暗指未进一步界定的"社会利益"③，则在实际的蕴涵中容许有相当多的任意成分存在，不过主要方向已定，即根据其功能来描述社会制度，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目的论。④

麦达的前提比结论更富有教育意义。因为，就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他依据功能分析者经常采用的两项假设，而达到不加限制的谴责，说根据功能来描述制度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Commit）"一种保守的目的论"。但麦达对于假设本身的必然性，并未加以怀疑。有趣的是，一旦放弃这些前提，这种结果（Commitment）为什么不可避免？

事实上，假若社会学的功能分析过去导致了（Commit）目的论（更不用说是保守的目的论），它马上就会遭受，而且也应该遭受比这更严厉的谴责。它会象人类思想史上的目的论一样，遭遇到一种归谬论证（reductio ad absurdum）。功能分析者则可能遭遇到苏格拉底的命运（虽然理由不同），他声称神将我们的嘴正好摆在鼻子之下，使我们能享受食物的芳香。⑤或者象沉迷于神造论（argument from design）的基督教神学家，很容易为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之流所欺，他证明神显然"要我们常常喝酒，因为他使肘长正好能举杯而饮，不致过短或过长，

① 在此，麦达无意中把不可或缺性看作功能分析的内核。——译注

② 这不仅是无意而是谬误。——译注

③ 此处麦达可能注意到了功能一体假设的含混。——译注

④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II, 1056(用斜体字和用括号标明的部分)。

⑤ Farrington 对伪目的论的观察有了更进一步的兴趣，参见他的 Science in Antiquity(London: T.Butterworth, 1936), 160。

'让我们来歌颂，然后一杯在手，这仁慈的智慧；让我们来歌颂并且畅饮。' "① 这些神学家也可能被较严格的说明所欺，例如米契利特（Michelet)评论道："自然安排万物是多么的美妙啊！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发现一个准备来照顾他的母亲。"② 功能分析象任何其他接近目的论的思想体系一样，虽然它设法避免越界进入那个陌生而贫乏的领域，但一旦功能分析采用不可或缺性的假设，即认为所有现存社会结构都必然履行某些重要的功能，则功能分析将会导致荒谬的结论。

(二)功能分析与激进的意识形态

有人指责功能分析必然导致这样的观念，即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正当的，或现存的世界乃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有趣的是，另一些人却得出与此恰恰相反的结论。这些研究者例如拉比尔（Lapiere）宣称功能分析在观点上（outlook）是一种批判性的探究方法，而在判断上则是一种实效论的（Pragmatic）的探究途径：

> 在社会科学中，从结构描述转移到功能分析，其实有一种较初看之时更为深刻的意义。这种转移代表社会绝对论（Social absolutism）与基督教神学道德论的一种决裂。假若社会结构的重要层面是其功能，那么没有任何结构可以只根据结构来判断。事实上这意味着：一种社会结构并没有它固有的价值，因为它的功能价值是随着时空之不同而有所

①见于 Franklin给 AbbèMorellet 的信中，引自 Dixon Wecter 的 memoires, The Hero in American, (New York, Scribner, 1491), 53—54.

②弗洛伊德在Michelet的The Woman中吸取了这种说法。

不同的。例如特定的家庭制度，只有当它的功能满足集体的目的时，它对集体的生活才有价值。

对所有相信特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的人来说，集体行为的功能探究无疑会触怒他们。因此，对于相信教会服务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是教会服务的人来说，说某种教会服务只是形式上的活动，没有宗教意义，或说某些教会服务在功能上与戏剧差不多，或说另一些教会服务与胡闹和宴会差不多，都是冒犯常理的说法，是对善良人们的虔诚的一种打击，或至少是一个可怜的傻瓜的胡言乱语。①

功能分析可以被某些人认为在本质是保守的，而被另外一些人认为在本质上是激进的，这一事实表明，功能分析在本质上既非保守，也非激进，并且暗示，功能分析并未在内部真正有意识形态投注（ideological commitment），虽然象其他形式的社会学分析一样，它可以注入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哲学之中，一种理论取向被赋予相反的意识形态含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们来考察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也许多少有些帮助。在这个例子中，社会学和方法论的概念被赋予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拿这个例子来和功能分析比较。这个比较的例子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言人，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职业革命家——卡尔·马克思，以及他的亲密助手与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Richard LaPiere,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38)55—56(斜体字部分)。

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	相比较的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取向
一、"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上就被神秘化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第一位以博大而有意识的方式表明其一般运转形式的学者。他给辩证法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你要在这神秘的外壳内发现理性内核的话，必须将它翻转过来。	一、某些功能分析者毫无理由地假定，所有现存社会结构都履行某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这完全是信仰，神秘主义，而非持续的、有系统的考察的产物。一个假设若要为社会科学家所接受，必须是辛苦所得，而非来自继承。
二、"就其神秘形式而言，辩证法在德国大行其道，因为它似乎把事物的现状理想化并且美化。	二、功能一体、功泛能论与不可或缺性三大假设构成一个前提系统，这些前提必然导致美化事物的现存状态。
三、"就其理性形式而言，辩证法为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所深恶痛绝，因为辩证法广泛而肯定地承认事物的现实状态，同时也承认这种事态的反面，即承认它必然会趋于崩溃。	三、功能分析就其较具经验取向，而且较具精密的形式而言，经常被某些认为现存社会结构永恒不变的人所怀疑。较正确的功能分析不仅包括现存社会结构功能的研究，也包括现存社会结构对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人、次群体、社会阶层、以及较大社会的反功能的研究。功能分析暂时假定：当一个现存社会结构之各种后果的净均衡显然为反功能时，就发展出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变迁压力。很可能，在超过某一点时，这种压力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多少是预定的社会变迁方向。不过这种说法有待验证。
四、"因为它将任何历史发展的样式（historically developed form）都看作是不断变动的，因而对其暂时性质的考虑决不逊于对其暂时存在的考虑；因为它绝不让任何事物强加于其上，因此在本质上，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四、虽然功能分析经常专注于静态的社会结构而轻忽社会变迁的动力，但这并不是功能分析的本质。如果不仅注意功能，而且注意反功能，则这种分析方式不仅能评估社会稳定的基础，也能评估社会变迁的潜在源头。"历史发展的样式"也许是有用的词语，可能提醒我们：社会结构一般都经历显著的变迁，推动各种形式的变迁的压力则有待发现。若功能分析专注于功能后果，则会导致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若专注于反功能后果，则会导致极端激进的乌托邦。就其本质而言，它既非保守的意识形态，亦非激进的乌托邦。

① 该段未加增删引自 Karl Marx, Capital (Chicago: C.H.Kerr, 1906), I, 25—26。

这一有系统的比较是以暗示，功能分析并不比辩证法更必然地接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投注。这并不是说这种投注不常常暗含在功能分析的著作中。但这似乎与功能论无关，不是功能论的本质。此外如同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误用”并不否定“应用”的可能性。功能论经过批判性的修正之后，相对于各种主要的意识形态体系而言，遂成为中立的。达到这一程度，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之下①，功能分析将类似于物理科学的理论或工具，无所谓被各种对立团体所使用，而其使用的目的也经常与科学家的意向无关。

(三)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功能分析

下面我们再来简要讨论宗教的功能，以显示功能分析的逻辑如何为意识形态立场相对立的人所采用。

宗教的社会角色长久以来一再为人们所观察与解释。在这些观察之中，一个不变的核心，乃是强调宗教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制度性的手段。例如柏拉图之“高贵谎言”的概念，或亚里士多德的见解，谓宗教“是为了要说服民众”，或波里布斯(polybius)类似的判断，谓“大众……只能为神秘的恐惧以及悲剧性的敬畏所控制。”孟德斯鸠评论罗马立法者，说他们“教导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敬畏上帝，并利用这种敬畏引导他们到其所希望之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也亲身体察到“英国官员热衷推荐给‘印度政治犯’的唯一书籍就是宗教书籍或小说。奇怪的是英国政府为什么单单偏爱宗教题材，并且一视同仁地鼓励所有宗

① 不应用它来否认这一重要事实，即社会科学家(含蓄的或公开的)可能有助于选择调查研究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以及利用他的成果于某些目的，而非其他目的。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功能分析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无内在的投注(intrinsic Commitment)，这在前面的讨论中已作说明。

教"。[①] 因此，在人类思想史上似乎存在有一个悠久的传统，以种种形式断言宗教已被用来控制大众。由陈述此命题的语言，似乎也可窥见作者的意识形态投注。ideological commitment。

然而，当前宗教的功能分析又怎样呢？帕森斯在关于宗教社会学若干主要理论的批判性统合中，综述了一些有关"宗教之功能意义"的基本结论：

> 假若支持它的道德规范和情操如此重要，那么除了外在的强制过程之外，维持它们的机制是什么呢？迪尔凯姆的看法是，宗教仪式的主要意义在于表达并强化这些情操，这些情操对社会整合极为重要。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看法和马林诺夫斯基对于丧礼之意义的看法有明显的关联。马林诺夫斯基视丧礼为在严重之情绪紧张的场合中，重新加强团体之团结的一种机制。因此迪尔凯姆对宗教与社会结构之间特殊关系的某些层面，了解得比马林诺夫斯基更为深刻，而且是从一个不同的功能观点提出这个问题。迪尔凯姆将这种观点用于"社会整体"，这是从个人之紧张的特殊情境中抽象出来的[②]。

帕森斯在总结宗教社会学在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时说："韦伯的分析的最大特点，或许是证明了在世俗生活中社会所认可之价值与目标的变异与各大文明宗教哲学的变异之间的对应关系。"[③]

杨格（Donald Young)）探讨宗教在美国各种族与民族次团体中的角色时，实际上也认可"世俗生活中社会所认可的价值与目标"与其"主要的宗教哲学"之间的紧密对应：

---

① Jawaharlal Nehru,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John Day 1941), 7。

② 帕森斯，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61(斜体字部分)。

③ 同上书，63。

少数民族宗教的一项功能，乃是使人安于低劣的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歧视。宗教履行这种功能的证据，可在美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中发现。从另一方面来说，宗教制度也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刺激并支持人们的反抗低劣地位的手段。因此一般来说，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较异教徒柔顺。一些与使用摩根（peyote）有关的特殊祭仪、印第安人的震颤教会(Shaker Church)，以及鬼舞有关的礼拜，这三者都包含其基督教与本土的成分，它们都力图发展出能适应个人与团体情况的宗教表达方式。后来由于强调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而鼓吹暴乱。黑人之基督教信仰，虽然鼓励对于现存秩序的口头批评，却已强调接受现世的苦难，以待来世之幸福。欧洲与墨西哥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基督教与犹太教，虽然都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也都强调来世的酬报，而非当下的直接行动。[①]

这些纷歧的观察，虽各有其不同的意识形态根源，却有一些基本的类似点。第一，他们都很注意特定宗教制度对于社会所盛行的情操、情境释义（definitions of situattion）与行动的后果。他们所观察到的后果相当一致，如增强现行之道德规范、顺从这些规范。雄心与满足之延缓实现（如果教义有这种要求的话）等等。但正如杨格所指出的，宗教在某种条件下，也会引起叛乱；或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可以推动或引导改革社会结构的行为。因此，我们要论断所有的宗教都只会造成大众的冷漠，似乎还言之过早。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见解中暗示地，而功能主义者则在其

---

① Donald Young, American Minority Peoples, (New York, Haper, 1937), 204(斜体字部分)。关于在美国的黑人教堂的功能分析，参见：George Eaton Simpson and J. Milton Yinger,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New York: Haper & Brothers, 1953), 522—530。

见解中明白地肯定一个中心论点，即宗教体系的确会影响行为，它们不只是附属现象（epiphenomea），而且是行为的一个局部独立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大众"接不接受某一种宗教的差别，正如与一个人吸不吸鸦片的差别一样。

第三，马克思学说和较古老的理论都论及宗教信仰与仪式对于社会各种次团体以及各阶层——例如"大众"——的不同后果。就此而言，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杨格也是如此。如前所述，功能论者并不限于探讨宗教对"社会整体"的后果。

第四，在此有一个疑虑可能发生，即功能论者强调宗教乃是"强化某些对社会制度性整合最重要之情操"的一种社会机构。如此一来，他们的分析架构，在实质上和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两样了。因为马克思的譬喻"宗教是群众的鸦片"，若转变为中立的社会事实的陈述，也是断言宗教不但是一种强化其信徒神圣情操（sacred sentiment）的社会机构，而且也是强化世俗情操(Secular Sentiment)的社会机构。

二者的差异只是在于对这种普遍接受的事实的评价。如果功能论者仅涉及"制度性整合"，而不探讨围绕着不同价值与利益而整合的各种如果，则他们只局限于纯形式的解释。因为整合纯然是一个形式概念（formal concept）。一个社会可能围绕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极权统治、以及低阶层的驯顺等规范而整合，也可能环绕着开放性的流动(open mobility)、以及低阶层之广泛的自我表达与独立判断等规范而整合。而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加限制地断言所有的宗教，无论其教义内容与组织形式如何，都是群众的"鸦片"，则他们也转而为纯形式的解释。他们不承认特定的宗教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可能激发群众行动，而不是使群众行动瘫痪，如杨格所指出的。正是在宗教功能的评价而非分析逻辑上，功能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同时，也正是这种评

价，容许将意识形态内容倒入功能论的瓶子中。① 瓶子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装意识形态的毒液，也可以装意识形态的甘露。

---

①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也许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普遍。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在情景分析中的基本一致为对该情景的评估时的基本不一致所搅混。其结果，是错误地假定，在认知程序和发现上有着成分上的差异，而不是他们在价值体系上的差异。例如，考察一下最近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和拉斯基Harold Laski 之间公开争论和冲突的突出事例，Churchill这一派人作出的一般假定是，双方在实质性的前提上不一致，该前提是战争年代是否比在和平时期更易接受社会变迁。下面试比较一下两人见解的摘录：

"先前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早在四年多以前就已经消失了，生活早已为战争的咒变为异常紧张，在那种神秘力量的影响之下，人们都深感死亡、痛苦和劳累的威胁，在人与人之间、阶级之间、国家之间都可能结为一体并视为同志，大敌当前和共同的事业使得这种联合和情谊更为牢固。但是，现在这种符咒已经打破，要实现某些目的已经太晚，实现其他的目的又太快，人们感到：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每一个战胜国都沉湎于它夕日的水准和先前的安排，但是，以后发现这些国家陷入了更大的绝望；他们的结构是虚弱和松散的，它们似乎是狭窄的、过时的"。

随着战争的幽灵正在消失，新的困难堆积如山，大多数一时的指导权和控制权也不复存在……对于忠实的干苦力的群众来说、战争的胜利如此完美以致不需作进一步努力……人们都深感疲劳。虽然存在维护自身的各种破坏因素，但人们心身俱损，革命进入低潮。

为解救国家危险而激发起的热情，其强度远超过人们原来的能力，所有东西都象齿轮一样装上了战争这架机器并高速运转。一旦这种高度刺激不复存在，每人都意识到沉重的压力，原来的生活节奏迅速得以极大放松和放慢。没有哪一个社区能以这样的速度耗尽财富和生命之能。其中大多数表面上看是在高层的脑力劳动者的行列中，他们曾经为心理上的刺激所鼓舞，而现在这种刺激已不复存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句话，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和平了，神经和体力都精疲力竭，那些以前无所感觉和无所用心的东西则显而易见"。

"战争气氛允许甚至迫使进行和平时期所不可能进行的革新和实验。我们以往生活习俗的被打破，使得我们习惯于詹姆斯（William James）称之为打破各种习惯的新习俗……我们发现自己为尽忠报国，甚至为其作出牺牲的宣传所激励，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对我们有刻骨之仇。共同的危险成为建立新友谊的基础，而这种友谊能否持久完全有赖于这种基础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如果它是暂时的，那么战争结束所遗留下来的很多重大问题将使得双方原来的差异更为加剧。

"因此，我认为，在某个时期（就象现在一样）各种使得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而不是相互的差异的情况，将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商作出我们需要的变革。

"现在我们能够进行这些变革，因为已具备这种条件，很值得怀疑的是在条件不具备时，我们能够通过协商进行这些变革。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战争使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同意停止特权的人感到疲劳和对古老方式的渴望，这种要求是很难抵制的。

"在所有的革命中，都有一个惰性时期，在这个时期，疲劳迫使革新的过程中止。这个时期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来。在这生活的高潮之后，人类制度似乎要求安静和轻松。为了在这停暂时期求生存，我们要开始新的、困难的尤其是不可知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反对纳粹主义的敌意消失时，人们则更渴望按常规和习惯行事，因为它们不迫使他们参与战事而感受心灵的痛苦，也不扰乱他们对生活的向往。"

（接下页注）

五、程序逻辑

——功能取向的流行

功能取向当然不是新的，也不限于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实，我们若从它在许多其他学科早期的广泛应用来判断，则它来到社会学界已是相当晚了。① 功能论的中心取向——表现于下述方式，即从某一社会文化事项对于所属之较大结构的后果来解释这

(接上页注)

上面左边的引文里是邱吉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为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而写，参见：The World Crisis, Volume 4, The Aftermath,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8),30, 31),33、右边的引文是拉斯基在第二次大战所作的观察。据说邱吉尔的政策是："把任何有争议的问题拖延到战争胜利，这意味着……生产关系保持不变，直至获得和平。因此，战争期间国家没有批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项目。"参见：Revolution of Our Tim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3), 186, 187,193,227—8,309。除非邱吉尔早已忘记他对第一次战争后果的分析，那么他和拉斯基作出的诊断是显而易见的，即不太可能在战后时期马上着于进行卓有成效且经精心设计的社会改革。在如何评价着意设计变革的热望时，其差别则非常明显。

人们也可能顺便注意到，邱吉尔和拉斯基两人的一致看法——即英国战后时期是群众昏睡的时期，且都无心筹划制度的变革——并不为实际事件所证明。第二次大战后的英格兰实际上并没放弃计划变革的想法。

①一位功能主义者的观点的流行已经多次为人所注意。例如，"在所有思维领域内相同趋向被注意的事实证明——现在有一种按照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解释世界，而不是按照个别存在的实体来解释世界的一般趋向。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Claude Bernard在生理学中，Alexis Carrel在生物学中，Frank Lloyd Wright 在建筑学中，怀特海在哲学中，W. Koehler 在心理学中，Theodor Litt在社会学中，Hermann Heller在政治学中，B.Cardozo在法学中：这些人代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代表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不同方面，因而他们都是探讨具有现实感的问题，而现实感不寻求材料的实质性，而是理解现象的功能互动 (functional interaction)"。参见：G.Niemeyer, Law without For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300。众家之言再次表明：功能观点的协调并不需要政治和社会哲学上的一致。

一事项——实际上可在所有的有关人的科学中发现——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人类学和社会学。① 功能观

①评价功能主义的文献几乎与各种表明这种趋向的科学文献一样多，且比它们更为庞杂。空间和直接关注的局限性使参考资料也具有局限性，参考资料必须包括扩充了的观点和在科学思想中间接引起的各种发展的讨论。

对生物学而言，一般的现在称之为经典的来源是 J.H.Woodger, Biological Principles,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29), esp, 32 ff。相关材料参见：Bertalanffy, Modern Theories of Deyelopment, op.cit., particulary 1—46, 64ff., 179ff.; E.S.Russell,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velopment &. Heredity; A study in Biological Meth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esp. 186—280。预测式的讨论参见：W.E.Ritter, E, B.Wilson, E. Ungerer, J Schaxel, J, von Uexküll等人的著作。J.Needham的文章——例如"Thoughts on the problem of biological organization", Scientia, August 1932, 84—92——可以与之匹敌。

对生理学而言，参见：C.S.Sherrington, W.B.Cannon, G.E.Coghill, Joseph Barcroff的著作，特别是参见C. S.Sherrington, 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3); W.B. Cannon, 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 第12章，和The Wisdom of the Body, (New York, W. W. Norton, 1932) 几乎所有都是有关"社会群体自动平衡"(Social homeostasis) 的不幸结局；G.E. Coghill, Anatomy and the Problem of Behavi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Joseph Barcroft, Feature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对心理学而言，实际上任何对动力心理学的基本贡献都是恰当的。完全可以认为，弗洛伊德主义的概念与功能主义一脉相承，因为主要概念不变地应用到功能（或功能失调）的框架上。有关概念的不同排列，参见：Harvey Carr, "Functionalism", in Carl Murchison, ed. Psychologies of 1930, (Clark University Press, 1930)；涉及这套概念的文章参见，J.M.Fletcher, Homeostasis as an explanatory principle in Psychology, 载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2, 49, 80—87。功能方法用于人格的研究，参见 Clyde Kluckhohn & Henry A. Murray, ed.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 Culture, (New York, A.A.Knopf, 1938)中的第一章，3—32。勒温群体对功能主义取向的重要方面已得到广泛承认。

（接下页注）

点的流行本身并不能保证它的科学价值，但却说明，逐渐积累的经验，已迫使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得不承认这一取向。这些观察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人，如将人视为生物机体、心理行动者（psychological actor）、社会成员、以及文化载体。

在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其他科学的经验，对于社会学的功能分析，能否提供有用的方法论模型。然而，从这些较精确的学科学习分析程序的法则，并不是采用它们特殊的概念与技术以及其他复杂的仪器。例如，若要从成功地运用于生物科学的程序逻辑中获得益处，绝不是要接受一些不相干的类推（analogy）与比附（homology），这些长久以来一直使生物社会学（organismic sociology）的倡导者着迷。考察生物研究的方法论框架（methodological framework）并不是要采用它们的实质性概念。

例如实验法的逻辑结构，在物理学、化学或心理学领域并无不同，但实质假设、专门工具、基本概念、以及实际的困难可能就大不相同。实验法的近似替代品（near—substitutes）——受控观察、比较研究与识别法（discerncing）——的逻辑结构在人类学、社会学或生物学亦无差别。

下面我们来看看坎农（Cannon）的生物学的程序逻辑。我

（接上页注）

对于法律方面，批评性文章参见Felix S. Cohen, "Transcedental nonsense &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Columbia Law Review, 1935, xxxv, 809—849，以及书中大量注解资料。

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方面，通过本章可以见到主要的参考模式。Robert Redfield 编著的一书为跨越两者之间的沟壑架设了一座桥梁，并将生物因素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生物学和社会系统中的整合层次，参见：Biological Symposia, 1943, VIII。关于功能分析概念框架的重要方面，参见：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 1951)。

满足这些需要的典型安排（结构与过程）。第三，如果某些满足这种需要的典型机能被破坏，或功能失常，则观察者必须能发现补救的机能（如果有的话）以履行必要的功能。第四，这个步骤蕴涵于前面几个步骤中，即不仅要详细说明履行功能的安排，也要详细说明功能需要所适应的结构。

在生物科学领域，功能分析的逻辑如此之完备，自然能从事健全的分析。社会学的情形则不然。在社会学中，关于功能分析有非常不同的精心设计的概念。对某些人来说，功能分析大致（甚或完全）是建立一种社会体系“诸要素”之间的经验关系；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显示一种社会标准化的行为或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的价值”；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却是详细说明正式的社会组织的目的。

我们若考察社会学中各种不同的功能分析，则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相对于生理学家而言，社会学家一般都没有运用可理解的操作程序，并未有系统地搜集所需要的资料，没有采用同一套概念，也没有使用相同的效度标准（Criteria of Validity）。换言之，我们发现生理学有一套标准化的概念、分析程序与分析设计；而在社会学中，概念、程序和设计的选择漫无标准，似乎依赖社会学家个人的兴趣和口味。两门学科之间的这种差异，当然和生理学家、社会学家所要求的资料性质的差异有些关系，或许大有关系。经常为人所提及的是，生理学有相当多的机会从事实验研究，而社会学却很少有这种机会。但这很难解释为什么生理学的程序与概念井然有序，而社会学功能分析的程序与概念却杂乱无章，而且破绽百出。

六、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范式

在此我们要提出一个主要用于功能探究的概念和问题的范式，以作为整理社会学功能分析的一个起点。这一范式的主要部分，在上文我们批判地考察功能分析所使用的词汇、假设、概念和对其意识形态归属的讨论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了。这一范式以简洁的形式将这些全部集中在一块，因而我们可以同时检查功能分析的主要需求，还可以有助于对暂时性解释的自我修正。若概念散见于冗长、散漫的说明之中，则很难达到这种效果①。范式将功能分析之概念、程序、与推论的核心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范式并非重新引介一组范畴，而只是在检讨当前功能分析的研究理论之中，迫使我们注意到一些概念与问题的一个整理与排比。（参见上述各段可知此范式中的每一范畴的基础都已经具备了）

(一)功能归属事项(The item(s) to which functions are imputed)

任何社会学资料都可以（而且许多资料实际已经）作为功能分析的对象。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分析对象必须是一个标准化的（即已有定论而且可以重演的）事项，诸如社会角色、制度模式、社会过程、文化模式、文化事制的情绪（Culturally patterned emotions）、社会规范、团体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的机构等等。

基本问题：假如特定的事项要接受有系统的功能分析，观察

① 关于此类分析范式之意义的简要陈述，参考本书中其他关于范式的解释。

区分，即主观目标与客观后果相符的情况（显性功能）和二者不相符的情况(隐性功能)。

显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是有助于体系之适应或顺应的客观后果，这种后果为此体系之参与者所预期并认可。

隐性功能（latent function）与显性功能相对应，这种后果既非预期的，亦未被认可。[①]

基本问题：若本来是隐性功能，后来转变成显性功能，其结果如何？（这涉及人类行为中的知识角色问题，以及人类行为之"操纵"的问题。）

(四)功能所助益之单位的概念（concepts of the unit subserved by the function）

我们巴经看到进行"整个社会"履行某些功能的分析之困难。因为事项可能对某些个人和某些次团体有功能，而对其他人和其他次团体则有反功能；因此必须考虑到这一事项对各种单位的后果；这些单位包括：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人、次团体、较大的社会系统、以及文化系统。（用专门术语来说，这蕴含着心理功能、团体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概念。）

(五)功能需求(需要、前提)的概念

① "行动的非预期后果"与"隐性功能"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因为前面关于范式那一部分已包含了这一关系的阐述。行动的非预期的后果有三种类型：

1.对特定体系有正功能，也包括隐性正功能；

2.对特定体系有反功能，也包括隐性反功能；

3.与体系毫不相关，既无正功能影响，也无反功能影响，例如，无实际价值的无功能后果。

最初的陈述，见默顿，"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36，I，894—904；至于这些后果类型的图表，见 Goode，Religion Among the Primitives，32—33。——译注

任何功能分析或明或暗地都会有体系的功能需求概念。如我在别处所说的① ,这是功能论中最含混的概念，而且在经验上极易引起争论。社会学家使用功能需求的概念好象是同语反复(tautological) 或事后的解释，局限于一个特定体系的"生存"条件，而且倾向于不但包括社会"需要"也包括生物"需要"(如马林诺夫斯基即持此见)。

这牵涉到一个难题，即建立功能需求的类型（普遍的与特定的）；以及证明这些需求假定的程序等等。

基本问题：在严格的实验法行不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诸如"功能需求"这类变量的效度？

(六)履行功能机制(mechanism)的概念

功能分析在社会学中和在其他学科如生理学、心理学中一样，需要对履行某一特定功能的机制，作一"具体而详尽"的说明。这不是指心理机制，而是指社会机制〔例如角色分隔 (role-segmentation) 、制度性要求的隔离 (insul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mands) 、价值的顺序等级 (hierarchic ordering of values)、社会分工、礼仪的制订等等。〕

基本问题：相对于大量的心理机制的清单，目前可能的社会机构的清单是什么？在辨识这些社会机制的运行时，会衍生出哪些方法论的问题？

(七)功能选择(功能对等或功能替代)概念

如上所述，一旦我们扬弃特定社会结构的功能不可欠缺的假定之后，马上就需要某种功能选择、对等或替代的概念。因而将

① 默顿，"Discussion of Parsons , '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theory', "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9, 13, 164—168。

注意焦点放在可满足某一功能需求之事项的可能变异范围上，就解除了现存事物与必然事物的认同。

基本问题：因为在科学中，要证明一个所谓的功能选择的对等，理想上需要严格的实验方法，而这在大规模的社会情境里通常行不通，那么何种可行的考察程序最逼近实验的逻辑？

（八）结构脉络（或结构限制）概念

在一个社会结构中能够履行某一特定功能的事项，其变异范围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在前面的讨论里，我们曾一再注意到这一点）。一个社会结构诸要素的互赖，限制了变迁的可能性或功能选择。社会结构领域里的"结构限制"的概念与戈登威泽(Golden-weiser) 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所提出的"有限可能性原则"相呼应。如果不能认识到"相互依存"以及连带而来的"结构限制"两个概念的关联，则极易导致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暗地里假定一个社会体系的某些要素能力加以排除，而不致影响该体系其余的要素。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如马克思）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如马林诺斯基）都承认这一点。①

①前面这段引证摘自马克思文献，但这些只是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强调结构脉络重要性的部分阐述。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 Co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ef Political Economy）(1859年初版，再版时收在马克思选集第一卷，354—371）一书中，马克思观察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将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P.357)也许马克思关于特定社会结构之强制性影响的论述，最著名的是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一书中的第二段："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人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存的环境中创造历史。"(引自原文的释义，见Marx, Selected Works. II，315。)据我所知，在众多注意到此类陈述之理论意义的评论家中，A.D.Lindsay是最富有洞察力的。见其短篇著作：Karl Marx's Capital, An Introductory Ess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尤其见其中27—52页。（接下页注）

基本问题：一特定的结构脉络如何严密地限制某些事项的变异范围，而在此变异范围之内，该事项能有效地满足功能需求？在某种尚待确定的条件之下，是否有一个无差别区域，在此区域内任何选择项都能履行某一功能？

（九）动态与变迁的概念

如上所述，功能分析者倾向于将注意焦点放在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而忽略了结构变迁的研究。

但是强调静态研究并不是功能论的本质，而是源于早期人类学功能论者的对当时从无文字社会推测现代社会之趋向的一种反动。这种强调当初介绍到人类学自有其用处，但在某些社会学功能论的作品中，这个特征却毫无益处地被保留下来了。

反功能的概念在结构的层次上蕴含强制、紧张、压力的概念，可提供一条研究动态与变迁的途径。我们观察到的反功能如何能够被包括在一个特定结构之内，而不至于造成不稳定？强制、紧张的累积自然产生一种变迁的压力，但变迁的方向是否会导致紧张的消减？

基本问题：功能分析者普遍关注社会均衡的概念，是否会使他们忽略社会不均衡的现象？社会学家如何适当地评估社会体系中逐渐积累的紧张与压力？社会学家利用结构脉络的知识以预测最可能的社会变迁方向，其正确性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十）功能分析的效度问题

在这个典范中，有好几处都使我们注意到假定、归属与观察

（接上页注）思想体系含意的不同但理论意义近似的其它阐述，参考马林诺夫斯基，"假如文化需要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满足需要的方式就很少，因此，根据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布局也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引自"Cutural"，载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p.cit., 626.

的效度问题①。这首先要对于社会学的分析程序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这种分析程序必须是最接近实验逻辑的。这就需要有系统地检讨比较分析（不同文化与不同团体）的可能性与限制。

基本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功能分析为选取适当的社会体系样本的困难所制约？而比较（准试验）研究依赖于这些社会体系的样本。②

（十一）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蕴含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强调了功能分析在本质上并没有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信仰（Commitment）。但这并不否认功能论者所提出的特定功能分析或特定假设可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就变成知识社会学的一个特殊问题：即功能社会学家的社会地位，在何种程度上（例如，委托他担任某一特定研究的代理人）影响他对某一问题选择某种表述而不选择另外一种，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的假定和概念，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限制他从他的资料中作出推论的范围？

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发现一个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植根于社会学家所采用的基本假定究竟到何

①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认为功能分析是解释社会学资料的一种方法。这并不否认功能取向在使社会学家意识到收集各种可能被忽略的资料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也许没有必要重申这个原理，即重申一个人的概念完全可以决定对资料的取舍。撇开资料这一术语的词源不讲，资料不是现成的，而是凭借概念的帮助设计创造出来的。在发展功能解释的过程中，社会学分析家总是发现很有必要去获得不同于最初期望的资料。资料的解释与收集就在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中难以分开地联结在一起。这些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见第二章。

② George P.Murdock's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 Macmillan, 1949)一书足以说明，跨文化调查中运用的程序在解决功能分析的某些方法论问题方面展示了光辉的前景。参见George C.Homans和David M.Schneider的功能分析程序，Marriage, Authority, and Final Caus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种程度？这些假定是否与社会学家的地位及角色有关系？

在我们对这个范式的某些部分做较深入的研究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范式的用途。毕竟，概念的区分排比可以无穷繁衍，而对社会学的分析没有实质上的帮助。那么，范式的目的是什么？如何使用它？

范式的目的(purposes of the paradigm)

范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适当的功能分析，不过这个引导只是暂时性的。这个目的显然是指范式包含最低限度的一组概念，社会学家必须运用这组概念，以进行适当的功能分析，其结果是：我们在此时此地可以利用它作为对现存之功能分析作批判性探讨的指导。因此，我们要以这个范式作为功能分析的引导，并帮助我们评估以往研究的优劣。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允许我们应用范式的有限部分，对有选择的事例进行批判性的评价。

其次，这个范式将直接探讨功能分析基本的假设（postulates）与（通常是隐含的）假定（assumption）。如前所述，有些假定是极为重要的，有些则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还有一些则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说是会使人误入歧途的。

第三，这个范式将使社会学家不仅注意各种功能分析狭隘的科学含义，同时注意它们的政治含义甚至意识形态的含义。一个功能分析预设某种隐含的政治前景以及与“社会工程学”的有关方面，均为该范式所关往。

如果要详细探讨这个范式所牵涉到的种种问题，显然已超出本人的范围。这个工作有待一本专著来作较充分的阐述。因此本文剩余的部分只是把这个范式前面几项，应用到社会学现有的若

于功能分析的案例中。我们经常会以这几个案例当作讨论特别问题的跳板，不过这些问题以现有的案例只能作不完全的说明。

七、功能分析的事项(ITEMS)

初看之下，要对事项进行功能分析，似乎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所牵涉的问题并不多。因而假定，应该尽可能充分和精确地描述它。但仔细想想，这项原则对于观察者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作用。对于一位从事功能分析的新手，试想这么一项规则，只要他回答下列问题：我究竟要观察什么？哪些是我必须记录的？哪些可以忽略？

目前我们对这类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问题之所在，而这些问题其实在以往功能论者的实际研究可以找到部分答案。为了从以往的功能分析案例中推断出他们的答案并予以证明，就有必要问下列问题：无论分析什么事项，哪种资料是一定要的，为什么偏偏需要这种资料，而不要别种资料。

假如我们要分析某一事项，则功能取向决定这一事项的描述应该包括哪些东西。譬如我们要分析某种巫术行为或仪式，就不能只描述口诀，仪式及作法者，而应该有系统地描述参与者以及旁观者，参与者及旁观者的互动频率与互动类型，以及这种互动模式在整个仪式过程中的变化。若要描述霍皮（Hopi）的祈雨仪式，则不仅应描述作法者的行动，也应报告介入这个行动模式的各种人。描述这些参与者（以及旁观者）必须根据“结构关系”(structural terms)，即要将这些人放回到他们相互关联的社会地位中去。

下面我们引述一段文字，用以说明，功能分析如何有系统地描述介入某种行为模式的人们的地位与关系：

奇里卡华人（Chiricahua）[1]的女子成年仪式：家族（父母、亲戚）责担这四天的费用，由双亲选择时间与地点，"与该少女有关的所有成员及附近的人都来参加，若干外地访客也来观礼"。本地的领袖首先发言，欢迎所有的访客。简言之，这段文字明白指出介入此仪式的种种地位与群体：该少女、她的父母与亲戚、地方上的领袖、以及外地的访客。[2]

到后面我们会发现，根据介入某种仪式的各种地位与群体来描述，对于这种仪式的功能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换言之，对于一种活动的参与者的结构描述，可以为进一步的功能解释提供假设。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根据角色、地位、团体参与以及其间的关系来描述的性质。

澳大利亚的孟金人（Murngin）听到姊妹被责骂的模式化反应。他们的标准模式是这样的：当一个丈夫在他小舅子面前咒骂他的妻子时，这个小舅子就会有一种似乎很不寻常的举动，即对着他的姊妹（而不是姐夫或妹夫）投掷长矛。描述这个模式包括了对于参与者的地位的描述。姊妹是属于他的兄弟的宗族，丈夫则是来自另外一个宗族。

应该注意的是，一个活动模式的参与者在社会结构中都

---

① 奇理卡华人——〔美〕阿帕切人的一支。——译注

② Morris E.Opler,"An Outline of Chiricahua Apache Social organization"，载 Fred Eggan 编辑的 Social Anthropology of North American Trib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173—239，尤见其中226—230页。

包括另一种资料。在描述一个问题（如选择配偶）的特定模式时，观察者应尽可能地指出，由于使用该模式而排除的其他可行的模式。这类资料对于该模式的结构脉络（structural context）可以提供直接的线索，而且由于提示适当的比较资料，也许可以验证功能分析。

在从事实际的功能分析之前，除了上述两种描述资料之外，还需要第三种资料，即某一活动或模式对某团体成员的"意义"（认知与情感的意义）。详述某一事项的意义对功能分析非常重要。维布伦的一个功能分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 炫耀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文化模式：购买昂贵物品的炫耀消费，"意味"（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来挥霍。而财富则代表荣耀。人们从事炫耀的消费，不仅从直接的消费获得满足，更从旁观者艳羡的眼光中获得满足。该模式在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中最为显著，有闲阶级就是不必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这就是地位或角色的描述"。但这个模式也传播到其他阶层，他们也从挥霍中得到满足。最后，昂贵物品的消费可能排除其他的消费标准（例如金钱的"有效"运用）。"这就明白指出，其他的消费模式由于文化强调而使某一种模式被忽略"。①

维布伦进而提出炫耀消费模式的许多功能——地位的提高、地位的肯定、"好名声"、夸示财富。这些后果是令人愉快的，因此相当能够说明这一模式何以持续不断。这些功能几乎完全是模式之描述所提供的线索。这种描述包括：（1）介入这一行为

①维布伦，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28)，esp，Chapter 2—4。

模式者的地位；（2）除了炫耀消费以外的消費模式：（3）该模式的参与者与旁观者对于炫耀消费行为所赋予的各种意义。

具备这三种描述资料还不齐全。为了配合进一步的功能分析，完整的描述格式（descriptive protocol）必然要涉及这一行为模式的心理与社会的后果。但这些问题最好和功能概念一并考察。在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描述一个事项不能单凭幻想和直觉，至少必须包括该事项的这三个特征。这样对于进一步的功能分析才有价值。虽然以上对于整个功能分析的描述阶段说得不够详细，但也足以显示该程序可以加以整理归纳，让社会学的实地观察者有所遵循。

下面我们再举一例，以说明事项描述的第四个原则。

> 外婚的禁忌：一个团体愈团结，则对于与该团体外的人结婚就愈厌恶，而不管这种团结的原因是什么。……外婚意味着一个人丧失自己原有团体成员的身份，成为其他团体的成员，或者吸收一个对于本团体的价值、情操与行为没有充分社会化的人。①

上面这段话提示了功能分析之前的第四种资料被包含在对社会或文化事件的描述之中。某一行动的参与者必然都有某种顺从或违犯的动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社会文化事项的描述，应尽可能包括这些动机，但这些动机既不可与客观的行为模式，也不可与该模式的社会功能相混淆。将这些动机一并描述可以帮助说明该模式的心理功能，而且对于发现社会功能也有帮助。

---

① Romanzo Adams,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esp. at 197—204; Merton, "Intermarriage…", 同上引, esp. at 368—9, K. Davis "Intermarriage in Caste Societies", 载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1, 43, 376—395.

为规律性（regularities of behavior）（虽然不是外显的文化模式），观察者应该予以考虑，因为这些未被察觉的规律性，经常可以为整个模式的特殊功能提供基本的线索。下文我们将会提到，将这类“未被察觉的”规律性包括在描述格式之中，很容易使研究者注意到我们称之为隐性功能的模式分析。

总而言之，功能分析的描述格式应尽可能包括下列项目：

(1)行为模式之参与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2)考虑其他可行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由于我们所观察的既存模式而被排除了（即，不仅要注意实际所发生的，而且也要注意由于既存模式而被忽略的）。

(3)参与者对该模式所赋予的情感与认知意义。

(4)参与某一模式的动机，必须与该模式所涉及的客观行为相区别。

(5)不为该社会之成员所知觉，但与该行为模式相关联的行为规律性。

这些观察原则并不齐全，但至少提供一个暂时性的参考，指出有助于进一步之功能分析的观察点。而且以上几点也比一般笼统的原则（如要求观察者对于“情境脉络”要具有敏感性之类）要确定得多。

八、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

如上所述，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划分是为了避免社会行为的主观动机与其客观效果相混淆，而这种混淆在社会学文献中经常可见。我们考察目前功能分析所用的词汇，即可知社会学家很容易将动机视为功能，这是很不幸的错误。动机与功能是相互独立

的。如果不能确认这一事实，则社会学家将会把主观的动机范畴与客观的功能范畴二者搅混。因此，虽然一般人常常觉得，专家学者创用新名词对于他们的智能与常识是一种侮辱，我们也不得不引用新名词来划分二者。

大家很容易发觉，我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显性"与"隐性"两个名词的〔其实，弗朗西斯·培根很早以前在论及表面的观察之下的过程时，就创用了"隐性过程"与"隐性结构"（Latent Configuration)〕。

这种划分在过去数世纪以来曾一再为观察人类行为的学者所引用。① 如果我们将这种划分视为功能分析的核心，而实际上却未被任何采用功能取向的学者所用，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在此我们只要指出近代几位社会学家就够了，他们一致认为，解释行为必须区别主观的目的与客观的功能效果。

乔治·H·米德 (George H.Mead)②："……对破坏法律的人采取敌视的态度有特殊的益处（可称为隐性功能），能够增进社区成员感情上的维系。在对付窃贼或杀人犯时，个别的利益会隐退，而共同的情操会占上风，使社会的成员结合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迪尔凯姆③：分析刑罚的社会功能也是注意其隐性功能（即对社区的后果），而不是只局限于显性功能（对犯人的后果）。

① 这些早期区别中更为有代表性的，参见Merton，"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同上引。

② 米德，"The psychology of punitive justice"，载American Joural of Sociology，1918，23，577—602，esp.591。

③ 正如本章前面所提到的，迪尔凯姆在其著作中采用了功能取向。在他所有的研究中，迪尔凯姆常常下意识地使用类似于隐性功能的概念。文中的这一论点见他的，Deux Lois del'évolution penale，载L'année sociologique，1899—1900，4，55—95，以及他的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47)。

萨姆纳①："……自从人们借以满足需要的第一次行动开始，人们就只是为了切身需要的满足而已。由于一再重现的需要，个人养成了习惯，团体产生了习俗。但这些结果从未被意识到，也不是人们预期如此，更非行动者所能预见。直到它们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被人注意到。至于说到了解这一现象，那就需要更久的时间了。"虽然这段话并没有确定标准化的社会行动对某一特定社会的隐性功能，但也区分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

马基弗（R. M. Maclver）②：制度除了有直接的效果之外，"还有由于控制而产生的其他效果，这类效果并非人对建立制度的直接目的，……这种控制的反作用，虽然不是人们所预期的，但对社会仍有许多益处。"

托马斯（W.I.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③："虽然所有新设立的'波兰农民合作'制度有确定的目的……这些制度——自治团体或农作圈、贷款及储蓄银行、戏院——不仅仅是具有某种特定价值的机构而已，它们还是人的结合，每一个成员都以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参与共同的活动。不论官方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如何，这些制度作为各种人格的具体结合，却牵涉

---

① 当然，这只是W.G.Summer许多观察中的一个，引自W.G.Summer, Folkways, (Boston: Ginn & Co., 1906), 3. 他的合作者Albert G.Keller在自己的著作中仍保留着一些区别。例如、参见Albert G.Keller,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at 93—95.

② 引自Maclver的一本早期著作，Community, (London: Macmillan 1915)。这一区别对其以后的著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成为Social Causation, (Boston: Ginn & Co., 1942)一书中的主要要素，尤见书中314—321页，而且这一区别构成了The More perfect Un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8)一书的主要内容。

③ 文中这段摘录正是造成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书被认为是"社会学典范"的原因之一。参见1426—1427页和1523以后各页。正如本章后面将提到的，这一段中的见解和概念区别（还有很多其他诸如此类内容丰富的东西）永远不会被那些研究工业中非正式组织的工业社会学家所注意。

到许多目的。其成员之间的接触并不限于共同目的，当然共同目的是该制度建立的主要理由，而且也是人群结合最具永久性的纽带。由于抽象的政治、经济等理性作用和具体的社会团体二者的结合，这种新制度也是农民初级团体与次级的国家体系之间最佳的纽带。"

上述这几位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者都经常区分主观倾向的范畴（需要、利益、目的）和客观功能的范畴（特殊的益处、从未被意识到的后果、非预期的益处、明确的目的以外的功能）。

因为这种划分经常出现，又可用来指出一情境中显著的因素，以免被观察者所忽略，因此应该以适当的名词来称谓这种区别。这就是我区分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理由，前者是指对于某一特定单位（个人、次团体、社会或文化系统）的客观后果，这些后果有助于该单位的适应或适合，而且也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后者则是指非预期的而且未被察觉的后果。

这种划分纳入正式的概念框架中颇具启发性，可以帮助我们作有系统的观察与分析。近年来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区分已经被用来分析种种问题，如异族通婚①、社会分层②、感情受挫③、维布伦的社会理论④、美国人对苏联的态度⑤、宣传作为控制的一

① 默顿，"Intermarriag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同上引。

② Kingsley Davi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stratification，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2，7，309—321。

③ Thorner，同上引，esp.at 165。

④ A.K. Davis, Thorstein Veblen's Social Theory, Harvard Ph. D.dissertation, 1941 and vebien on the decline of the protestant-Ethic，载Social Forces，1944，22，282—86；Louis Schneider, The Freudian Psychology and Veblen's Social Theory, (New York; King's Grown Press, 1948), esp. Chapter 2。

⑤ A.K.Davis, Some sources of American hostility to Russia，载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7，53，174—183。

种工具① 、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理论②、纳瓦若族的巫术③、知识社会学的问题④、时尚⑤、人格动力学⑥、国家安全措施⑦、科层制的内在社会动力⑧，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的问题。

从以上所列举的问题来看，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区分绝非只和某些有限的行为有关。但我们必须深入发掘这一区分的特定功用，本章剩下的篇幅主要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概念区分的启发作用

(一)对一些似乎不合理的社会模式的分析起澄清作用

首先，这种区分帮助社会学家解释很多社会行为，这些行为虽未达到其外显的目的，但它依然继续存在。例如长久以来，观

---

① Talcott Parsons, Propaganda and social control, 收入他的 Essay in Sociological Theory 中。

② Clyde Kluckhohn, Bronislaw Malicowski, 1884—1942, 载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43, 56, 208—219。

③ Clyde Kluckhohn, Navaho Witchcraft, 同上引, esp, at 46—47 以及其后各页。

④ Merton, Chaptet XII of this volume。

⑤ Bernard Barber and L.S.Lobel, Fashion in women's clothes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system, 载 Social Forces, 1952, 31, 124—131。

⑥ O.H.Mowrer and C.Kluckhohn, Dynamics theory of personality, 在由 J. M. Hunt 编辑的 Personality and the Behavior Disorders 一书中,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44), 1,69—135, esp, at 72。

⑦ Marie Jahoda and S.W. Cook, Security measures and freedom of though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loyalty and security programs, 载 Yale Law Journal, 1952, 61, 296—333。

⑧ Philip Selznick,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A. W. Gouldner,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4); P. M. Blau,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A. K. Davis, Bureaucratic patterns in Navy officer corps, 载 Social Forces 1948, 27, 142—153。

察者称之对"迷信"、"非理性"、"只是传统的惰性罢了"等就是指这些行为。换言之，当团体行为没有——经常是不能——达成其表面所宣称的目的时，就有一种倾向，要把这类行为归之于愚昧无知、残余、或所谓的惰性。因此对于霍皮族的祈雨仪式就一概称之为原始部落的迷信行为。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该团体之行为的说明，这只是给它一个名称而已。只是以"迷信"的称呼来取代对于这种行为的分析。有了隐性功能的概念，就可以提醒我们，这种行为对该团体可能具有某种功能，而这种功能可能与该行为的表面目的大不相同。

隐性功能的概念使观察者不再只注意某一行为是否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它暂时撇开这些表面的目的，而注意到另外一系列的后果；例如，祈雨仪式对霍皮族参与者的人格、以及较大之团体的维系等后果。如果我们只注意表面的（预期的）功能有没有发生，对祈雨仪式的研究就变成了一个气象学家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学家的问题了。而我们的气象学家当然认为祈雨仪式不会产生雨。但这是不相干的。这只是表示该仪式在技术上没有这种作用，而该仪式的这个目的（祈雨）与实际后果是两回事。一旦我们有隐性功能的概念，我们可以继续考察该仪式对于该群体（而不是对雨神或天气）的功能。我们可能会发现，正如许多观察者指出的，该仪式的确具有功能——不过却是非预期的或隐性的。

举行仪式，由于提供团体成员定期集会的机会，可能具有增强团体认同的隐性功能。迪尔凯姆以及若干其他学者也曾指出，这种仪式是一种集体表达情感的方式。进一步的分析揭示，这种情感又是群体团结的一个基本来源。由于有系统地使用隐性功能的概念，使表面上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却发现可能对团体具有正面的功能。有了隐性功能的概念，我们就不致于很快下结论——

假若一团体的某一活动未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则这种活动的持续就只能说是"惰性"、"残余"、或归之为"社会中地方势力的操纵"。

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在观察一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目标的标准化行为时，象隐性功能一类的概念似乎经常（甚至必然）被利用。例如普埃布洛人（pueblo）的求雨与生育的仪式。但一旦社会学家所处理的行为，并不是针对某个绝对无法达到的目标时，就不大可能检查该行为的间接功能或隐性功能。

(二)促使对理论上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引起注意

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区分，促使社会学家注意在理论上最可能有所收获的研究领域（如行为、态度、信仰），以及他最能发挥所长的领域。如果他只限于研究显性功能，他的工作算是什么呢？如果真是如此，他所要做的就是看看为了某种目的而建立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例如，他要考察一种新的工资制度究竟有没有达到减少人事变动或增加产量的目的。他要问一个宣传运动有没有达到增加"战争意愿"、"购买战争债券的意愿"、或"对其他种族群体的容忍"。这些都是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但如果社会学家只限于研究显性功能，他们的研究就被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工厂管理员、工会领袖、或纳瓦若的酋长等等)所左右，而不是为理论问题所引导。但理论问题却是社会学的核心。如果社会学家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显性功能，其关键问题则是：人们有意设立的行为方式或组织有没有达到它的目标？那么社会学家就变成一个日常行为模式的记录者。"评估"一词的意义就被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和不懂理论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所限定。譬如：新的工资制度有没有达到这样那样的目的？

一旦有了隐性功能的概念，社会学家就能将他的研究伸展到理论发展最有希望的方向了。他考察熟悉的（或有计划的）社会

好象以前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1]

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曾一再强调这样的社会学观点：不管一个群体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它必然有很多其他利益，成员之间的社会接触不局限于他们的基本追求。其实西部电器公司的研究是经过好几年的实验，才将注意力转移到初级群体的隐性功能上的，这些基本团体则是在工业组织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举这个实验并不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有瑕疵的实验设计的例子，这不是我们目前所关切的。我们只是想借以阐明隐性功能以及功能分析的概念。这个例子说明了，一旦社会学者使用这个概念（有没有用这个名词倒是无所谓），就会注意到一系列很容易忽略的社会变项。明白地提出这个概念或许能减少未来这种不连续的情形。

(三)发现隐性功能表明社会学知识的重大进步

换言之，探讨隐性功能是社会科学家的特殊贡献。一种行为方式或信仰的隐性功能不属于常识的范围，因为这些不是行动者所预期的，而且是未被发觉的社会与心理的后果。因此发现隐性功能比发现显性功能在知识上更为进步。它们距离社会生活的"常识性"知识更远。假若隐性功能多少偏离表面宣称的显性功能，则发现隐性功能的研究经常会产生"荒谬的"（paradoxical）结果。因为一般人总是以显性功能来看待一个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或信仰，而一个研究若指出其从属的或间接的隐性功能，对一般人的观念自然会有所修正。若将隐性功能的概念引进社会研究，则会导致"社会生活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简单"的结论，如果人们只局限于某些后果（如显性后果），就会比较轻易地对

[1] Edward Shils,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Scoiology,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48), 42.

这种行为或信仰下道德的判断。道德判断，一般来说是基于这些显性后果的，所以很容易倾向于黑白两极化。一旦发觉更深层的后果（隐性后果），经常使事情变得复杂。道德评价（这不是我们目前所关切的）以及社会工程学（这是我们目前所关切的）① 问题在负责的社会决策（responsible social decision）中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使用隐性功能的概念所产生的"荒谬"——即表面的、显性的功能与实际的功能（包括隐性功能）之间的矛盾。这个例子就是维布伦对于炫耀消费的分析，一般公认维布伦为具有"荒谬"、讽刺之风的社会分析家。这通常是运用隐性功能概念(或其同义词)的结果。

炫耀消费的模式：购买消费品的表面目的当然是要满足物品原来设计所要满足的需要。因此，汽车显然是要满足代步之需；蜡烛是为了照明；食物是为了维持生存；罕见的艺术品则是为了得到美的享受。因为这些物品的确有这些用途，于是一般人认为这些用途就完全包括了重要的社会功能。维布伦承认这是一般流行的看法："一般都认为得到商品和累积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这些商品……至少一般人觉得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目的，这有待理论上加以解释"。②

维布伦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深入探讨商品之获取、累积、及消费的隐性功能，而这种隐性功能与显性功能颇有差距。"但唯有通过它表面的意义（显性功能），才能说明商品消费和商品积累的诱因。"在这些隐性功能中，最主要的莫过于这种消费模式象

① 这并不否认社会工程具有直接的道德意义，技术和道德必然交错在一起，但我在本章中不打算涉及这个范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见第六章，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还可以参考 Merton, Fiske and Curtis, Mass Persuasion, Chapter 7。

② Veblen,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同上引, p.25。

征“金钱的力量，由此获得或维持的好名声”。对于“饮食、居所、服务、衣饰、娱乐”的品质作精细的区分，不仅可以因享受较佳的物品而直接获得某种满足，更重要的是，可以因而提高或再度肯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维布伦认为，人们购买昂贵的物品，不仅因为这些物品的品质较佳，最主要的还是它们比较昂贵。他的功能分析所选取的是隐性方程式（“昂贵＝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不是显性方程式（“昂贵＝品质优良”）。他并不否认显性功能对于炫耀消费模式的重要性。无疑地，这种功能也有作用。“以上的论述并不意味赚取财富或累积财富，除了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受人尊重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诱因。希望更舒适以及免于匮乏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此外，“如果我们断言，使用任何的物品或服务，有时并不存在实用的目的，未免过于武断。但它的最大目的，以及主要的因素显然是一种炫耀式的挥霍”，以及由之而来的尊敬。① 因此，直接的、显性的功能无法充分说明流行的消费模式。换言之，假若炫耀消费模式排除地位提高或地位肯定的隐性功能，则这种模式将会变得使“传统的”经济学家无法预见。

在这些方面，维布伦的隐性功能分析与常识观念大相径庭。因为一般人总认为，物品的消费“当然是为了物品所给予人的直接满足”，“人们吃鱼子酱，因为他们饥饿；买豪华车，是因为

---

① 同前引书，32页，101页。我们始终会注意到维布伦用词散漫，在一些明显的段落中（在其他地方重复出现），维布伦交替使用“鼓励”、“愿望”、“目标”和“功能”。上下文明确了这些术语的外延，因此，并没有造成太大的误解。但是，与一种文化模式相一致的明确目标决不相等于与隐性功能相一致。维布伦也时常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严格说来，只有可恶的竞相花钱所造成的花费算做炫耀性浪费。但是，将特定的事项和要素归于炫耀性浪费之列，并无需造成这些花费的人自己把事项或要素看做是这种意义上的浪费”。（同上引，99页）。Cf.A.K.Davis, Veblen on the decline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同上引。

良好教育的阶级能够参与政府的组织；如果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条件都能改变的话，政党机关的“罪恶”也许就能消除。[1]但这些改变谈何容易。因为政党机关好象不死鸟，在焚余的灰烬中再生无恙。简言之，这种结构在美国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显然有某种重要性。

从功能论的观点，我们通常（但不是一定）预期持续运行的社会模式或社会结构可能担任某种正面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当时无法为其他既存的模式与结构所履行。因此我们想到，这种大家公认有害的组织，在目前的条件之下，也许履行某些基本的隐性功能。[2]我们考察一下目前对这种结构的分析，也许能说明功能分析的一些其他问题。

政党机关的功能：在此我们不考虑各种不同的政党机关之间的细微差别——特威德（Tweed）、范里（Vare）、克伦普（Crump）、弗林（Flynn）、黑格（Hague）决非同一类型的领袖——只是将政党机关当作一类的社会组织，来探讨它们的共同功能。我们不可能列举政党机关的所有功能，也不意指每一个政党机关都履行我们列举的所有功能。

领袖（Boss）的主要结构性功能在于组织、集中以及维护

---

① 这些“解释”是“因果”解释，它们试图指出政党机关出现的社会条件。只要得到实验证实，这些解释一定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为什么政党机关在某些地区存在？在另一些地区就不存在？这些机关是怎样维持下去的？但这些因果解释是不够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类机关的功能后果大大有助于我们补充因果解释。

② 我相信，进而说“这一假设并不赞成政党机关”是多余的。关于这类机关的反功能是否大于正功能的问题，关于是否有另一结构可以履行其功能而不必承担社会反功能的问题，仍然有待从合适的角度进行研究。这里我们涉及用文件来表明完全建立在评价社会结构的显性功能基础上的道德判断，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不真实的，例如：这些道德判断不涉及结构的其它实际后果，不涉及对结构提供基本社会支持的后果。正如后面将指出的，忽视隐性功能的“社会改革”或“社会工程”是冒着不改革将要忍受过度的失望和反弹效应(boomerang effects)的危险而进行的。

“分散的权力”，这些权力目前都分散于美国的政治组织中。通过这种集权化的政治权力组织，领袖及其幕僚满足社区各种次团体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无法为合法的而且为文化所赞许的社会结构所满足。

为了解领袖制及政党机关的角色，我们必须检查两种社会学变项：（1）结构脉络（Structural Context），正因为这种结构脉络，使得为道德所赞许的结构很难履行重要的社会功能，遂让政党机关有机可乘，来履行这些功能；（2）各种次团体，若无政党机关的隐性功能，这些次团体的需要将无法满足。①

（一）结构脉络：美国宪法的架构特别排斥高度的极权。因此，“抑制有效而负责的领袖产生。威尔逊（Woodraw Wilsou）已经看出，宪法的制定者建立的制衡制度，通过政府几个有机部门之间的友好竞争，而使政府维持某种机械的均衡。他们不信任权力，认为权力可能危害到自由，因此他们将权力分散，并预防权力的集中”。权力分散的现象不仅在国家的层次上如此，在地方上亦然。塞特（Sati）也认为：“结果，当人们或某些团体需要积极的行动时，又没有任何组织有足够的权力采取行动。政党机关遂成为救星”。②

结构上的权力分散（the constitutional dispersion of power）不仅使有效的决策与行动窒碍难行，而且当行动发生时，又被法律上的考虑所牵制。结果出现了“一种较有人情味的政党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与政府用法律造成的牵制相抗衡……非官式民主的无法无天只是用以平衡官式民主的唯法主义。律师的责任在于

① 就如同前面的情况，我们不考虑政党机关可能出现的反功能。

② Edward M.Sait, Machine, Polit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X, 658b；参见 A.F.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Chicago, 1908), Chap.2.

使民主屈从于法律，而政党机关的领袖则以独特的方式与考虑来补偏救弊"。①

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权力是分散的。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措施都是为这一目标而设计的。不仅政府各部门之间有分权，而且各机构都有轮调制度，以免官吏坐大。各机构的权力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但塞特以功能论的观点说："领导一定要有，但因为领导在宪法的架构之内不容易发展，于是政党领袖在宪法架构之外，提供一种粗犷的、不负责任的领导方式。"②

更概括地说，官方结构的功能缺陷，产生一种可供选择的（非官方的）结构，以求更有效地满足现实的需要。不论政党机关独特的历史渊源如何，它的存续的确满足了各种团体的需要。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几个这种次团体及其特殊的需要，以及政党机关的隐性功能。

（二）政党机关对各种次团体的功能：政党机关的力量源泉之一在于地方的社区与街道。政党机关并不把选民当作无组织、未分化的群众。他们具有敏锐的社会学直觉，认识到选民是生活在某一特定空间，并且各有其特殊问题与需要的个人。公共议题是抽象而遥远的，私人问题则具体而直接的。政党机关并不笼统地诉诸重大的公共议题，而是通过本机构的地方代表与选民之间直接的、准封建式的（quasi-feudal）关系来运转的。选举是在反映良好的选区里赢得的。

政党机关通过紧密的私人关系网络与一般人保持联系。政治遂变为私人间的关系。选区负责人"必须是每一个人的朋友，必

---

① Herbert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New York, 1914), p.254, cited by Sait, 同上引, 658 b.

② Sait, 同上引, 659 a.

须同情不幸者，帮助有困难的人”。[1] 在美国这种不重视私人关系的社会，政党机关通过它的地方机构，履行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对于有需要者给予有人情味的、而且是私人性的帮助：食物与工作，法律咨询与法律以外的忠告，争取某些与法律稍有抵触的权利，帮助有才能的穷人子弟在当地学校申请奖学金，照顾鳏寡等。换言之，当人们遇到任何困难而需要朋友帮助的时候，选区负责人都会如朋友一般，给予援助。

若要评估政党机关的这种功能，我们不仅应注意援助的提供，还应注意提供援助的态度。其他机构也提供类似的援助：福利机构、房屋建筑、法律咨询机构、免费医疗的医院、收容所、移民机构——这些以及其他组织都可提供各种援助。但这些官方机构雇用的福利工作员(Weffare Worker)，使用的是专业技术，而福利工作员在接受救济者的心目中，是冷淡的而且具有官僚气息的。援助不仅有限，而且要详细审核申请的条件。相对地，政党机关的选区负责人，使用非专业性的技术，不问任何问题，也不要求符合什么法定的条件，也不盘查私人的事情。[2]

对许多人来说，为了获得合法的救济而丧失自尊，代价未免太高了。官方机构的工作人员，通常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教育背景、以及民族团体，而政党机关的工作人员则是“自己人”，他知道一切。以给人施舍的态度出现显然不能与作为朋友的身份出现相

---

① 同前引书，659a。

② 与官方福利政策形成类似对照的有霍布金斯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的纽约州所发布的慷慨、非政治的失业救济。正如Sherwood报道的，“霍布金斯因为这些非正式活动遭到了国家福利机关的严厉指责，认为未对申请救济者，其个人和家庭经济来源、以及其宗教信仰进行全面调查就发给工票(work tickets)是一种‘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霍布金斯的同盟 Dr. Jacob A. Goldberg说：‘哈里对福利机关说，见鬼去吧’。”参见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w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Harper, 1948), 30。

党机关的领袖利用各种政府机构，来调和公共事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他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企业界驻在政府里的大使。对企业界而言，政府各部门经常是陌生的(有时甚至是不友善的)。用商业术语来说，他替他的企业界顾客从事经济方面的服务，获得很好的报酬。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一篇题为“贿赂的辩护”的文章里指出：“美国的经济制度是有问题的，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胆大而有能力的人往往利用贿赂购得木材、矿场、油田，以及各种特权。而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还享受财富、权势与声望。”① 在一次有上百位洛杉矶商界领袖参加的会议上，他叙述一件他们都很熟悉的事实：政党领袖及其机关是经济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不可能不通过贿赂而能建筑或经营铁路、电车轨道、瓦斯公司、水厂或电力公司、开矿、大规模伐木、或任何有特权的企业。你会私下告诉我，你不得不如此；而我在此半公开地告诉你，你必须如此。这种情形比比皆是。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中，因为某种理由，你或你的同行——社会中最能干、最聪明、最有想象力、最勇敢、最富有的领袖，必须和社会及法律相对抗。”②

因为美国社会结构根深蒂固地需要特权的服务，因而政党机关的领袖对“寻求特权的企业”的第二种次团体履行种种的功能。企业界这些“需要”，以目前的情势而言，无法为传统的以及文化所赞许的社会结构所满足。结果，这种法律之外的而且相当有效的政党机关即应时而起。对这种“腐化的政党机关”，若完全采取一种道德的态度，则对于产生一般人所激烈攻击的“罪恶”的结构

① Autobiography of Lincohn Steffens, 570。

② 出处同上，572—3，这有助于解释 Steffens 继警察局长 Theodore Roosevelt 之后也注意到的现象，即解释：为在定期清理政党机关中被拘捕的无赖而说情的人们所表现出的高尚和可敬，"参见，Steffens，371，及书中各处。

条件就无法了解。采取一种功能观点，并不是替这种政党机关辩护，而是为改良或撤销这种机关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假若我们有某种特定的结构安排，或则消除这类商场陋习，或则经由别种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才能切实地谈到改良或撤销。

政党机关对特殊次团体的第三种功能是提供其他的流动渠道。这类人无法由传统正式的途径"晋升"。我们若要了解这种功能，必须检查较大的文化与社会的结构。大家都知道，美国文化非常强调金钱与权力，视之为成功的象征，并且适用于社会各阶层。这个文化目标也带有很浓厚的正面感情与价值。然而某些次团体及某些地区显然比较缺乏获得这种成功(金钱与权力)的机会。他们构成了"服膺金钱成就的价值，但很难以正统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这种成就"的一群人。这些人传统的职业机会几乎完全限于手工劳动，但是美国文化却轻视手工劳动，① 而尊重白领职业。因此显然有一种趋势，即为了达到这些文化所赞许的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些人一方面被要求倾向于累积财富(与权力)的远景，而另一方面却无法循正当途径得到机会以达到这种目标。

正是在这种社会结构的脉络中，政党机关履行了一项基本的功能，即为屈居劣势者提供社会流动的途径。在这个脉络里，腐化的政党机关及其勾当在一个特别强调经济富裕、权力、与上进的社会中，当垂直流动的渠道被关闭或受到限制时，代表不道德的

① 参见国家民意研究中心对职业评价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人们普遍认为体力劳动在社会价值标准中档次非常低，即使那些自身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这样认为。尤其应充分注意后面一点的含义。实际上，文化和社会结构决定了那些羞于启齿的体力劳动者对获得金钱和权力成功的价值观。在这种背景下，再注意人们不择手段取得这种成功的巨大动力。一个拣垃圾的人只要同其他美国人一样，认为拣垃圾的是低下又低下的职业，就难以有一个自己满意的自我形象；他干的是社会中的下贱职业，他不再怀疑"有真正价值的人就应该在社会的前列"。而且，他还不时意识到："无论他人怎样解释，他也没有同他人一样的机会。"人们可以感觉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希望无论用什么手段，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能够一夜之间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一切为某些团体要寻找社会流动渠道的社会需要提供了结构和相应的心理背景。

智力战胜了道德所界定的“失败”①，正如一位曾在贫民区做过研究的社会学者所说的：

> 社会学家认为政党机关及其勾当不符合道德标准而不去研究，因而忽略了贫民生活的一些重要因素……他没有发现这种机关对于贫民的功能。爱尔兰人以及后来的移民，很难在都市的社会经济结构立足。移民及其子女如果没有执掌某些美国大都市的政治组织，就不可能获致他们目前社会流动的程度。政党机关也有这种作用。某些人因为种族及低下的阶级地位，无法经由“正当合法”的途径晋升，政党机关即为这些人提供一种重要的手段。②

这就是政党机关对于特殊次团体的第三种功能。这种功能纯然由政党机关的存在与运行就能够履行，因为这些由文化原因所产生的个人与次团体的需要，是在机关内部得到满足的。换言之，这是指政党机关为其成员所提供的服务。但从较广的社会脉络来看，此机关不仅是个人满足利益、权力等欲望的工具，而且是为

---

① 默顿，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Chapter vi of this volume。

② William F.Whyte,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lums, 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ed.1943, 8,34—39。因此，政党机关及其勾当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用来说明组织根据第四章阐述的条件进行调整的类型，它代表一种组织调整：一定结构的出现可以减少的极度紧张和问题，而这些是由于不分轩轾的文化（"Cutural accent on success-for-all"）和社会结构对于成功。事实上的不平等机会之间的冲突所引起。正如第四章所指出的，其他个人调整类型也是可能的：孤独者犯罪、精神病状态、叛乱、放弃文化认同目标的倒退行为。同样，有时也发生一些其他类型的组织调整；非法勾当或政党机关不作为解决这一社会诱导问题的组织手段。例如，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革命组织被理解为组织调整的另一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引起理论上的注意，否则我们可能忽视功能替代和功能等同中的基本功能概念，而这是后面将要详细讨论的内容。

社会里遭受歧视的人提供的一种晋升手段。

政党机关对"合法"的企业提供服务，同样也对"非法"的企业提供服务，如卖淫、犯罪，走私等。如果我们能暂时撇开道德的谴责，而冷静地检查这种组织的实际运行，也许更能了解它在这方面的社会学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职业犯罪者、走私者、及赌徒的次团体，与工业巨子、商人或投机者的次团体，在组织、需要及运行等方面，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如果有木材大王，石油大王，同样有犯罪大王、走私大王。如果合法企业成立行政与金融的联合组织，以"协调"及"统合"不同的企业部门，犯罪组织也成立非法的货品与服务的产销联合组织。假若合法企业将林立的小企业组织视为不经济、无效率，而希望以大的联合企业代替为数众多的小商店，非法企业也有类似的态度与联合组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合法"企业与"非法"企业的经济角色有基本的相似性，虽然并不是完全相同。二者都是针对某种经济需要提供货品与服务。撇开道德不谈，二者都是企业，是生产以及服务的事业，分配人们所需要的货物与服务，而且都有一个市场，在市场里，货物与服务转变为商品。在市场充斥的社会，我们可以预测，无论何时只要对某种货物与服务有一种市场的需要，就有某种企业兴起以适应这种需要。

大家都知道，卖淫、犯罪与走私是"大企业"。1950年美国大约有50万职业妓女，而当时只有将近20万的医生，35万的职业护士。我们很难估计哪种职业(妓女或医护人员)的人数较多。美国地下赌场的资产、收入、利润、与红利当然难以估计，也很难和其他行业，譬如皮鞋工业的资产、收入、利润与红利作比较。但很可能是不相上下。每年在非法麻醉剂方面的开销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可能比糖果的开销少，但可能大于书籍方面的开销。

纯就经济方面而言，提供合法与非法的财货和服务之间并没

同：(1)对货物与服务的市场需要；(2)经营者企图从他们的事业里获得最大的利益；(3)需要对政府有一些制约，不然会干预企业家的各种活动；(4)需要一个有权力、有效率的机构，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以上的分析并没有完全穷尽政党机关所有的功能，或它所服务的次团体。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它对这些次团体履行了某些功能，而这些功能无法为文化所赞许的或较正统的结构所履行。

此外，对政党机关的功能分析尚有若干涵义，这些涵义都需要详加研究，不过在此只能简单提一下。第一，上述的分析对社会工程学具有直接的涵义。它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过去定期的"政治改革"、"赶走恶棍"及"清理政治门户"的努力大都(虽非必然)流于短命或无效。它显示了一项基本原理：企图撤销某一个既存的社会结构，而又没有提供其他适当的结构来替代，则注定要失败。(无疑，这个原理有广泛的意义)如果"政治改革"只限于表面的工作"赶走恶棍"，则无异是一种社会学的魔术。这种改革可能会提拔几个新人出出风头，也可能借此向选民表明：道德还是完美无缺的，并且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改革也可能导致撤换政党机关的人员；甚至可能遏制政党机关的活动，因而使许多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但是，除非这种改革能"重整"社会政治结构，使现有的需要为其他的结构所满足；或者，除非完全根除这些需要，否则政党机关终将恢复旧态。欲寻求社会变迁，必须了解变迁中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否则只有耽溺于社会仪式，而不是在从事社会工程。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或它们的同义词)乃是社会工程学所不可欠缺的要素。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两个概念不仅仅是理论的(此处之"理论的"系取其通俗意义)，而且还是很实际的。在人为推动的社会变迁中，如果忽视这些概

念，将冒失败的危险，付出很大的代价。

上述对政党机关的分析还有一项涵义值得一提。有一个"荒谬"的现象经常为人所注意，即政党机关的支持者包括了"高贵的"上流人物与黑社会人士。初看起来，这些似乎是很奇怪的伙伴。一位有学问的法官，也许会判决昨晚在某政治大亨的宴会上坐在他旁边的走私犯。检查官参加政党领袖召开的会议时，也许会碰到免刑的犯人。企业界的巨子也许会和走私大王一样，埋怨政党领袖所需要索取的政治捐款。两群极端不同的人相遇——在成功政客的密室里吞云吐雾。

在功能分析的光照之下，所有这些都不再是荒谬的了。因为政党机关同时服务于实业家和犯人，这两种似乎对立的团体在这里交汇。这指出一项较一般性的定理：一个组织的社会功能帮助决定结构(包括人员的雇用)，正如同结构帮助决定履行功能的较果。根据社会地位，实业家团体与犯人团体的确相距很远，但是地位并没有完全决定行为以及团体之间的关系。功能改变这些关系。由于他们个别的需要，几个次团体就被一个满足这些需要的主体结构所"统合"，而不论他们个别的愿望与意图如何。一言以蔽之，结构影响功能，功能影响结构。这句话有很多含义，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九、结　论

本文对于结构功能分析的考察，只能指出这种社会学解释方式的一些问题与潜力。功能分析范式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持续不断的理论澄清以及累积的经验研究。功能论如果能摆脱传统的某些不恰当的假定(这类假定使功能论沦为一种替现存行为方式合理化辩护的学说)，功能分析社会学就能成为一种有系统的，而

且与经验研究相关的分析模式。我希望本文所指出的方向能显示，对功能分析作进一步的整理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将来在功能分析史上，这个范式中的每一项都能发展成为详尽、完整的章节。

十、参考书目

本文在1948年写成之时，对当时发展缓慢的社会学功能分析的主要假定与概念，尽了一份系统化的努力。其后，功能论获得显著的动力。我在准备本文的写作时，对此理论已略加引申和修正。至于详细的理论建构，则有待于我目前正在草写的一部书。趁这个机会，我把最近对社会学功能分析有贡献的一部分著作列出，也许对读者有用。

当然，近几年来，对社会学功能分析作出主要贡献的是Ta－lcott Parsons 的著作 The Social System(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1)，以及对它作进一步补充的两本帕森斯与其同事的著作：T・Parsons, R・F・Bales and E・A.Shils,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C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 1953); T.Parsons and E・A・Shils(editor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The Social System极为博大复杂，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家尚未能批沙拣金，分出其精华与糟粕。但是，不管人们对它赞成与否，都承认帕森斯的著作对于当今社会学理论的方法陈述无疑是一大进步。

M.J.Levy, Jr.,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这部著作从帕森斯的概念框架引申而来，并对各种范畴和概念进行了扩充。至于书中的概念分类对于社会学各种问题的分析是否恰当和有用，则有待考察。

从下列书目中可以看出，不少源于社会学理论的各种"文化领域"(Cultural areas)的论文已经对某些理论问题进行功能分析，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较为深刻。也许分析最为深刻和富有成效的是两篇密切相关的论文，一篇是Ralf Dahrendorf，"Struktur und Funktion"，载Köh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55，7，492—519，另一篇是David Lockwood"Some remarks on'The Social System'，"载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56，7，134—146。这两篇论文都是系统推理的范例，指出了当前功能理论尚未完善的地方。巴伯对功能理论的地位和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经过深思熟虑进行了公正的阐述，见Bernard Barber，"Structural functional analysis：Some problems and misunderstandings"，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6，21，129—135。Bredemeier 则试图阐明功能社会学中分析逻辑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解释社会中所观察到的结构模式，见Harry C. Bredemeier，"The methodology of functionalism"，载American Sociojogical Review，1955，20，173—180。尽管这篇论文中，把某些假定归属于几种功能分析的主张还有待探究证实，但论文明显的功绩是提出了功能分析要符合逻辑的问题。

关于人类学家如何使当前社会学中(不仅仅限于人类学)的功能分析条理化，见Melford E.Spiro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文，"A typology of functional analysis"，载Explorations，1953，I，84—95和Raymond Firth的批评性探索"Function"载Current Anthropology，(edited by William L. Thomas，J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237—258。

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巴西，也象最近美国一样，兴起普及功能理论的热潮，这一点体现在关于功能理论的批评性探讨中。最为突出的有：Henri Janne，"Fonction et finalité en Sociolo-

gie",载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1954,16, 50—67,他努力把当前的功能理论与以往和当代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学家的理论联系起来。Gurvitch 则对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作了彻底的批判，见Georges Gurvitch," Leconcept de structure sociale," 载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955,19,3—44。而关于功能理论与社会学研究中某些问题的关系 Barbano 作过综合性研究，见Filippo Barbano "Teoria e Ricerca nella Sociologia Contemporanea"(Milano:Dott.A.Giuffre,1955)。此外,Florestan Fernandes,Ensaio ŝobreo Metodo de Interpretaãço Funcionalista na Sociologia(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Boletim No. 170,1953),该书是一本资料丰富、系统的专著，可以补偿类似我的著作中的单调乏味和时有失误的论述。

前面章节提到的范式均是通过一组抽象的标志(notations)得到阐明，以搞清范式的各个部分是怎样与生物学中的功能方法要素相连的。参考："Aformalization of functionalis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该文编入Ernest Nagel收集的论文集Logie Without Metaphysics (Glencoe: The Free Press,1957)。范式的具体应用,则参考:Warren Breed,"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a functional analysis", 载Social Forces,1955,33,326—325; A.H.Leighton and C.C.Hughes ,"Notes on Eskimo Patterns of Suicide, "载Southwestern Joutnal of Anthropology,1955,11, 327—338; Joan Chapman and Michael Eckstein,"A Social-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alleged visitation of the Virgin Mary in Puerto Rico",载Year book of the 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4, 203—206;Dennis Chapman,The Home and Social statu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55); Christian Bay,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Ideals and Socio-Psychological Realities (forthcoming); Michael Eckstein, "Diverse action and response to Crime", (forthcoming); Y. B. Damle,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Ideas and Knowledge in Indian Villag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5)。

关于行动的显性和隐性后果与自我辩白和自我拆台意象的关系的卓越探讨，见Chapter 8 of Kenneth Boulding, The Ima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第四章　社会学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

社会学理论的近期历史基本上可以写成两个互相对立重点之间的相互交替史。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社会学家热衷于笼统地概括，并急于尽快地找到建立社会学理论的通路。他们倾向于根据社会学工作的规模，而不是其综合论证的可能性来确定社会学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避开详细的、小规模观察的"琐屑"，而寻求总体归纳的恢弘。在另一个极端是一帮勤奋的人们，他们不太追究其经验研究的深意，他们相信：他们所报告的就是一切。当然，他们关于事实的报告可以得到验证并常常得以证实，但他们不太善于将这些事实互相联系，他们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些事实而不是其他来作为他们的观察项目。对于前者，他们认同的座右铭似乎时常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否真实，但它至少有重要意义"。而上述激进经验主义者的座右铭却往往是："事实如此，但我们不能说明其重要意义。"

无论什么是人们跻身于上述两个不同阵营的基础——心理学家，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会对此作出不同的解释，且这些解释并不一定势不两立——将它们列为对立的双方毫无逻辑基础，这一点非常清楚。只要不是出于侥幸，通过训练有素的观察至少可以使笼统的综合得到改进，深入、详尽的观察不应由于缺乏理论联系和理论意义而被一概视为琐屑。

如果对于上述观点确实无异议，毫无疑义，社会学将会有广阔的前景。但是，认为人们对两者毫无异议也是陈腐的观点。然

而，如果理论的一个功能是探索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物的意义，这个理论就不会无视对于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关系提纲挈领式论述的探究。这样做，应避免从“更为成熟”的科学——象物理学和生物学——中获得解释，不是因为这些学科不表现有关的逻辑问题，而是由于它们的高度成熟允许这些学科以高度的抽象卓有成效地处理问题，而这种抽象所达到的程度是社会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有关科学方法的无数次讨论提出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先决条件，但是，它们往往是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进行上述活动，以至于将这些规则移植到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想法，似乎成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归根结底，社会学研究必须符合科学方法的规则；不用多久，这个任务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会对现阶段切实可行的分析工作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社会学理论”这个术语已被广泛用来指称社会学家所进行的几项相关、但却互不相同的活动的产物，所谓社会学家是一种职业群体的成员。然而，由于这几种类型的活动对社会经验研究的影响大相径庭——它们的科学功能不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应对这几种类型的活动加以区别。进而言之，这种区分为确定下列六项工作的特殊贡献和局限性提供了基础，这六项工作常常结为一体组成社会学理论：(1)方法论；(2)一般社会学取向；(3)社会学概念分析；(4)事后社会学解释；(5)社会学中的经验概括；(6)社会学理论。

一、方 法 论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区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社会学理论把人们相互作用的某些方面和结果作为其主题，因而它是实质性的；方法论可以说是科学程序的逻辑。方法论问题凌驾于任何一

门学科的问题之上，它既处理各学科组织的普遍问题①，也以更概括的形式处理所有科学探索中的普遍问题。方法论并非特别局限于社会学问题，尽管有众多的方法论探讨见于社会学的书报杂志之中，它们并不因此而具有社会学的本质。社会学家以及其他试图进行科学工作的人们，必须具有方法论的修养；他们必须了解调查的设计，推论的性质，理论系统的要求。但这种知识并不包括或表示社会学理论的特定内容。简言之，知道如何检验一组假设与知道怎样从理论中抽取出有待检验的假设，这两者具有明确而根本性的不同。② 我感到，如今所设计的社会学训练大都是使学生懂得上述第一个内容，而不是第二个。

半个世纪以前，鲍因嘎黑(Poincaré)观察发现：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解释方法论秘义的圣师，这样也许分散了建立实质性理论这一任务所需的人才和精力。对程序逻辑的关注具有明显的科学功能，因为在引导、评价理论探索和经验探索的过程中，这种编制非常有用。它也反映了一个不成熟学科的发育性痛苦(g-rowing-pains)。正如一个学习新技能的学徒，自觉地检查这些技能的每个方面；而他的师傅却似乎是对这些技能的规则漫不经

① 下面几本书提出了方法论的内容，并将其区别于社会学的程序性内容：Florian Znaniecki, The Method of Sociology(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4)；R.M.MacIver, Social Causation(Boston: Ginn& Co, 1942)；G.A.Lundberg,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New York: Macmillan Co., 1939)；Felix Kaufman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P.F Lazarsfeld and M.Rosenberg,(eds.)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5)，尤其是各部分的导言。

② 然而，应该注意到，用于社会学或其他科学探索的工具和程序不仅必须符合方法论的标准，它们还必须从逻辑上预先假设实质性理论。根据Pierre Duhem对这种结合的观察，科学中所获得的试验结果及其工具要有专门设想和实际顺序的理论(theories of a substantive order)。La théoric physique (Paris: Chevalier et Rivière, 1906), 278。

合系统，大概是有用的"。① 因此，就象兹纳涅茨基(Znaniecki)和索罗金所阐释的：文化数据中的"人文系数"的重要性，也跻身于这个范畴。上述一般取向可以被解释为：调查者实际上危险地忽略了事实的顺序，他们不提出具体假设。

上述取向的主要功能是为探索提供一个一般情境；它们促进确定假设的进程。举例来说：在一般社会学取向的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被导向对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进行重新考察，把情感形成看作社会结构制约的产物。这种一般观点明确地支持了他的探索：在与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中，研究一种具体的"心理情结"与其所处的地位关系体系的关系。这种探索中所使用的具体假设与上述一般取向是协调的，但并不是由一般取向所决定的。换言之，上述一般取向表明了某些结构变量的相关，但是，发掘出应包括在内的具体变量，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尽管与具体的假设相比，这种一般理论观点对科学探索的发展具有更深刻的影响——这些假设成为策源地，用莫里斯·阿瑟斯(Maurice Arthus)的话来说：从这个策源地出发，"新的假设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紧随着这些假设的大繁荣之后，一场事实的大丰收接踵而至"——尽管事实如此，上述一般理论观点仅成为理论家的出发点。理论家的工作是，根据这些一般取向，通过重新进行经验概括，发展具体的、相互关联的假设。

而且，应该指出：社会学理论对其姊妹学科日益增多的贡献，大多都在一般社会学取向领域，而不是在具体的已经证实的假设领域。社会史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把社会学观点引入心理分析理论，涉及到对社会学资料范围的认识，而不是已得到认可的具体理论的合并。社会科学家在应用他们的理论于具体的社会行

① Conrad M.Arensberg and Solon Kimball,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Irelan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第26章.

为的过程中，他们将发现自己在社会学方面知识的缺乏。但社会科学家们在他们的解释中并不常表现出社会学的天真(Socio Logial Naiveté)。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他们历来认为既定的东西，作为资料的东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会是很成问题的事情。然而，这种对社会学观点的理解力，常常由于缺乏经过充分检验的具体理论而被消蚀，这些具体理论可以是人类需要的决定因素理论，或者是涉及到社会权力的分配与使用的社会进程理论。由几种社会科学互相之间的理论差距所派生出来的压力，会在一定时候，促使人们加速制定具体而系统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适用于上述差距所提出的问题。一般取向不能满足需要。大概下面就是一位经济学家口出怨言的背景：

> (这位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将他对一个问题的分析)追溯到某些"数据"，也就是追溯到某些超经济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距那个最初提出的问题非常遥远，因为，经济学的因果链往往很长。但他总是在最后想把问题移交给某个社会学家或其他人——如果有一个社会学家正等待着他的召唤的话。但常常无人等待他的召唤。①

三、社会学概念分析

人们常以为：理论是由概念组成的。这个不全面的断言似是而非。应该肯定，局限于阐述和澄清主要概念的概念分析，是理论工作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但一系列的概念——如，地位、角

① J.R.Hicks,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Social Sciences: Their Relations in Theory and in Teaching(London: Le Play Press, 1936), p.135

色、团体(Gemeinschaft)、社会互动、社会距离、反常状态——并不组成理论，尽管这一系列的概念会加入一个理论体系。可以设想，就社会学家中出现反理论的偏执而言，它是在反对把理论等同于澄清定义的社会学家，这些人错误地把理论分析的局部当作了整体。只有当这些概念以一定的构型相互联系，一种理论才开始出现。因此，概念组成了所观察对象的定义(或规定)；概念是变量，人们将要在这些变量之间寻找经验关系。当命题逻辑地互相联系起来时，一种理论就得以建立。

当然，指导搜集和分析资料的概念选择，对经验探索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被选择的概念互相之间没有建立起联系，不管随后的观察和推论是如何地严谨周密，这项研究将会毫无成果——尽管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老生长谈。这种老生长谈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经验探索中的真正试验程序很可能比较难以出成果，因为，互相之间没有明显联系的变量，其数目会是非常之大。

因此，概念澄清的一个功能，是弄清包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资料的性质。① 这样，它可以减少一种可能性，即用已知概念表述虚假的经验发现。所以，萨瑟兰(Sutherland)对"犯罪"的公认概念的重新考察，提供了一个有教益的例证，说明这种澄清怎样引起对假设的修正，这些假设关系到以概念为名组织起来的资料。②

---

① 正如Schumpeter关于"分析工具"的作用所说："如果我们要谈论价格水平，并要设计出测量它们的方法，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价格水平。如果我们要观察需求，我们必须对其伸缩性有一精确概念。如果我们谈论生产力，我们必须知道，关于每人小时的总产量，什么是正确的命题，以及关于人/小时总产量的部分微分系数，什么其他的命题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假设加入这些概念，它们只体现描述和测量方法；也没有任何假设加入命题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所谓定理)。然而，它们的构型是理论的主要工作，这一点在经济学领域就象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谓分析工具的意思。"Joseph A.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New York: Mc Graw-Hill Book Co., 1939), I, 31。

② Edwin H.Sutherland, "White-collar Crimin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0,5,1—12.

取自萨瑟兰的例子只是说明一个较为普遍的事实：就象在领域性较差的活动中一样，我们的概念语言趋向于固定我们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和行为。概念为情境下定义，而研究工作者随之作出反应，明晰的概念分析帮助研究工作者认识到，他在对什么作出反应，以及他忽略了什么因素(可能是重要的因素)。沃夫(**Whorf**)在这个问题上的发现，经过适当修改，可以适用于经验研究。① 他发现：行为受语言上的或概念上的意义所左右，而语言上的或概念上的意义为适用于一定情境的术语所标明。因此，在面临一个被概念地描述为"汽油桶"的物体时，行为就典型地趋向于一种特别类型：小心翼翼。但当人们面对一个被称之为"空油桶"的东西时，行为就不一样了：漫不经心，随便抽烟并乱扔烟头。然而，这种"空"油桶更具危险性，因为其中含有爆炸性气体。人们不是对实际的情景，而是对概念化了的情景作出反应。"空"这个概念在这里被含糊地使用：作为"无效的、负的、无活动力的"同义词，并作为一个术语应用于实际情景，而没有考虑到容器里残存的气体和液体这种"不相干的东西"。情景在第二种"空"的意义上被概念化，而概念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对之作出反应。结果是"空"油桶引起了火灾。在大辩论中澄清到底"空"是什么意思，将对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个案例可以作为概念澄清对研究行为的功能作用的一个范式：当研究人员处理概念化的资料时，它使研究人员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随着他的概念工具的转变，他从经验研究中得到不同的结果。

然而，这并不是说，概念的词汇总是一成不变地固定感觉、思

---

① B.L.Whorf,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in L.Spier, A.I.Hallowell, and S.S.Newman(eds.),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Menasha: Sapir Memorial Fund Publication, 1941), 75—93.

想和与之有关的行为。更不是说，这种引人误解的术语，其例证存在于每种语言之中(象沃夫的语言行为主义理论指出的那样)。人们并非永远地囿于他们所使用的(常常是继承而来的)概念框架：他们不但能打破这个框架，而且还能创造新的，更能适合于环境需要的框架。然而，在任何时候，人们应该准备发现：处于统治地位的概念会落后于个案的行为要求，这种事屡见不鲜。在这些有时是旷日持久的落后阶段，被错误地使用的概念会造成危害。这种概念与情景的不适应——人们通过痛苦的经验才认识到这一点——将会常常引起自我修正和更为适当的表述。任务是确认概念的落后，并使自己从趋向于产生认知的错误行为模式中解脱出来。①

概念分析的下一步任务是为社会资料建立可观察的指标，这些资料与经验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早期努力在迪尔凯姆的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构成了他对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尽管他沿着上述几条路线而形成的概念还没有达到最近的系统表述所达到的深刻、老练程度，他首先使用了"中介变量"(就象托夫曼和赦尔最近所描述的那样)，并且试图为这些变量建立指标。② 就我们的直接目的需要而言，这个问题包括在设计无法观察的指标或

---

① 广泛的探讨参见B.L.Whorf身后出版的选集：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of M.I.T., 1956)。这是极端的沃尔夫式立场，Joshua Whatmough在其著作中攻击了这个立场：Language: A Modern Synthesi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6), 85, 185—7, 227—34。然而，沃特莫的目标准确的万炮齐轰，并没有完全摧毁沃尔夫的立场，只是迫使他退到一个更局限，更利于防守的地位。社会固守的信念肯定影响感觉、思想和行为，但是，语言的结构提供足够的选择使不适当的概念被更为适当的概念所代替。对沃尔夫思想的赞赏性评论，可见于Franklin Fear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Benjamin whorf in the light of theories of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Harry Hoijer, ed.Language in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47—81。

② 迪尔凯姆的基本观点，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地出现于他的每一部专著之中，他写道："有必要……把我们的无法得到的内在事实，用代表它的外在事实来替换，而且

(接下页注)

设计象征性构筑的指标(例如：社会内聚力)——具有理论支持的指标之中。因此，概念分析成为对特定范围的事物进行初步的、周期性评价的基础，在此范围内，所采用的标记和象征符号是社会下层的适当指标。这种分析为人们提供了线索，以确定这个指标(或测量工具)对该场合是否确实适用。①

四、事后社会学解释

在经验社会研究中，往往先是搜集资料，然后，资料才被付诸解释性评论。这种程序具有临床探索的逻辑结构，在这个程序中，随着观察的进行，资料随时得到解释。这些观察可以具有个案历史或统计的性质。该程序的界定特征是在观察完成之后引入解释，而不是对原定假设进行经验检验。这个含糊的假定是：概括化了的命题主体已经充分建立，因此，它几乎可以适用于手头的任何资料。

这种事后说明旨在"解释"观察，在逻辑功能方面与某些很相似的程序不同，在那些特别相似的程序中，使用观察资料为的是导出新的假设，以待新的观察加以证实。

(接上页注)

通过后者研究前者。"参看他的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第二章，Le Suicide(Paris，F.Alcan，1930)，第22页及其后各页。关于迪尔凯姆对社会指标观点的最详尽的论述由Harry Alpert所提供：Emile Durkheim and His Soc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第120页及其后各页。关于一般问题，参看C. L. Hull，"The problem of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molar behavior theory，"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273—91。

① 关于这一点，在概念分析的许多功能中，人们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指标对其环境而言，是否是"中性的"。通过找出假想物作为指标(例如：宗教的皈依，态度尺度)，这些假想物出于对可观察物的选择(并且印证一个已知总体)，概念分析引起对一种可能性的适当检验，即：指标已脱离其基础而自成一体。这一点的清晰论述请参看Louis Guttman，"A basis for scaling qualitative dat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4，9，139—50，尤其是第149—50页。

这种程序的一个无懈可击的特点是：解释确实符合所进行的一系列观察。这毫不奇怪，因为只选择那些事后假设，这些假设就一定与观察一致。如果这个基本假想成立——也就是说，事后解释利用已得到广泛证实的理论——那么，这种类型的解释确实是“向资料的浑沌世界，射进一线先明”。但如果这些事后假设也是特别的事先确定，或至少有点轻微程度的事先确定(象在社会学解释中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么，这种被沙利文(H.S. Sullivan)称之为“早熟的解释”，就使人们产生一种虚假的适用感，其代价是取消了人们进一步探索的刺激因素。

事后解释停留在貌似有理(低证明价值)的水平，而没有导向“无懈可击的证据”(一种高度的证实)。貌似有理与无懈可击的证据不同，当一种解释与一套资料（这些资料确实是典型地引导人们决定使用一个解释，而不是另一个解释)相符合时，这就是貌似有理。它也意味着，同样与这些资料相符合的不同解释尚未得到系统考察；而且，从这些解释中所得到的推论，尚未经受最新观察的检验。

事后解释的逻辑谬误在于一个事实，即：可以得到许多粗糙的假设，每个假设都具有某种证明手段，但它们被用来说明几套互相矛盾的事物。事后解释的方法并不意味着自我取消，如果仅仅是因为它如此彻底的灵活性而招致这种误解的话，实属不当。例如：人们可以这样报道：“失业者倾向于比失业前读更少的书。”这一点由一个假设得到“解释”：作为失业的后果，人们的焦虑与日俱增，因此，任何要求精力集中的活动，如阅读，就变得困难起来。这种类型的解释貌似有理，因为，事实表明，在这种情形下会发生更深的焦虑，还因为，病态的心思重重的状况定会干扰有组织的活动。然而，如果现在有人说原始资料是错误的，并且事实是：“失业者比失业前读更多的书”，一个新的事后解释可以

仅阐释理论，而不是检验理论。①

五、社会学中的经验概括

人们常说：社会学理论的目的是达到社会一致性的描述。这是一个省略判断，因而需要加以澄清。有两种类型的社会学一致性描述，它们对理论的影响大不相同。其中第一个是经验概括：一个孤立的命题总结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所观察到的关系一致性。②社会学文献中有很多这类概括，这些概括尚未被吸收进社会学理论。因此，恩格尔(Engel)的消费"定律"可以被引以为例。哈尔布瓦曲(Halbwachs)的发现同样也可以引以为例，他发现，体力劳动者比属于同一收入阶层的白领职员人均花费要大，③这种概括的精确性可大可小，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探索结构中的逻辑地位。格罗夫斯—奥格本(Groves-Ogburn)的发现可以作为美国城市的样本，即："具有较大比例的人数从事制造业的城市，一般说来，也有较高比例的已婚年青人"，这个发现用一个表明这种关系的方程式来说明。尽管这种概数命题在经验研究中是必要的，但这些命题的混合体只能为社会学这个学科提供原材料。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面向理论的取向，首先在于弄清楚各种一致性对相互关联的命题

---

① 很难看出布鲁默根据什么断言这些解释不可能仅仅是对理论的阐释。他的评价是：材料"获得它们原来没有的重要性和理解力"，这些材料将普遍地应用于事后解释。

② 如杜威所指出的，术语"经验的"这种使用方法是普通的，在这个上下文中，"经验的"意味着：已知命题的主题只代表若干特点的统一联合，人们反复地观察到这些特点的存在，而不理解这种联合为什么出现；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说明其基本原理。John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38), 305.

③ 参看C.C.Zimmerman所总结的这种一体化的大量选集：Consumpti ont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New York: D.Van Nostrandco., 1936)，第51页及其后各页。

发生的作用。指导性研究的概念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①经验探索被如此地组织起来，如果，或者当经验一致性被发现，这种一致性会给一个理论系统带来直接结果。只要研究是在指导下进行的，在得到发现之前，就可以提出这个发现的基本原理。

六、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概括的第二种类型是所谓科学定律，它与先前的定律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可从理论导出的恒定陈述。在社会学界缺乏这样的定律，这种缺乏也许反映了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显著的分流。尽管有许多著作论述社会学理论史，尽管有大量的经验调查，社会学家们（包括本书作者）仍可以讨论社会学定律的逻辑标准，而不必引证任何一个完全满足这些标准的例子。②

与这些标准大同小异的东西并不完全缺乏。为了表明经验概括对理论的关系以及为了明确理论的功能，考察一下一个熟悉的

---

①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仅仅是因为它使获得丰富的新发现各种可能性显得自相矛盾，这些新发现将经验研究完全局限于检验预定的假设。产生于探索过程的预感，也许对一个较广阔的理论系统没有直接的明显的意义，这些预感终归会引起经验一致性的发现，而这个发现以后能够结合进一个理论。例如：在政治行为社会学中，最近已经确定：选举人所承受的社会交叉压力的数量越大，他们表现得对总统选举的兴趣越小(P.F.Lazarsfeld,Bernard Berelson,and Hazel Gaudet,The People's Choice(New York:Duell Sloan & Pearce,1944),56—64)。当首次对该项研究进行系统表述时，这项发现完全出乎预料，这个发现也可以引发对政治行为进行系统探索的新路线，尽管它尚未被结合进一般理论。富有成效的经验研究不仅检验从理论上导出的假设；它还产生新的假设。这可以被叫做经验研究中的"理论偶发"(serendipity)成分，即，由于机遇或睿智，发现事先并未寻求的有效结果。

② 例如，参看George A.Lundberg的探讨："The Concopt, of law in the Social sciences,"Philosophy of Science, 1938, 189—203，上述篇章断言这种定律的可能性，而未举出个案说明。K.D.Har的书：Social Laws(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 ina Press, 1930)并未完成本题目所包含的意思，一些社会科学家讨论了获得社会定律的可能性，他们发现难以举个案为例(Blumer，见前引书，第142—50页)。

个案是有益的，在该个案中，这些概括被结合进一个实质性的理论主体，即在各种对象总群中，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比新教徒低。①因此，该个案长期以来作为统计的一致性而得以确立。一致性以这种形式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这种一致性只是建立了一个经验的规律性，只要一个理论能从一套其他的命题中导出，经验的规律性就会对理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一套命题中导出理论，这正是迪尔凯姆所从事的工作。如果我们以正规的形式复述他的理论假定，他的理论分析范式就很清楚了：

1.社会内聚力为承受极度紧张和焦虑的群体成员提供心理支持。

2.自杀率是人们所承受的未解除的焦虑与紧张的函数。

3.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具有更大的社会内聚力。

4.因此，可以预料，天主教徒中的自杀率低于新教徒的自杀率。②

上述个案有助于明确经验概括与理论的关系位置，并且有助于说明理论的几项功能。

1.它表明：理论适时性并非原来就存在或不存在于经验概括之中，但是，当概括通过高度抽象地概念化之后（天主教的信条

---

① 几乎不用说，这种说法假定：教育、收入、民族、城—乡居住地和其他因素都是不变的，而这些因素可以表示这个发现是虚假的。

② 我们不必考察这个说明的其他方面，例如（1）我们对迪尔凯姆的解释中含糊不清的前提进行充分说明的范围；（2）补充理论分析——它不是把这些前提看作已知物，而是看作问题；（3）根据——以此为根据，理论解释潜在的无止境的退化被阻止在一点，而不是另一点；（4）涉及把诸如社会内聚力这样的中介变量的引进问题，这种变量是不能直接测量的；（5）前提被从经验上证明的范围；（6）由这种说明所代表的较低程度的抽象，以及（7）迪尔凯姆从这同样的一套假设中导出几个经验概括这个事实。

此，如果独立量度表明天主教徒中的社会内聚力下降，理论家就会预告这个群体中自杀率将上升的趋势。然而，非理论的经验工作者就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以经验探索为基础进行预告。

5.上面列举了功能假定理论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属性，这个属性并不完全符合迪尔凯姆的系统表达，而且引起了(至少是迄今为止)特别困扰社会学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如果理论有活力的话，它必须特别精确从而是确定性的。精确性是可检验性标准的一个组成成份。当我们认识到训练有素的探索中精确性的逻辑位置，在社会学中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使用统计资料以控制和检验理论推断的普遍压力的做法，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基础。

从理论中导出的推论(预见)越精确，有选择性假设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假设将适合上述预见。换言之，精确的预见和资料有助于减少从经验联系中得出逻辑谬误的结果。① 众所周知：从一个理论导出而又被证实了的预见，并不证明或说明那个理论；预见只提供一种证明的量度，因为，从不同的理论系统导出的不同假设，也可以说明已预见到的现象——这样做总是可能的。② 但是，那些接受由观察所证明的精确预见的理论，具有总体重要性，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以便从不相上下的假设中进行选择。换言之，精确性提高了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观察或实验的

---

① 当然，“通过预见来证明”的范式具有逻辑谬误：

如果 A(假设)，那么B(预见)。

观察到B，

因此，A是真的。

只要正式标准不介入，上述范式对科学研究的干扰并不大。

②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本世纪中叶，不同的理论家曾预见过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血腥冲突。例如，索罗金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大相径庭的理论系统为基础，提出了这个预见。大规模冲突的实际爆发本身并未能使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分析方案中作出选择，如果仅仅是根据观察到的事实与两种方案都是一致的来判断的话。只有当预见非常具体，非常精确，以至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一种预见，而不是与另一种预见巧合，才能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检验。

可能性。

一个理论的内在凝聚力具有同样的功能，因为，如果各种各样经验证明了的结果都源于一个理论系统，这就减少了一种可能性，即：势均力敌的不同理论都能适当地说明同样的资料。整合性理论比不同而又互不相关的假设提供更大量度的证明，这样，可以积累起更有份量的证据。

要求精确性和逻辑内聚力的双重压力，可以导致无生机的行为，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任何程序都可被使用或被滥用。不顾一切代价地过早地坚持精确性，会扼杀富有想象力的假设。为了进行有结果的量度，这就导致了对科学问题的重新阐述，其结果是其后的材料不受身边那个最初问题的影响。① 在寻求精确性的过程中，应该倍加小心地保证做到：并不因此而对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同理，要求逻辑一致性的压力也常常引起关于词义的争执和理论僵化，因为，包括在分析系统内的假定如此地远离经验对象，或者具有这样高度的抽象化，以至无法进行经验探索。② 但是，探索的这些标准并不因为有人滥用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七、正规推导和整理

上述有限的说明至少指出了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是必要的。这两方面普遍的分离，一方面表现为经验研究明显地支离破碎，另一方面表现为系统的理论化过程没有经验检

① Stuart A.Rice 评论了在公众舆论方面的这种倾向；参看 Eleven Twenty-six：A Decad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 Louis Wirth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167。

② 在经济学界，就是这种实践被 E.Ronald Walker 指称为"理论困窘"。From Economic Theory to Polic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Chap.4。

导致了序列试验，①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导致了一系列结构严谨的调查。这种系统表述的一个结果是，它对互不相关、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解释的引进加以控制。它并不强加给读者一个任务，要他们从对原文的解释中发掘出其中的相互关系。② 总而言之，它为连续性的、累积性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以避免象以前那样的漫无边际的分散调查。

似乎需要一个相关的程序，这就是拉扎斯菲尔德所命名的"整理"。正规推导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理论的含义上，而整理试图在明显不同的行为领域把有用的经验概括系统化。一反往常任凭分散的经验发现处于休闲状态或任人指称为行为的不同领域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相关的临时假设这一认真打算，有利于扩展现存理论，并进一步导致经验探索。因此，在许多领域，经验发现，成果累累，如在宣传和公共舆论、对失业的反应，以及家庭对危机的反应领域，莫不如是。这些丰富的成果意味着：当人们面对一个"客观刺激模式"时——这个模式旨在引出人们违反自己"初衷"的反应——可以根据他们的预先计划对其实际行为作出更成功的预测，而不是根据刺激模式。这体现在宣传中的"飞镖(自食其果)效应"，③ 体现在对失业的调适与非调适反应方面的

① 在这方面，Clark Hull 及其合作者的著作是卓越的。例如参看：Hull, Principles of Behavior(New York: D.Appleton Century Co., 1943)；还有 Kurt Lewin 有关正规化方面与此相媲美的著作(例如：Kurt Lewin, Ronald Lippitt, and S.K. Escalona,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I〔"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第16卷(Iowa City, 1940)〕, 9—42)。

② John Dollard, Caste and Class in a Southern Town, 该书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读者很难弄明白该书所抨击的理论问题，可解释的变量以及解释中的含糊假想。然而，如果要对 Dollard 的工作进行系统研究的话，所有上述难点都必须弄清楚。

③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Studies in radio and film propaganda",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csII, 1943, 6, 58—79。

发现，① 也体现在对面临收入锐减家庭的稳定性的研究。② 经过整理的表述，即使粗糙如是，也引起了一些理论问题，如果不把这几个经验发现放在同一情境中进行再检验，这些理论问题就很容易被忽略。据认为：整理作为完成(将被检验的)假设的正规推导的一个程序，将促进生气勃勃的社会学理论与目标明确的经验研究的共同发展。

---

① O.M.Hall, "Attitudes and unemployment", Archives of Psychology, No. 165(March, 1934), E.W.Bakke, The Unemployed Worker(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② Mirra Komarovsky, 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0) ; R.C.Angell, The Family Encounters the Depress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6) ; E.W.Burgess , R . K.Merton 以及其他人, Restudy of the Documents Analyzed by Angell in The Family Encounters the Depression (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2).

第五章 经验研究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

历史具有某种推陈出新的禀性。这一点可以社会学的发展史为例来说明。社会研究工作者带着调查问卷和笔，满腔热情地寻求着孤立而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这种老式手法已不合时宜；同样，老式的社会理论家高踞于纯观念的天堂，对世事充耳不闻，其老套陈规照例会很快地成为昨日黄花。因为，在最近数十年中，为建设社会学的大厦，理论家和经验工作者已学会携手工作了。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已学会在此过程中互相交流意见。在很多情况下，这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家学会了自我交流，因为，人们逐渐同时从事理论和实际研究。专门化的发展和整体化的发展已经在齐头并进。所有这一切不仅使人们认识到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应该相互作用，而且导致了这种相互作用的实现。

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对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的关系作提纲挈领式的笼统解说。在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经验研究正在大批地增长，因此，人们就逐渐可能对理论人作和经验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进行有益的探讨。而且，众所周知，这样的讨论向来不少，它们充斥于各种报刊杂志。这些讨论普遍地把问题集中于理论在经验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常常明确、透彻地阐明理论在经验探索的开创、设计和实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关系，由于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因此，需要考察关系的另一面：经验验究在社会理论发展

中的作用——这是本章的要旨。

一、经验研究的理论功能

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近来的社会学讨论只赋于检验研究一个主要的功能：检验或证实假设。完成这项功能的正规模型既明白无误又为人熟知。调查者从预感和假说出发，并从中得出各种各样的推论，这些推论反过来又受到经验的检验，以对假说加以肯定或否定①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逻辑模型，当然不能对有成效的经验研究中的实际情况作出详尽的描述。这种模型表达一组逻辑规范，却并不描述经验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在提纯、净化实际情况时，逻辑模型还有可能歪曲事实，这一点逻辑学家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模型是从事件的时间顺序中抽象出来的，而其他诸如此类的模型莫不如是。逻辑模型一方面夸大了明确理论的创造性作用、一方面把观察的创造性作用贬到最低点。因为，经验研究不是仅在逻辑上与观察相融合，经验研究具有逻辑上的作用，也具有心理上的作用，尽管人们从经验研究逻辑严密的报道中很难意识到这一点。② 我们所探索的，正是经验研究在心理上和逻辑上两方面对社会理论施加的强制作用。

---

① 参见 Lundburg 对 Stouffer"干预机会理论"的系统评论："What are sociological problems?"，载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1年第六期，357—369页。

② 参见默顿"Science, population and society"，载The Scientific Monthly，1937年第44期，170—171页；Piaget "Judgment and Reasoning in tne Child"(伦敦 1929 年版)第五、九两章对此作了适当评论，以及 George William"The Scientist in Action"（伦敦1936年第153页）中"A piece ot research does not progress in the way it is 'written up' for publication"也作了评论。

我的中心论点是：经验研究远远超出了证实理论和检验理论这种被动的作用；它除了肯定假说和否定假说之外还要发挥更多的作用。经验研究充当的是一种主动角色：在助力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经验研究至少行使四种主要功能——它引出理论、重整理论，调整理论、澄清理论。①

二、理论偶发模式(出乎意料的、异乎寻常的和对总体有重要意义的资料迫使人们开创理论)

在一定条件下，经验研究的发现会激发社会理论。我早先的一篇论文，把这个观点非常简要地表述如下：富有成效的经验研究，不仅检验从理论上推衍出的假设，而且还引出新的假设。这可以被称之为经验研究中的"偶发"成分，这就是说，由于机遇或睿智，发现了原先并未寻求的有效结果。②

偶发机遇4a模式涉及到相当普遍的经验：所观察到的出乎意料、异乎寻常、对总体有重要意义的资料成为发展一种新理论或扩充一种现存理论的条件。此模式中的每一种成分都易于描述。首先，这些资料是始料未及的。旨在检验一种假设的研究，而在进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副产品——一个始料不及的观察现象，它关系到一些并非研究之初就要针对的理论问题。

---

① 第四个功能，即澄清作用，Paul F.Lazarsfeld在其著作中曾加以详论。

② 默顿的"Sociological Theory"载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5年第50卷，第469期。十分有趣的是，"偶发"这一怪僻的术语，由Horace Walpole 1754年杜撰以来，几乎一直不甚流行。这个词也被心理学家Walter B.Cannon用来表示类似的涵义。参见他的著作"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 New York：W.W.Norton，1945年版)，第六章，其中他提出了在几个科学领域中大量的偶发性例子。(接下页注)

其次，观察到的现象是异乎寻常的，令人吃惊的。[①] 这既是因为它看起来和通行的理论相矛盾，也是因为它与其他已经确认的事实相矛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所出现的矛盾触动了好奇心，激励研究人员去寻求解释，以"使这一新发现的事实讲得通"，以使其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知识结构。于是，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重新观察，从观察中引出推论——当然，推论很大部分取决于研究人员的一般性理论目标。研究者越是深入钻研事实，就越有可能想出富有成效的探索方向。如果新的预感有幸获得证实，那么

（接上页注）并由于上述文字首次写于 1946 年，serendipity 这个字尽管调蹊怪僻，但远已远地扩散出学术界。其神速的扩散可以由其最近在New York Times 版面上的变动得到说明。1949年五月22日，《纽约时报》的科学编辑 Waldemar Kaempttert 在科学新动态版内偶然使用了 serendipity这个词，总结经验科学家 (research scientist) Ellice McDonald 的一篇文章。大约三个星期以后，六月十日，每日《时报》的书评作家 Orville Prescott 在写一篇书评时，显然迷住了这个词，书中的主人公喜欢稀奇古怪的字眼。在书评中 Prescott 猜想这个主人公是否知道 Serenpidity 这个字眼。在1949 年的独立日， Serenpidity 赢得了整个社会的接受。 Serendipity 不动声色地出现在《时报》的头版，并且未加引号，也不再需要一个同位修饰语。它在一份来自俄克拉荷马城的新闻发布件上也获此殊荣：这份新闻件由俄克拉荷马医学研究基金会所提供，报道盘尼西林的发现者 Alexander Fleming 的一次讲话。（讲话引文略） Serendipity 从囿于科学小圈子的版面到较少限制的书评栏，及至众所瞩目的头版的变迁，使其得到自然归化。也许，它会很快进入美国改编的字典。

那么，这是又一例证，说明一个在日常用法中久未谋面的术语，已被重新发现并得到广泛使用。（参见第四章的注释6，关于术语anomie 的类似历史。）值此之际，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个佶屈聱牙而又有用的词近年来的文化共鸣呢？

Elinor G. Barber 和我对这类问题进行了社会语义学的专题研究—— Serendipity 这个词的文化扩散。此项研究考察了这个词在十八世纪被杜撰出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在十九世纪初次出现于印刷品的有关思想气候；当人们第一次见到它时，象对其他新词一样的模式化反应；这个词在不同的社会圈子的扩散，如：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工程师、词典编纂家和历史学家；在扩散和随心所欲的使用过程中其含义所经历的变化。

① Charles Sander Peirce 很久以前在解释他的外展 (abduction)，即把创立和接受假设作为推论的第一步时，就注意到了"惊人事实的"重要作用。参见他的"Collected Papers"，第六卷，第522—528页。

异乎寻常的事实最终就导致了理论的更新或扩展。这样，由异常的资料所激起的好奇心也就暂时得到满足。

第三、未曾预期的事实必须是对总体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说，其涵义必须和普遍性的理论有关——由于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当然就不会只关心事实本身，而是更多地关心观察者针对事实所提出的一切。因为要从一般现象发现出个别来，显然需要观察者在理论上非常敏感。总之，人们几个世纪以来早已注意到了象口误、笔误、印刷错误和记忆误差这类"小"事；但是，将这些事实看作对总体有重要意义的资料，需要弗洛伊德那样的理论敏锐性，通过这些资料，他就可以扩展他的抑制和症状行为理论。

因此，偶发模式包含始料未及的、异乎寻常的和对总体有重要意义的资料，它对研究者施加压力，迫切要求为扩展理论而探索新的方向。偶发性事例散见于许多学科领域，但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个最近的社会学研究为例。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克拉夫镇，① 它是一个郊区定居点，有七百户左右的人家，大多是工人。在研究克拉夫镇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高比例的居民加入城市居民组织、政治性组织以及其他自愿性组织，这比他的原先的居住地区要高得多。我们非常偶然地进一步注意到：有幼儿、有儿童的父母参加社会组织的人数也有增长，这一发现和常识颇有出入、因为，众所周知，尤其是在经济收入较低的下层社会，孩子总是拴住父母，妨碍他（她）们积极参与家庭以外有组织的群体生活。然而，克拉夫镇的父母们自己轻而易举地对此作了解释："噢，并没有什么实际困难妨碍晚上出门。"一位参加了几个组织的母亲说，"很容易在附近找到十几岁的孩子来照看娃娃。这附近十几岁的孩子真多，比我过去的住地要多得多。"

① 引自"住宅问题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持续研究，它由 Lavanburg基金会所赞助。

这种解释似乎足以平息调查人员的好奇心，假如不是有种令人困惑的事实：象大多数居民点一样，克拉夫镇上少年的比例很小，如十五至十九岁之间的人数仅占3.7%。更有甚者，克拉夫镇上成人中三十四岁以下的占63%，因此，其中孩子的极大比例是幼儿和儿童。这样，克拉夫镇中远远不是有许多少年可以照看儿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十几岁的少年与十岁以下的儿童之比是1：10，而在原先的社区里，该比例总是在1：1.5左右。①

于是我们立即面临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它肯定不在我们原先的观察计划之中。我们在着手进行克拉夫镇的实地调查时显然没有，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先带着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基于一种错觉，有许多十来岁的少年可以照看儿童。这是一例既出乎意料，又异乎寻常的观察现象。那么它是不是对总体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曾预先断定其“内在”重要性。它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恰如弗洛伊德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在前线)所做的一次观察，他看错了一个报头标题，把“Die Feinde Vorl Görz”（敌人逼近哥尔茨)看成了 Der Firede Von Görz”（和平来到哥尔茨)。弗洛伊德把一件偶然的小事转化成一个有关全局的事实。在克拉夫镇上居民的主观印象和客观事实之间观察到了差异，除非对这两者间的差异可以作一个和上例多少有点儿相似的转化，最好是不去理会这种差异；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从无关紧要到事关重大的转化，它就显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

这个错觉之所以首先成为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事例，是因为难以对它作这样的解释：它仅仅是为了既得利益需要的故意做作，即为了既得利益的需要而故意散布与事实相左

① 如果比较十岁以下的孩子和十至十九岁孩子的年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克拉夫镇和原先的社区之间在年龄分布上有基本相同的差异。如果我们把五岁以下的儿童作为需照看的孩子进行比较，这种不均衡将会更为明显。

对理论偶发模式作如下说明或许更为充分：一个出乎预料的、异乎寻常的发现引起了研究者的好奇心，引导他沿着一条事先未曾考虑到的僻径前进，而最后导向一个崭新的假说。

三、理论的重整
（新资料迫使人们建立一套概念系统）

然而，并不是仅仅通过异乎寻常的事实，经验研究就可以引起理论的扩展，还需要通过反复观察，观察那些迄今被忽略了的事实。通常用来说明某个命题的一个现存的概念系统，一旦不能充分地解释这些事实，进一步的研究将迫切要求重新改造其概念系统。结果就要引入某些变量，它们尚未系统地包含在原来的分析结构中。这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这些资料并非异乎寻常，并非未曾预期，也并非和现存理论不相容，只不过尚未被意识到是相关的资料。理论偶发模式致力于迫切要求解决的明显的矛盾，而重整模式却致力于迄今被忽略的相关事实，这些事实要求扩展概念系统。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层出不穷。因此，正是由于一系列的新经验事实，引导马林诺夫斯基将一些新的要素结合进一种巫术理论。当然，也正是他所调查的特洛布里安德岛民(Trobriander)给他提供了线索，使他的理论独具一格。当这些岛民在内环礁湖里用毒饵法捕鱼时，他们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并捕获甚丰；其中既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无法控制的偶然事故。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里注意到：人们没有使用巫术。但如果是在广阔的海域里捕鱼，产量不稳定，危险时有发生，那么巫术的仪式就得到广泛采用。从这些富有成果的观察中产生了他的理

论；巫术的信念使人类跨越了实际追求中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增强信心、减少忧虑、开辟出一条绝处逢生之路。巫术被看作一种为达到实际目标的技术补充。正是上述这些经验事实，给有关巫术的早期理论注入了新的因素——特别是巫术和偶然的关系，巫术和风险的关系，以及巫术和不可控制性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实和原先的理论发生矛盾，而只不过意味着原先的概念系统未曾适当地考虑过它们。这也并不是说马林诺夫斯基在检验一个预想的假说，而只不过是说他在经验资料的启发下，对某个理论进行了扩展或改进。

为说明经验资料如何迫切要求重整一个具体理论，我们再举一个更切要的例子。我们调查过一个独一无二的戏剧性事例，即对公众的宣传攻势(mass persuasion)：由一位电台明星凯特·史密斯作间歇不断的广播，一天长达十八小时，以大量兜售战争公债。我并不打算评论这种宣传攻势的原动力；① 按本文的论题，我们只关心其中所涵的两种事实。

首先看第一种事实：通过与买了史密斯公债的纽约人作深入细致的交谈，发现许多调查对象对广告、商业和宣传活动都不抱幻想。他们感到自己是被人操纵的对象并对此深恶痛绝。他们极其反感自己成为广告连蒙带唬连哄带吓的目标。他们反对被宣传的浪涛所困扰，那些宣传所散布的舆论，所倡导的行动，都不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十分厌恶那种实际上是伪装一致(Pseudo Gemeinschaft)的做法——那些巧妙的推销手段，假装关心顾客的切身利益以求一逞。正如一位小商人所说："根据我做生意的经验，我能看出很多人做起生意来都要摆出某种姿态，貌似友善，貌似真诚，诸如此类，差不多都是假的。"这些来自高度竞争、高

① Merton，Fiske和Curtis所著的Mass Persuasion

度分化的都市社会的调查对象，描绘出一幅社会处于反常状态(a-nomic)的景象，在那里人人互不信任，共同的价值观被个人私利的汪洋大海吞没了。人们感到社会就象是个尔虞我诈的竞技场，很少相信会有什么大公无私的品行。

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却有第二种事实：我们发现，同样是这些调查对象，他的大都相信史密斯之所以发起购买公债运动，是出于正直和真诚。通过较大量的横剖面抽样，以面询法对近千名的纽约人进行民意测验，发现绝大多数人持这种看法。足有80%的人坚持认为，史密斯成天整日进行马拉松式的鼓动，完全是为了促使人们购买战争公债；而只有17%的人觉得她还兼顾自己蜚声扬名；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3%，才相信她主要是想出风头。

对她的真诚的强调，对声誉形成的研究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为她每星期至少六次要出现在商业出资主办的广播节目中。然而，尽管史密斯的宣传鼓动和其他人毫无二致，可是在大多数调查对象来看，她和别的宣传鼓动明显的作为截然不同。用一个崇信者的话来说：“她是真诚的，她所说的话都实实在在，表里如一。这不是坐在那说话，然后拿钱完事，她和其他人不一样。”

为什么对史密斯的真诚会有如此强烈如此坚定的信任呢？可以肯定，使人们产生异化感和隔离感的同一个社会，也使许多人渴望恢复信用，热望互相信任，希望以诚相待。可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却信任史密斯？为什么那些希冀从欺诈的泥沼中获得解救的人们，都认为史密斯真诚无欺？为什么人们相信她的动机不是贪婪，不是野心，不是优越感？史密斯的形象俨然是真诚的化身，其中的社会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

有几个根源。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其中之一，它和对公众发起宣传攻势的理论有最直接的关系。其线索就在于：凡是听过史

至深，我简直无法忍受下去了"。马拉松鼓动具有献祭仪式的特征。

简言之，与其说史密斯用语言证实了自己的真诚，不如说她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连续十八小时的广播，其艰辛劳苦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个事实而不是语言，作了不容置疑的明证。有的听众可能会怀疑她是否在作戏，但他们不能否认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她为此付出了整整一天的辛劳。另一位调查对象解释了赞扬史密斯行为的直接依据："她用了整整一天而别人却没有，由此看来，她作出了更多的牺牲，因而更真诚。"把马拉松鼓动看作一种宣传攻势的实施过程，它转变了听众中原先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承认史密斯是正直的，起初尚属勉强，之后就完全发自内心了。持续不断的广播起到了言必行，行必果的作用。她的实际行动加强了语言的力量。言语好似货币，它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有行动的黄金为后盾。更何况这种黄金的储备量甚至并不需要和货币发行量相接近。

上述经验研究说明：对那些不相信言语宣传的人，事实宣传可以奏效。凡是在社会结构混乱、社会状态反常、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地方，都会发现宣传盛行，泛滥成灾。任何关于价值观的论说，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纯宣传"。规劝告诫之类都是可疑的，然而以行动来作宣传却能得到较高度的信任。许多听众主要根据事实来作结论——这样，他们可能减少被操纵感。如果宣传者具有象征性的言行一致，就会促使人们相信他的真诚。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确定：这种有言有行的宣传方式，在反常状态的社会中，是否比在充分整合的社会中更为有效。但这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例证并非不同，上述的例证可以说明经验研究起了这样的作用：它提出一些新的变量，并把它们与一个具体的理论相结合。

四、形成新的理论兴趣中心（经验研究的新方法迫使形成新的理论兴趣中心）

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考虑了经验研究对特定理论发展的作用。但是经验研究也还影响理论发展的更为一般的趋向。这主要是通过建立研究程序，使理论的兴趣中心逐渐转移到研究所针对的问题上来。

这样做的理由总的来说是一目了然的。总之，全面的理论总是在汇集、调配有关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而新建立一个研究程序有助于提供汇集、调配所需要的素材。原先无法利用的新资料，促使形成新的假说。而且，理论家们发现。有一些已经设计好了研究方法的领域，可以适合直接检验他们的假设。理论家再也不需要等待资料的偶然出现了——旨在验证假设的研究可以随时进行。这样，有关的资料不断涌现，加快了某些理论领域的进展速度；而在其他理论领域，由于缺乏充分的观察而停滞不前，于是注意力也因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我们指出新的理论兴趣中心随着新的研究程序的建立而转移，但我们并不是说唯有这些程序才起决定性的作用。① 例如，把宣传解释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这种理论，引起人们日益广泛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形势正在改变的反响，反映出其中主要的意识形态体系之间发生的冲突；大众传播的新技术为宣传开辟了新的通途，无论是巳经宣布还是未经宣布的众多研究成果，它们都得到了对这种新战争武器感兴趣的政府或企业的资

① 这些程序、仪器和设备本身又和原先的理论有关，这也许无需赘述，但这并不改变它们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所起的刺激作用。

助。然而这一转变也是随着事实不断积累而来的副产品，这些事实的获得是通过一些新发展的、显然处于最初阶段的研究方式，诸如内容分析法 (Content-analysis)，典型对象群调查技术 (the panel technique)以及集中交谈(focused interview)等等。

在近来社会理论的发展中，有许多这种影响作用的例子，但这里我们只略举几例。由于引入了新设计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是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主题统觉测验 (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游艺技巧(play techniques)以及讲全故事(story comptetions)的能力，研究个人品质和个性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理论，明显地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同样，莫尔诺(Moreno)等人关于社会成员心理的研究及测定技术(sociometric techniques)以及"被动交谈"(passive interview)技术的新进展，使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论又重新恢复了兴趣。此外，这些方法还产生出一种可以称为"初级群体的再发现"(rediscovery of the primary group)倾向，这种倾向在理论上特别地表现为：把社会的非正式结构理解为处于个体和较大的社会正式组织之间的某种中介。这种理论上的兴趣可以在论述非正式群体——例如在工厂的社会系统中、在官僚体制中、在政治组织中——的作用和结构的整个文献中看到。同样，我们可以预期：最近引入的典型对象群调查法——即重复地和同一组调查对象进行交谈——将会很快地把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比较明显地集中在有关的理论上：人们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面临选择时如何作出决定，参加政治活动的因素，以及在自己所充当的各种角色的要求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决定行为的因素；这里所提到的几种类型的问题尤其适合采用上述典型对象群调查法。

按照恰当的理论分类而组成的社会学统计方法是一个创举，它也许是经验研究程序对理论的最直接的冲击。塔尔考特·帕森

斯观察到：只有当数据资料能用于类比分析时，它们才有科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他们观察到："许多流行的研究，它们所产生的事实都以某种形式出现，这种形式不能适用于一般流行的分析系统"。① 这些不久前还是言之有理的限制，现在正逐渐失灵。过去，社会学家主要是得处理一系列预先收集好的统计资料——它们经常并不是为了社会学的目的而搜集——因此，没有直接按照任何理论系统进行分类。结果，至少就定量化事实而言，理论家就被迫使用牵强的、与所研究问题稍有联系的数据资料。这样不仅很容易发生错误——试想一下迪尔凯姆（Dwrkheim）曾不得不依赖的社会内聚力的粗糙指数——它还意味着理论得等待有关资料的偶然出现，而通常有关的数据资料几乎要靠碰运气才能得到。这样，理论就不能快速进展。这种景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

理论家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几乎完全依赖官方行政部门或社会福利机构的舆论来为自己提供数据资料。塔德在半个世纪前，为社会心理学统计的需要——尤其是统计人们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等方面——而设计的研究纲要，② 已经兑现了一半。同样，社区组织的调查者们正创造出阶级结构的统计学、社团行为的统计学以及派系形成的统计学——这已在理论方面留下其印记。人种学研究正开始提供定量资料，这些资料为理论家重新确定了方向。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学资料——尤其是由战争部情报及教育处调研室所积累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新的调研技术的产物，这些资料将强化人们对群体道德理论的兴趣，以及对宣传和领

---

① 帕森斯，"The role of theory in social research"，载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年第三期第19页；参见他的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1937），在第328—329页，他写道"……在社会领域中最有用的统计情报，其水平还不能适于分析理论的类目"。

② Gabriel Tarde, Essais et mélanges sociologiques, (Paris, 1895)pp230—270。

导理论的兴趣。① 然而，这里不必再多举事例了。

上述内容并不就是说，统计资料的堆积本身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它却意味着：理论兴趣趋向于转到具有丰富的合用的统计资料的领域。② 而且，我们只是唤起对这种焦点转移的注意，而不是评价这种转移。倒是很可以这么说：有时理论兴趣的改变，把注意力带到那些在理论意义上，或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并不重要的"问题上；它可能使注意力从涵义较深较广的问题转移到那些可以指望立即获得解决的问题上。由于缺少详尽的研究，对这一点还很难作出全面评价。但是，正如在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在社会学领域这个模式本身似乎已足够清晰了：由于使用新技术，新的原来无法得到的资料现在已能为人所用，因此，理论家把分析的眼光落到这些资料所含的意义上，并找到探索的新方向。

五、概念的澄清（经验研究使概念澄清）

很大一部分"理论化"的工作是澄清概念——这是势在必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毛病，往往是出在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这种问题上。如果研究的兴趣主要是在方法论上，那么它的工作就集中于设法去建立因果关系，而对研究过程中所包含的变量就不考虑作适当的分析了。这种不注意澄清根本性变量的研究法叫做方法经验主义（methodological expiricism），它是大部分流行的经验研究的普通特征。据此，人们设计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实验，查平（Chapin）发现，"公共建房计划为贫民窟家庭重新建造房舍，

① S.A.Stouffer 和其他人合著 The American Sololier，该书据说已经出版。

② 统计的数据资料也可使得以理论指导试验的研究足够精确；参见本书第二章关于精确的功能论述。

其结果使这些家庭的居住条件和社会生活得到改善”。[1]还有社会心理学家通过一些受控的实验，考察出照顾孤儿的家庭(foster horme)在儿童智力测验的表现中所起到的作用。[2]此外，还通过实验探索，研究者试图决定一个宣传影片是否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改变公众对英国人的态度。这几个事例，代表了一大批促进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工作，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并不按照它们的概念要素来分析经验变量。[3] 丽贝卡·伟斯特(Rebecca West)以她特有的明确性，提出了这个方法经验主义的普遍问题：人们可以“知道A和B和C都以一定的因果关系相联系，但丝毫也不需要了解A或B或C的本性”。结果，这些研究工作推动了探索的进程，但是它们的发现并不加入日益壮大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行列。

然而，一般而言，概念的澄清通常被看作是理论家的一个特殊领域，它往往是经验研究的结果。即使是只注意本身需要的经验研究，也无可避免地要澄清概念。因为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概念，亦即变量，必须充分明确地加以定义，以保证研究的进行。在常被误称为社会学理论的夸夸其谈中，这种要求无法轻易而自然地得到满足。

在经验研究的过程中，澄清概念的方式就是为所讨论的变量确定指标。如果不作正式研究而只是一般思考，那就可以随随便便地谈论“士气”或“社会内聚力”，而毋须顾及这些术语的明确概念。

① F.S.Chapin, "The effects of slum clearance and rehousing on family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in Minneapol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3, 744—763.

② R.R.Sears, " Child Psychology", in Wayne Dennis, ed., Current Trend in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47), 55—56、西尔斯对此类研究的评价，令人钦佩地论述了这个一般性问题。

③ 不管它们怎么粗糙，象集中交谈那样的程序显然可以导出在原初未分化的情况中可能有关的变量。参看 R. K. Merton, M.Fiske and P.L.Kendall, The Focused Interview,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6).

然而，如果研究者要系统地观察士气高低的情况，要系统地观察社会的聚合或离散的情况，那么，这些词汇所含的概念就必须得到明确。如果研究者要避免在开始时就陷入困境，他就必须设计可观察的指标，其涵义要相当准确，在细节上要非常清楚。命名为"操作主义"的整个思想运动，只不过是科学家为了便利工作，要求明确定义概念的一个显著实例而已。

那些使理论的方向与系统的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学家，对于上述情况的认识十分典型。例如，迪尔凯姆明确地感觉到为其概念确定指标的必要性，尽管他的术语和指标现在看来是粗糙的并有争议。他反复强调："有必要用一个外部事实来表证、代替我们把握不到的内部事实，有必要通过前者来研究后者。"① 指标，或曰概念化项目的符号，从理论上讲，它和它所表示的事物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很难建立，这正是经验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既然指标和它的对象有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人们会探询其根据，为什么一个被看作指标，而另一个被看作指标化的变量？其实迪尔凯姆早就有过这样的意思，而苏姗·朗格(Suzanne Langer)又重新予以指明，即在对应关系中，指标是可以感觉到的一方，而变量是较难甚至是不可能感知的一方，两者在理论上有关联。② 这样，态度级数作为适用指标，度量本来难以区别的态度，这恰似生态学的统计为某一给定区域中形形色

---

① 迪尔凯姆，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Macmillan，1933)，66；还有他的Les régle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ne，(Paris，1805)，55—58；Le Suicide，(Paris，1930)，356页，并且书中随处可见。对照参阅R.K.Merton，"Durkheims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载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4，40，尤其是326到327页涉及到指标问题；关于高度发展的分析，参看Lazarsfeld和Rosenberg 所编的 " The Langnage of Social Research，第一部分的前言。

② Suzanne K. Langer，Philosophy in a New Key，(New York：Penquin Books，1948)46—47。

色的社会结构提供指标。

通过级度的发展使研究逐渐定量化，这是一种常常出现的倾向，它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试图澄清概念，使概念充分明确以便实行经验调查的一个特例。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使用概念的中心问题就是发展有效的，可以观察到的指标。我们还需作一个最后说明，以指出经验研究如何迫切要求澄清旧有的社会学概念——它们尚处于漫谈泛论的阶段，既未明确化，在定义上也还有毛病。

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个人扮演多重的社会角色，而个人趋向于按照社会结构对每个角色的限定性期望，来组织协调自己的行为。更进一步说，社会的整体性越差，个人就越容易因各种社会角色互不相容而陷于困难的境地。很多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为人熟知：信天主教的共产党员要承受来自党和教会互相冲突的压力，边缘性人物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社会的牵制，职业妇女在家庭和事业的需求之间进退维谷。每一种社会学教科书，都连篇累牍地阐述着个人的多重自我，及其造成的互不相容的要求。

有关角色冲突的理论还有待在实质上加以明确化，有待发展以便超出数十年前就达到了的水平。这也许是由于它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泛泛解释，很少被当作系统研究的中心问题的缘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早就指出：多重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人们对多重角色的逐步习惯和角色分离(role segmentation)得到缓和(所谓"角色分离"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每一组角色提出特定的要求)。① 还有人注意到，经常性的角色冲突，对个人和社会都属于机能失调的性质。但所有这一切尚未涉及到许多突出的问题：人们根据什么来预言处于角色冲突之中的个人的行为？

① W.I.Thomas and F.Znaniecki, The Polish Peasant, (New York Knopf, 1927), 1866—70, 1888, 1899及以下各页。

当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时，哪一种角色(或哪种群体关系)总是占上风？在什么情况下证明是这种角色还是那种角色起着控制作用？在泛泛思考之中，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和个人最相侔的角色总是占主要地位，由此就以同义重复的假解决法放弃了这个问题。或者说：试图预测互不相容的多重角色所产生的行为后果，是一个经验研究中的问题，它要求对团结、冲突、角色要求和情景等概念进行有效的澄清；由于人们看到角色冲突总是导致挫折，所以人们总是避开上述问题。

近来，经验研究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概念进行澄清。人们已经给冲突的群体压力设计了指标，同时也已经观察了在特定情景下所导致的行为。因此，以下情况可以作为这个研究方向的一个开端：在某个要作出具体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选举投票，个人由于受到相互交叉的(群体)压力，结果就延迟其选举决定。此外，在有待作出决定的条件下，个人没法用逃离冲突场所的方式来缓和冲突。就上例而言，就是个人对政治竞选活动"失去了兴趣"。最后，上述资料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选举人受到交叉压力的情况下，对他起主要控制作用的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社会经济地位。①

无论怎样，根本之点在于：上述选举的事例或其他事例都说明了，正是出于经验研究的需要，才促使人们去澄清公认的概念。在理论探索中长期不加分辨的概念问题，却在经验探索的过程中被提了出来。

最后就剩下几句结束语了。本文专门讨论了经验研究对社会理论发展研究的四种影响：对理论的开创作用，重整作用，(兴趣)集中作用和(概念)澄清作用。无疑还会有其他作用。而且本章的

---

① Lazamsfeld, Berelson and Gandet, "The People' s Choice"，第六章，和其后由B. Berelson , P.F.Lazarsfeld 和 W.N.Mephee所进行的研究Vo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

偏重强调也很可能会导致误解。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贬低理论和理论家的作用，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提议：一个明晰而完整表达的理论，未必一成不变地高于经验探索；实际上，新的观察并非注定要由理论家来指明前程。这个顺序常常被逆转过来。社会学要成为正宗嫡传就非得让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结为秦晋之好不可——仅仅这么说还不够。经验研究和理论工作应该不只是要海誓山盟——它们必须懂得如何永偕百年，它们互补互惠的作用必须明确给予定义。本章之短文有志于此。